



卷首语

今年1月10日，经济学院校友刊《仙舟客》温暖上市，反响颇佳，部分文章甚至收到北京杂志的转载请求。她成为我们与广大校友之间的又一精神纽带。

在这个凤凰花开的季节，毕业生们将要离开校园、踏入社会，这本尚有印刷余温的《仙舟客》的到来，令离别不再那么伤感，无论走到天南海北，你都能透过她听到母校的声音。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本期《仙舟客》堪称“认真”。“认真”不仅指本刊采访扎实、写作精深，“认真”也是本期每篇主人公一致的人生哲学。

封面人物——经济学院已故教授宋承先先生，并未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教育，却凭着罕见的刻苦与智慧，成为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引路人之一。

“做人贵在认真”，正是浙大经济学院前院长史晋川教授在他的导师宋承先身上看到的学者最重要的品格。如今，史晋川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获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他欣喜地看到，这种认真的品格得到了传承。

经济学院前院长洪远朋教授，六十年与时俱进，唯一不变的还是那股子一丝不苟的劲头，在夫人周建平教授的眼中，他始终“是很勤奋”的。

经济学院青年教师陈硕，像农民一样经营学术，为一篇文章付出“八年的努力”“改稿逾百遍”、“翻阅了近两千本地方志”。

作为教师同行，我很理解浙大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在收到学生《我们都姓姚》的礼物时的那句感慨，“我这辈子做教师，值了！”

“很苦很难很有趣”的一年军训锻造了经济9115班认真、团结的班级气质，这个当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标兵”的班级，直到现在，对一切正能量的活动，仍然一呼百应……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借用本期“生涯”人物之一——洪伟力校友的一句话，送给即将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会长

仙舟客

CONTENTS

FUDAN
ECONOMIST
2016.6.10 第2期

封面

宋承先：西方经济学的引路人

文 | 本刊记者 余翔 >> 04



忆旧

难以忘却的恩师朱伯康教授

文 | 陈景谦 >> 13

伉俪

洪远朋、周建平：琴瑟和鸣，碧海无波

文 | 本刊记者 樊嘉政、伍静 >> 14

创业

舒元：桃李满天，创业未晚

文 | 本刊记者 刘奕佳 >> 19

生涯

姚先国：心存坦荡，乐天随安

文 | 本刊记者 纪茗元 >> 25

史晋川：做人贵在认真

文 | 本刊记者 余翔 >> 29

洪伟力：资本江湖，路在脚下

文 | 本刊记者 曹柠 >> 32

聚首

人生何必只如初见——复旦经济系九六届本科生聚会有感

文 | 何寒熙 >> 38

王槐：我的大学

文 | 本刊记者 路文廷（整理） >> 42

蒋琳琦：在挑战中提升自己

文 | 本刊记者 周奕辰 >> 47

周超：生活本色

文 | 本刊记者 袁超颖 >> 51

9115 班返校：那朵百合，那群青春

文 | 本刊记者 路文廷 >> 56

女性

蒋芳华：生性自由，不羁无畏

文 | 本刊记者 林子涵 >> 62

跨界

卓福民：大时代中的跨界传奇

文 | 本刊记者 张懿雯 >> 68

余焕培：太极人生正当时

文 | 本刊记者 张懿雯 >> 74

问学

陈硕：像农民一样经营学术

文 | 本刊记者 郑薛飞腾 >> 79

风物

忆复旦 80 年代校园黑板报

文 | 本刊记者 陆奕同 >> 83

诗酒试年华：复旦诗社的“海星星”岁月

文 | 本刊记者 张鹤仪 >> 86

阅读

经济学院教授荐书

文 | 丁纯 杜莉 李维森 孙明春 >> 90

经纬

全球校友会快讯

2016 年 1 月 10 日全球校友会举办首届年会等 >> 92



编委会主任
张军

编委会
赵定理 俞乃奋
石磊 刘军梅

执行主编
伍静

责任编辑
王晓莉 邱佳佳
吕晓刚 朱家菲
梁冰

记者
余翔 郑薛飞腾
张懿雯 樊嘉政
曹柠 袁超颖
周奕辰 林子涵
陆奕同 张鹤仪
路文廷 纪茗元
刘奕佳

美术编辑
林子涵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

宋承先：西方经济学的引路人

文 | 本刊记者 余翔

宋门弟子以素质齐整、院长频出著称。他指导的四位 81 级硕士蔡江南、符钢战、金重仁、史晋川在当时即有“四大金刚”之说。他向国内输送了近十位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第一届研究生舒元 1994 年成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带出了一批南方经济学家。他的学生中，问鼎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例如蔡江南、符钢战、袁志刚先后获得孙冶方奖，史晋川、张军先后获得张培刚奖。张军还与林毅夫、樊纲获得百万奖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依稀记得，最早是在学校橱窗的展览中“认识”了名教授宋承先先生。在他眼中，后来成为他硕士、博士导师的宋先生，“很严谨”、“很有个性”、“学富五车”、“不幽默”、“和他交流并不觉得 comfortable”。回顾 30 年前在宋先生那里受到的教诲，“课堂可能已经忘了，但老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和简朴生活我一直记得。”

学生们

能在 1984 年考上宋承先先生的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院长袁志刚认为自己很幸运。1982 年从杭州大学毕业，他分配到舟山中级法院工作。当想要回到学校继续深造，他决定既然要学当代经济学，就要找最好的老师，宋先生是最佳人选。

1980 年代初，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大学，经历了与世界几乎隔绝和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的十年，极度缺少能够教授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上海之外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和张培刚教授，1980 年他们合著了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上海就是 1940 年代从哈佛经济系回国的陈彪如先生，以及宋承先先生。在经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的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宋先生的研究生总是报考的大热门，能成为考上的三个人之一，也是外校的唯一一个，“不容易。”袁志刚说。

在宋先生这里他们接受了与当时其他复旦经济系的研究生颇为不同的教育。

宋先生指导的 1987 级硕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明海还记得第一次听宋先生课的情形，那是 1987 年的 9 月，天气还留着夏天的燥热，



坐在一教一楼的教室，还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声。张明海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快，事实上，他正试图艰难地跟上宋先生的思路。宋先生吸烟，上课时也常常右手擎烟，左手托着代替烟灰缸的烟盒，讲课的思路也像烟雾一样散开。他常常提到一种理论，给出一些精辟的评判，又瞬间去讲另一个似乎并不相关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按照教科书的顺序和范围。

“老先生是很有深度的，听他上课要课外多读书，保证知识的存量，自己能思考宋先生为什么会从这一点跳到另一点。”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现任金融研究院院长的史晋川曾是宋先生指导的 1981 级硕士。在他的记忆中，宋先生的话中常有机锋，他还记得在评论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在财政政策重要还是货币政策重要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时，宋先生点出关键之处在于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的看法不同。这句话如同画龙点睛之

笔，使整个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除了讲授的课程，宋先生还根据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给研究生开出多门专题讨论课，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和通货膨胀。讨论课的地点时常变化，张军就总在自己的寝室等着宋先生过来授课，宋先生带着手写的讲义，上面有各种颜色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批注。同学们围坐在桌子旁边，宋先生讲到得意处，还会敲敲桌子，示意学生看讲义。

张明海在研二去往人民大学参加为期一年的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也称福特班，这个由福特基金会和国家教委合办的项目先在人大开设，1987 年拓展至复旦，到 1995 年的 10 年间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直接接触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的学者。

尽管录取严格，福特班却永远不缺少宋先生的学生。宋先生要求研究生尽可能阅读英文文献，在专题课讨论前一定要先研读该主题的经典文献。



当时的很多文献都来自宋先生的私藏。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宋先生是少有的能通过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领馆等渠道获得国外研究文献的人，尽管不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宋先生一直坚持学习英语，更新知识。看到好的论文，他就会自己保存下来，再印给学生。这样与西方接轨的经济学训练给了宋先生的学生更多机会，也激励学生认真提高英文，为在世界各地求学打下基础。

专题课上讨论的问题常常能成为学生论文的来源，学生们研究的方向很多，并不都和宋先生一致，但宋先生思虑长远，改革开放需要哪方面的研究，他就会积极介绍给学生，现在执教于美国创价大学的陈鸿仪就在宋先生的建议下开始研究国际贸易。

受宋先生教诲的远不止有他的研究生，他受邀去各个大学开设西方经济学的讲座，翻译西方名著，出版教科书……他首先在复旦大学恢复开设“外国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大受欢迎。1980-1981年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成立不久即举办大型的《国外经济学说讲座》，每周一次，共60讲，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国外经济学说，宋先生和北京大学范家骧教授共同主讲《增长经济学》部分，每次都有数百人参加。

他培养出的学生们也迅速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陈鸿仪1979年入学，还没有毕业就被邀请去讲授宏观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课程。在宋先生的研究生中，大量学生选择了从教，除了部分留校，很多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宋派”学术思想带去国内外各个高校。

宋门弟子以素质齐整、院长频出著称。他指导的四位81级硕士蔡江南、符钢战、金重仁、史晋川在当时即有“四大金刚”之说。他向国内输送了近十位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第一届研究生舒元1994年成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带出了一批南方经济学家。他的学生中，问鼎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例如蔡江南、符钢战、袁志刚先后获得孙冶方奖，史晋川、张军先后获得

张培刚奖。张军还与林毅夫、樊纲获得百万奖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尽管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宋先生的学生，但是毫无疑问，不仅仅是复旦，第一批中国改革开放后受教育的西方经济学学者的成长离不开宋先生的努力。”袁志刚说。

潜心理学

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作者总结了几位出生于1920年以前，又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科学真理追求之间时有矛盾。

但在宋先生这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并不对立。在早年经济思想史扎实的学习中，马克思经济思想被置于整个西方经济学脉络中考察，这帮助宋先生深入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产生

的前提条件和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分化。

既通西方经济学，又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谓之“双通”。复旦大学在1977年到1983年间出版了一套《资本论提要》，前三卷由资本论专家张薰华与洪远朋老师写作，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四卷则由宋先生执笔。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宋先生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写作了数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包括《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1956年），《论重农主义》（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改革开放之后，他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说和方法，先后出版了《增长经济学》、《当代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等书，同时还在积极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

《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1988年出版，这是



宋先生倾注极大心血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宋老师自道：“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并不视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糟粕，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科学，宋先生给予的是同情之理解。

宋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强 2005 年修订出版了本书的第三版，在前言中，许强说出了自己的难处，“坦诚的说，在以马克思的观点来批评西方经济学，我不够宋先生的百分之一。”

1988 年，宋先生 68 岁，年岁日增，身体抱恙，但他希望尽快写就《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完成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系统论著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1990 年代中期，张明海常常下班后的夜晚到宋老师在复旦第七宿舍的家中拜访。他记得宋老师书桌上总是摊开了一大堆稿子，桌子玻璃下还压着

纸条，简单地记着国外某个经济学家的生卒年月。

“宋老师答应要送下册给我们，但我们知道宋老师年岁已高，不好意思再提这本《西方经济学》（下册）。”但宋老师自己对张明海说：“我像胡适之一样，著书只有上册，下册总是出不来。我那本下册也总写不完，不知什么时候出了。但出了一定给你们！”1994 年，《西方经济学》（下册）还是出版了，规模比上册更添 10 万字。

在女儿宋慧毅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那一方靠北的斗室中伏案写作的，每次回家，映入眼帘的总是背影。在这种高强度的思考和写作中，宋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规律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入睡，早上七点钟开始写作，每到饭点，夫人做好饭摆上桌，宋先生的思考告一段落了，就出来吃一点东西，然后返回去继续工作。

文革的十年中，尽管宋先生还是坚持阅读学术文献，但研究毕竟是中断了。张明海说，尽管老师

没有直接地说过感怀的话，但他能感受到老先生时不我待的心情。好的想法可以改变国家，老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担当就表现在宋先生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中。

1997年，77岁的宋先生仍对书作了修订，添加了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前沿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初版发行后20年间已累计售出近一百万套，帮助了大批希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子。

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深刻参与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每时每刻都在给经济学家提出新的问题。宋先生也开始将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有效的对策。

在学术上，宋先生是自信的。从60年代开始，宋先生与人民大学的卫兴华老师展开了多次笔战，议题包括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货币流通规律、需求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80年代，宋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政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相当部分关注通货膨胀这一重要问题，宋先生坚定反对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膨胀、投资饥渴和货币超量发行造成的，是“需求拉上”型的，对经济发展有害；而认为中国并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则是潜在生产力逐渐释放后的结果，是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他还强调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先导作用，主张应当允许一定的财政赤字。

这些论文中的28篇后来作为专著《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在书中，宋先生回顾十年前的写的论文，自述“现实的发展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在真理面前，宋先生是绝没有傲慢的。陈鸿仪还记得，每次课上有学生提出的某些问题宋先生无法当堂回答，他从不装懂或者含混过去，而是非常诚恳地告诉学生：“我也没有答案。不过你可以从某某经济学家的某部著作中去找一找。”有时候，学生已经把自己过去问的问题忘记了，他却会在某一次课上告诉这个学生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给以详细的解释。

在读研期间，史晋川阅读斯拉法名著《用商品

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时，认为一处翻译有误，并与宋先生讨论。该书译者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大家巫宝三先生，起初宋先生还不相信巫宝三先生会犯错，但听完史晋川的详细解释之后，宋先生也认为可能有误，于是鼓励史晋川写信给巫宝三先生说明。巫宝三先生果然也欣然接纳。

宋先生的学术旅途并不孤单，他参与发起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并在上海成立分会担任会长。和学生在家中讨论的时候，他也总爱提一提自己的朋友们，有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也在经济系的资本论专家张薰华老师、南开经研所的学长宋则行……

在武大和南开的日子

青神，属四川眉山，以祭祀蚕从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山民多植桑养蚕，宋先生生长于此。张明海还记得一次吃饭时，宋先生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蚕宝宝一身是宝。一亩桑园和后续加工的劳动产值，大概抵得上10亩粮田所能创造的粮食。我小时候家家户户养蚕，我们读书的钱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母亲和姐姐则打理家里的二十余亩山田，植桑养蚕的收入支撑着宋先生完成学业。

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也招收了更多的川籍学子，宋先生1941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

时局动荡，迁校之路也并非平坦，难免人员流散。但武大西迁至乐山市，仍有教授一百零四人，讲师十三人，助教四人随校入川。1939年后，为保证师资质量更是陆续增聘了近百名教授。

生活艰辛，师生也大多极清贫，但教学工作仍有条不紊的进行，不仅如此，武大还积极延请愿意来华的外国学者来武大讲学，宋先生也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

1944年毕业后，宋先生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三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是当时国内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南开经济研究所前身是1927年建立的社会经



济研究会，193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48年先后招收了11届研究生。如今查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名单，上面还清晰的写着：第九届（民国三十四年秋入学）；宋承先；籍贯四川青神。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1930初汇聚了众多从国外名牌大学得到学位回国的学者，有博士学位者占老师的一半以上。在其教学中，即要求深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也极重视考察中国经济实况，鼓励师生进行社会调研。抗战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唯有经济研究所因创始人何廉在重庆政府任职的缘故在重庆重建。老师虽有流失，但何廉（耶鲁博士）仍任所长，方显廷（耶鲁博士）、李卓敏（加利福尼亚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等老师也仍旧授课。

根据资料记载，宋先生就读时的研究生第一年会主要接受基础学科训练，包括近代经济理论、经

济思想史、高级统计学、社会科学方法等。第二年则从事专门学科研究，并开始撰写论文。宋先生为何选择《经济进步与经济恐慌》为硕士论文题目，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但这两年无疑为宋先生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培养的11届研究生总计不过60余人，其中就培养了滕维藻、杨敬年、黄肇兴、宋承先、宋则行等一大批经济学家。

不拘小节的父亲

在女儿宋慧毅眼中，宋先生是最典型不过的老夫子。学术上极认真，生活上却不拘小节。

宋先生上课的时候的几个动作，现在史晋川还记得清楚：“老先生一激动先挽袖子。一直挽到上面。开始想问题了，就站在讲台上头朝天拍板拍脑

袋，同学在下面都只好忍住不笑。”

到了可能要下雨的天，宋先生随身出门带一把长柄伞，有时就把弯曲的柄挂在自己衬衫的后颈上。

“远远的看到有伞晃来晃去，我们就觉得一定是宋先生了。”袁志刚说，“但当时宋先生人真的非常好，对学生尤其好。”

那是1988年冬天的一个午后，袁志刚去敲宋先生在七舍的家门，这次他想要宋先生帮他写一封出国读博的推荐信。宋先生一直在，但凡学生有什么事情，也不预约，都是直接找到家里来。他敲门，过了一会门开了，宋先生还没把外套穿起来，原来宋先生正准备午睡，已经躺在床上。天气寒冷，屋内也没有暖气，问明缘由，宋先生也丝毫没有愠色，慢慢把衣服都穿好，就坐下来斟酌起推荐信来，当时的画面袁志刚一直难忘。

宋先生的家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改论文也往往在这里，史晋川还记得自己常常下午三点到宋先生家中，一讨论起来，宋先生就忘了时间，常常已经是六点多了，学生也不敢提醒，只能等宋先生想起来：“你们还是要吃饭呀，你们去吧！”大家才各自散去。

1990年，宋先生转去华东化工学院，跟着他的研究生张明海也常常穿过上海市区从东北角（五角场）到西南角（梅龙）去看宋先生，聆听宋先生的指导。“宋老师招待我们熏肠，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熏肠。宋老师说是四川家乡特制的。吃饭的时候，宋老师有时会聊聊家乡和自己，我们听着，在熏肠的美味中不知不觉把添加的饭吃完了，很想再添一碗。”

在女儿宋慧毅看来，母亲和父亲有种默契，对宋先生生活上的略显笨拙，甚至别人看来难以理喻的事情，两人总能理解、磨合。她还记得母亲说过的一件事情，那是五十年代母亲刚来上海不久的时候。

“父亲陪母亲去四川路逛街，父亲不愿意进商店，就在门口等着，等母亲从商店出来，发现父亲不见了，他竟然是自己乘车回去了。原来父亲迟迟见母亲没出来，到里面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就走了。”

母亲跟她讲述时的语气中并没有嗔怪：“商店

门口就是车站，这是我们下车后进的第一家商店，我自己回去了。”相识于青神，一同长大，宋先生夫妇相伴几十年的情感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

父亲过世后，宋慧毅才从母亲那里看到了一件一直压在箱底的旗袍，这是父亲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悄悄地拿着母亲的衣服比尺寸去裁缝店做的新衣。

宋先生清瘦，书生气，看起来宜静不宜动。但一件事让宋慧毅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60年左右，弟弟只有五六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只猫，是弟弟最好的玩伴。一天，这只猫爬上了树，又继而跳上了离树冠不远的二层楼房顶上，上去容易下来难，猫左看看，右看看，既不敢往树上跳，也不敢往地上跳，着急得在房顶上喵喵大叫，看到这一幕，弟弟也急得大哭起来。

父亲找了根长竹竿，一头拴了个菜篮子，想让猫跳进篮里。可是篮子离房顶还有一段距离，猫不敢跳，此时，听着弟弟的哭声，父亲情急之下爬上了树，第一个树杈不够高，又接着爬上了第二个树杈，直到把篮子伸到了房顶。猫儿轻松地爬进篮子，弟弟破涕为笑，全家皆大欢喜。

这时候，少年的宋慧毅想的是，有父亲在，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本刊记者采访了陈鸿仪、史晋川、宋慧毅、袁志刚、张军、张明海等多位老师，在此谨致谢意。）

难以忘却的恩师朱伯康教授

文 | 陈景谦



我于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就读经济系。那时在复旦大学里，地下共产党的同学占有绝对优势，以民主堡垒闻名于各校。老师们不仅学识丰富，而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至今难忘周谷城、朱伯康、漆琪生、胡曲园、周予同、蒋学模等教授为我们上课的情景。

由于朱伯康老师给我们班上的课多，又是系主任，与我等接触、交往多，他又平易近人，大家对他比较亲近有感情。我于1951年毕业离校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仍常与朱伯康老师书信来往。我是本班的联络员，常把我班同学分配到各地工作的情况告诉他。他的记忆非常好，一经提起，他还能记得一二。

1985年，我调回上海工作后，更常去看望朱伯康老师，交谈比较多，受到教诲也多，尤其深感他的传奇人生。他生于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岭的一个小职员家庭。他青年时代入读上海劳动大学，关心国事，满腔热情投身于救国事业，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后来转入十九路军。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战争。第二年，日本侵略军南下上海向十九路军78师闸北驻军发动进攻，点燃起“一·二八”的战火，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朱伯康老师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少校参谋。那时，各报发表的战地采访报道差错甚多，为了统一“口径”，也为了给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十九路军浙沪抗战史，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就委朱伯康老师和总指挥部少将高级参谋华振中将把“一·二八”战役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撰写《十九路军血战史》。朱伯康老师曾告诉我“这本《血战史》是在战地中写出来的。”——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炮弹曾经几次落在他们身边，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有的战友牺牲了，但他们照样到战地采访，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抗日壮举。3月初，十九路军已经苦战一个多月，转移到郊区塘桥、莘庄、方泰、嘉定、昆山、青阳港二线。为了集中精力，及时完成写作任务，他们离开战场到苏州阊门外顾家花园内的一幢小楼继续写作。书稿当年10月完成，蔡廷锴为书名题字，陈铭枢、蒋光鼐撰写序言。次年4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60多万字，包括十九路军史略、上海抗日血战原因及经过、国民义勇军之奋起、国

际形势的转变及中国外交、国内外对十九路军作战的舆论观察及批评日军之残暴与我国物质损失之统计……书中附有多幅战争的照片，是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93年，上海书店将其编入《民国丛书》影印出版，受到学术界欢迎。

朱伯康老师后来随军辗转至福建，在蒋光鼐组织的福建省人民政府中任职，参加联共反蒋抗日工作。因为被通缉，他逃至香港，在十九路军旧长官的资助赴德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到广东中山、遵义、浙江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商学院任教。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系主任，又被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在复旦执教40余年，直至退休。数十年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著作颇丰，其中著有120多万字的《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两册）。据悉，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国民经济史》再版，作为向复旦校庆100周年献礼。

2000年5月27日，复旦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我们班同学毕业离校四十九年，相聚在母校。是日下午，我们特地亲赴朱伯康老师寓所看望感谢他老人家。我们看到他衣着朴素，身体健康，精神很好，腰板挺直，行走自如，动作敏捷。那时，他已是九十四岁高龄。他告诉我们，眼能看，耳能听，笔能写，一般读书人的功能尚能保存。他2005年病逝，享年99岁。

他生前常与我们学子交往、叙谈。我与他促膝长谈中，曾问及他长寿秘诀在哪里？他风趣幽默地说，他没有什么法宝，只不过，胸怀要宽，肚皮要大，这是最重要的。他几次游览佛寺，对寺庙中端坐在山门的弥勒佛特别喜欢，特别注意到那副对联：“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长笑天下可笑之人。”他并不信佛，但认为这一对联却很有哲理。

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和较长时间与他交往、叙谈，深受感悟，给我这一生，为人处世、人生征途，建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带来一定的影响。🐱

（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47级校友陈景谦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刊登时有删节。）



洪远朋、周建平：琴瑟和鸣，碧海无波

文 | 本刊记者 樊嘉政、伍静

“他是很勤奋，很艰苦的。女儿出生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没有一天是早于12点睡觉的，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买菜要用菜票、要排队。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大早又赶去排队。”

2016年5月9日下午，洪远朋教授在他曾经担任过院长的经济学院接受《仙舟客》专访。他的夫人周建平教授伴在一旁，这是素来低调的她首次陪同先生一起接受采访，共同回忆往昔岁月。

面前的两位老师，素洁端正，满面春风，实看不出已届耄耋之年。六十载风雨兼程，在他们间形成了某种默契，采访时，一方想不起某个细节，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对方；一方在讲话时，另一方默默倾听，不时颌首，偶尔插话或补充一句。在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回忆起往事，他们显得平静而坦然。

同学、同事、同伴

“同学、同事、同伴”，洪远朋用“三同”来概括和周建平的缘分。从1956年同时进大学算起，迄今正好六十年。实际上，两人都是“调干生”，1956年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都从工作岗位上直接考进大学。这之前，洪远朋是江苏省工业厅的一名科员级干部，周建平则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当年能进大学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本科时期，在全班三十多位同学中，终日泡在图书馆的洪远朋与周建平并无特别的交集，但毕业后二人就开启了同步的人生：“同”时留下来继续

攻读研究生，师从“同”一位导师蒋学模，学成后一“同”留在经济学院任教，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

蒋学模夫妇无意中当了一回红娘。“当时研究生培养比现在严格得多，蒋学模老师那一届正好就带我们两个。”周建平回忆，“他有一个规矩，一个礼拜要到他家上一次课，专门给我俩讲课。他的夫人很客气，每次讲完课都留我们吃午饭。”一块上课，一块吃饭，切磋学问，同进同出，两位风华青年，自然而然走到一起，没有表白、承诺，谁都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开始的。

这对天成佳偶，得到了导师的祝福。“蒋学模老师从来没送过学生东西，但在我们结婚时特地送我们一个相册作为结婚礼物。他也感到很开心，对我们两个很满意。”回忆起这一幕，周建平眼中幸福难掩。

研究《资本论》的“资本家”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洪远朋既是国内公认的“经济利益派”的代表人，又以研究《资本论》著称。他曾多次谈到，《资本论》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长期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的导师蒋学模就对《资本论》格外重视，50年代在人大进修时曾有所涉略，60年代在指导他们两位研究生时又逼着自己啃读一遍，“寓学于教”，与学生互相砥砺。“蒋学模老师跟着我们一起看的，他没时间时，会老实说，这个礼拜我没有看好。”周建平说。

每次讨论课前，蒋学模都会指定他俩看哪些章节，上课时先让他俩作汇报。洪远朋回忆，“我们讲了以后，他再提问题。要看，要记笔记，要讨论。等于每次都要考试。我们不看怎么行呢？他考试，叫你哪一章写下来。那相当厉害，你一天也不能偷懒。”那时政治运动不断，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实际用来读书的时间并不多，“我后来出了近二十本与《资本论》有关的书，主要靠这两年打下基础。”

洪远朋的文风也深受导师濡染，“与时俱进”、“深入浅出”是评委们对他两本获奖通俗读物的共同评价。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报考大学的时候，

新闻系也曾是我的选项之一。我一直关注新闻，看的报纸比较多，各种类型的报纸，注意新东西。对文学也感兴趣。”

至今，洪远朋夫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都没有动摇，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所保留。周建平坦率地称自己爱讲“怪话”：“马克思不是讲‘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吗？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早了。资本主义还在发展。”一旁的洪远朋顺势补充道，“马克思改一个字，‘将要’敲响就好了”。

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资本论》在沉寂多年后，再次成为全世界人们热烈追捧的经典，洪远朋出版于1985年的《通俗〈资本论〉》也被重新发掘，于2009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修订再版。相隔二十多年，一本书跨越两代人，洪远朋觉得当中颇有一些传奇色彩：“怎么会发现我的呢，这个人当时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主编。他的父亲，曾是辽宁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1985年我那本《通俗〈资本论〉》是他父亲出的，书名也是他父亲取的。儿子印象很深，知道他父亲主持过这本书，就想到了我。”

传奇并未结束。2010年的一天，洪远朋看电视新闻时，毫无预兆地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得奖了。原来，在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活动中，《通俗〈资本论〉》被评为全国10种“优秀推荐图书”之一。《解放日报》指出，“这是本市迄今为止出版的第一本荣获中宣部推荐的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新华社撰文称，这10种书“代表了当前通俗理论读物编写和出版的最好水平”。

“从1985年到2010年，这本书是25年以后才认可的。”看着自己的成果，历经数十载，还能得到国家的肯定，注重传统的洪远朋为此觉得欣喜。

出了名的急性子

洪远朋是典型的A型性格，自我要求高，言出必行，想做的事情，恨不得马上就能有效率地做好，从不拖泥带水，“经院都知道我是急性子。交给我的任务，我只有提前。上课总是提前一刻钟到课堂，从来没有迟到。”1991至1996年任经济学

院院长时，他每日必到办公室，“我住在复旦凉城路，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有班车接送。每天最早是两个人。一个是一位王姓老师，另一个是我。第一班车上，总是我们两个人。”

洪远朋的硕士生、曾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现在的科研最早受他启发。他很刻苦，有心脏病，中年的时候在复旦成果他第一。”此言不虚，洪远朋早在本科时期就埋头苦读、勤奋过人，“入学时视力有1.5，大学一年级，近视就有一两百度了”。80年代，他开始进入学术爆发期，仅1983年就一口气独立发表论文八篇，同年，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在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次年，他成为全国百名50岁以下特批教授。

洪远朋自豪地忆起年轻时曾有一副好身板。在江苏吴县下乡时，“劳动强度大、又没什么菜吃，我一顿可以吃下一斤半米饭”；在江苏省工业厅工作时，一次年终为了赶写年报，连续六十个小时不眠不休，任务完成后还打了一场篮球、洗了个澡才去睡觉。这样的“破纪录”，一旁的周建平也是第一次听说，在她的记忆中，“他是很勤奋，很艰苦的。女儿出生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没有一天是早于12点睡觉的，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买菜要用菜票、要排队。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大早又赶去排队。”

工作起来“拼命三郎”的洪远朋在80年代身体开始出现异样，“痉挛性心脏病，心动过速，心跳达到220，急救。”

“我签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第一次，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送得很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答辩，他给学生看，看了三天三夜，发病了。还有一次，大概是2000年以后……”，周建平淡淡地聊着，语气舒缓平静。第二次发病时，做完动脉造影，多数医生建议洪远朋行支架手术，不料，后来当选院士的中山医院葛均波医生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需要搭支架。一心想通过手术一劳永逸的洪远朋，突然听说不用做手术，反倒不高兴了，一时急火攻心，血压陡升。亲历整个过程的周建平，对丈夫的性格和健康有了重新认识，并接受了葛医生的建议和指导，“医生感觉他情绪太大，认为他这个病，不是生理性的，是情绪性的。我就知道他的性格了，

什么都给他‘降’，给他制造一个好的环境。所以呢，我在家里只给他做减法。不过，有时受他影响，我也慢慢变急了。”

博士生们的“双导师”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西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建平在学术道路上与丈夫比翼齐飞，也有着耀眼的学术记录。

1964年研究生毕业时，在总支书记陆庆壬的安排下，洪远朋被分到经济系工作，周建平则进了刚成立不久的世界经济研究所，成为该所的元老级人物。从此，周建平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世界经济，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欧共体经济、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专题研究等课程。1985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欧共体研究室主任、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1985、1986和1990年三次被评为校“三八”红旗手。

夫妇二人学术起点一致，在研究取向上又形成互补——一个关注理论，一个偏重现实；一个聚焦国内，一个放眼国外；一个重视传统，一个探索前沿。在家中，两人也常交流学问，1981年《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的理论》一文就是两人合作的结晶之一，而洪远朋最近领衔出版的教育部委托课题成果《“中国腾飞”探源》，书名“腾飞”一词的考据和推敲，就渗透着周建平的不少心血。

洪远朋带博士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会尽可能吸收他们参与自己主持的国家科研项目，鼓励他们选择与课题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使之在“传帮带”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更重要的，这些博士生们享受到的实际是“双导师”的待遇。每次博士生来家里上课，周建平都一起参与讨论、脑力激荡。有那么两三年，周建平也和当年的蒋学模夫人一样，甘当灶下婢，为上完课的学生们准备一桌美味的饭菜，改善伙食。后来，经济条件好转，家附近的“章记粥铺”才成为师生讨论、聚餐的固定场所，学生们笑言，那是洪老师家的第二个厨房。直到最近两年，洪远朋才停止续招博士生。

数十位洪远朋所带的博士生，在论文后记中，不约而同地感谢师母周建平给予的“慈母般的关爱”



和“家庭般的温馨”。这里不妨摘下两段：

“师母周建平教授，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术上也给了我有益的启发，尤其是在我的第一篇小论文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周建平很多关键的意见和建议。”

“我也感谢师母周建平教授，他对我学业、生活、工作等方面慈母般的关怀，和她高雅的风度一样，让我终身难忘。”

在见到这两位老师之后，这种温暖的印象，愈加得到印证。他们的平易近人、热情健谈令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在轻松愉快中度过，当记者喉炎发作忍不住咳嗽时，周建平几次关切地询问，还不无遗憾地念叨，“我记得出门时带了含片的……”

一家五复旦

在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60年代，洪远朋和周建平罕见地只要了一个孩子。

这是出自经济条件和自身精力的考虑——他们

分别是各自大家庭中排行最小的子女，都有赡养老人的负担。小家庭的经济条件，又不足以聘请保姆。

不需特别商量，一如既往地默契，周建平在繁忙工作之余，自觉自愿地向贤内助和母亲的角色倾斜，“他当系主任时，我是研究所的室主任，本来也要奋斗的。这样一来，家里就没人管了。当时读中学的女儿跟我讲，我们这个家，不好出两个干部的……他也不要求我奋斗了，我支持他。一个家庭总归要这样。”

如今，洪远朋一家可谓复旦世家。他们二人自不必说，女儿女婿也双双毕业于复旦化学系，“一家五个复旦人，连外孙也是复旦幼儿园毕业的”，讲到这里，洪远朋哈哈大笑起来，像个孩子。

几年前，相辉堂募集修缮资金，捐款人捐款1万元后可以认领一个座位，经女儿提议，洪远朋当即捐了五万元，认领了五份全家种下的“复旦情结”。

“最近英国有一个排名，中国五个学校进入百强，我们复旦老三。我心里一直认为复旦是老三。”洪远朋提及复旦，是满满的贴心和信任，就像提及一个已融入生命中的亲人。



不炒股不炒房的经济学家

采访中，身板挺直、谈吐清晰的两位老师多次戏称自己是“80后”，却看着比实际年轻十岁不止。当记者忍不住讨教他们的“保养秘诀”时，洪远朋几乎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四不”的答案——不炒股、不炒房、不抽烟、不喝酒。原来已有很多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们本来是第一批可以炒股的，但我们没参加。”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和第一批拿到股票认购证的人，他们对股票不可谓不了解，也有许多学生从事股票行业，并不缺乏相关信息，但他们多年来坚持不炒股不炒房，这样或许错过了一些致富机会，但落个心情坦然，可以静心教书育人，坐看股市楼市起落。至今，他们仍然住在当时复旦凉城路的“博导楼”，26年没有换过，“我们没有买卖关系的想法，比较传统。”

除了“三同”“四不”，夫妇俩还有三个共同的爱好——乒乓球、电影、麻将。尤其是电影和麻将，至今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频率。“最近看的一部是《北京遇上西雅图2》，蛮好的，就是内容和片名是两码事。”洪远朋谈起电影来也透着书卷气。

说起麻将，洪远朋的认真劲儿上来了，“现在很多人对麻将不理解，把麻将和赌博挂钩。实际上我们国家讲麻将是一种运动。我们的领导人，对麻将都有说法。毛泽东说，中国有三大发明，一个中医，一个红楼梦，一个麻将。毛泽东有肩周炎，他的医生就叫他打麻将医病。邓小平也喜欢打麻将，他说做任何事都要认真，打牌也要认真。”

听到这里，周建平打趣地插进来，“洪老师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引经据典。他是借毛泽东邓小平的话，把麻将合法化。”洪远朋调皮地笑笑，没有否认，“做事要有依据啊”。他们的牌友中，既有退休的同事，也有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我们的学生也有五六十岁了。见我们女儿不在身边，过来陪陪我们”。

如今，洪远朋把有限的精力收拢到对“共享经济论”的关注和思考中，“每天工作半天”，“读十几种报纸”，“新闻联播一定要看”“微信只收不发”，“虹口图书馆经常去”……夫妇俩如影随形，相互扶持，日子平淡而充实。

舒元：桃李满天，创业未晚

文 | 本刊记者 刘奕佳

“用来赚钱谋生的工作是你的职业，用来花钱的事是你的兴趣爱好，如果你的职业发展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你会有更大的工作热情和精力，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衣着朴实的舒元出现在咖啡馆里，步伐矫健，目光炯炯。开口相谈，诸如“创新创业”“互联网+”等一串串紧扣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的词汇，频频现于他的口中。很难想像，舒元今年已67岁，恰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从下乡知青到工农兵学员，从求学复旦到出访英美，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到中大创投董事长……舒元的人生，一直与共和国成长、发展与转型的历程息息相关。“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而今，舒元尚未停下步伐，仍在创新创业领域奋力开疆拓土，自我超越。

白水黑山忆知青

舒元是上海位育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这所中学曾是上海的三所五年制中学之一，在文革前其毕业生高考录取率高于90%。席卷全中国的文革，使舒元和老三届高中同学，未能旋即踏入大学校门。1969年，他因父亲隔离审查不能去军垦农场，转而报名去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插队落户，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

“我在黑龙江省的德都县，现在叫五大连池市，建设公社建国大队第一生产队。”北大荒的山山水水，今犹历历在目。正是在那里，舒元和同行的知青们经历了零下30-40度的严寒、虱子跳蚤、皮肤过敏、劳累和饥饿等种种考验，度过了四年青春。

“每天都在挑战我们体力和意志力的极限。”回首往事，舒元道。刚去农村时，生产队看知青不

会干农活，就派他们中的几人去县粮库做搬运工。每天来回走20里路去县城上班，工作八小时，扛两百多斤的麻袋，装卡车，晾晒粮食……舒元笑称自己比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苦，“做了半年苦力，幸好没有受伤，还成了专业的搬运工。”

“农村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每个劳动力都要干同样数量的活。”作为上海城里长大的学生，很多知青此前并不具备承担农活的体力和技能，但是与农村劳动力一起下田，他们每天要完成的劳动量，和农民并无二致。生产队里“打头的”农民体力好、技术高，其他劳动力的工作量必须与他看齐。“割



图 / 1969年5月25日，舒元（右二）离开上海去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德都县建设公社建国一队插队落户



图 / 1973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7315班合照，中排左起第8位为舒元

小麦会根据你割多少个苗眼的宽度，决定你每天有多少个工分。后面有人查边，没有割干净要扣工分。”舒元还记得，割黄豆时，三里多长的田垄随着地势蜿蜒起伏，每个人都弯着腰如机器般地收割。农民的每一刀，哪怕只比青快零点几秒，割着割着，就会拉开巨大的差距。最后他们的人影，都逐渐离开了知青们的视线。常常一抬头，知青就会看到“打头的”已坐在远远的地头休息；等割到田垄那头，再割回来，“打头的”和其他农民则早已归家。

“磨刀不误砍柴工”，舒元还学会了磨刀。他学农民把磨石穿个孔，用皮条把磨石系在腰带上，割庄稼休息时，再苦再累也要抓紧时间磨刀。他们磨的镰刀可以用来“刮胡子”，可以“迎风断草”，即用刀刃轻轻推向直立的细草，细草就会被切断。“如果刀稍微钝一点，细草就只会被镰刀推弯，”舒元如此般自豪地回忆起自己的磨刀技术。

每年大半年的严寒和其他艰苦的自然条件，以

及极高的劳动强度，使舒元了解了农村、农业和农民，意志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中国大学进行了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招生。凭借文革前在重点中学的学习功底和优秀知青的推荐资格，舒元在名额少、院校少、专业少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推荐和考试。那一年，舒元已经24岁。他结束了北大荒的知青生涯，进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就读。

长风破浪会有时

在谈起大学生活时，舒元说，“我们在复旦的学习和生活和你们现在完全不同。”

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系只有政治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两个专业，其中1973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有40位同学，包括20位解放军学员。仅有3位女生，都在同一个小组。当时的课程主要是《资本论》、

马列原著和政治经济学，没有数学课，讲授西方经济学时，采取的态度则以批判为主。但是那时经济系的学生，有机会聆听到漆琪生、吴斐丹、蒋学模、宋承先、陈观烈、张薰华、伍柏麟、洪远朋等老一辈学者的授课。

大学也难逃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动荡，最大的不同，就是文革期间大学的“开门办学”。学生经常被安排去工厂、农村、部队和其他单位去“学工，学农，学军”。大学一年级的舒元就曾经去瑞金医院为医生和护士讲解马列著作，也去张江的高炮部队当了一个月的兵。舒元班里的解放军同学，比学军部队干部的资格还老，这些同学变成了部队排长连长眼里的“领导”。

“开门办学”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课程经常中断，于是舒元开始自学英语。“我大学只上过一节英语课，”舒元说，“我把中学同学的英语教材借来看，初一的课本还认识，初二的就像从没见过的。”他每天学习一课的内容，再完成全部作业，就这样，舒元自学了《Essential English》、《英语九百句》、《New Concept English》等好几套英语教材。连吃饭的时间也被他利用起来——他常常在食堂打饭后回宿舍，边吃饭，边用收音机听电台英语课程和英语节目，从Radio English到Radio Beijing，再到国际电台，还会阅读英文刊物。

1976年舒元毕业留校，在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当助教。他又开始自学西方经济学，利用系资料室找到旧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版教材，有不懂的地方就去向宋承先老师请教。凭借勤奋和努力，舒元初步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他谦虚地称自己“不够深入”。然而，当1977级本科生大学四年级时，舒元已经可以给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了。“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个班里有包括朱民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在复旦大学经济和管理学科的学子中，不少人曾经聆听过舒元在三尺讲台边，就西方经济学理论侃侃而谈。

在打倒“四人帮”后，复旦大学要求工农兵学员补课，舒元向经济系领导申请免去经济学课程的补习，转而学习高等数学。文革并没有阻碍舒元的学术追求，反而让目光高远的他逆风而动，快人一步。这种自我挖掘学习资源，创造学习机会的能力，

让舒元在英语能力、数学能力和西方经济学方向上展现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舒元在经济学系的教师中率先通过了教育部的出国选拔考试。1981年他被公派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到国外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

春风雨露，桃李满门

大学毕业后的舒元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其间去过英国和美国留学和讲学，获得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过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主任和经济学系系主任，为经济学院的教学改革、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做了很多工作。1994年，应邹至庄教授推荐、汪道涵老市长动员，他被调任中山大学。自此，舒元的育人生涯就一直与华南这片热土紧紧相连。1994-2007年、2010-2011年他担任了15年岭院院长，2006年又在珠海校区筹建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2014年，舒元作为博士生导师退休。他曾指导了理论经济学两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舒元担任了二十多年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対教育改革的探索都贯彻在这两个学院的不断发展中。目前这两个学院已成为广东省高考最热门的两个学院，岭南学院更是通过了商学院的三大国际认证。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舒元深切体会到社会迫切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进而在1998年开始推行“通识教育”。“现在的就业市场，是双向选择，不是过去的‘包分配’。”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绝大多数不会“专业对口”，毕业生在其职业生涯中会多次变换行业和职能。舒元认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当培育能适应多种行业和岗位的综合型人才，而不是让学生专注于学习单一专业的知识。

自1998年始，岭南学院就一直实行“经济管理大类的大学生前两年打通培养，第三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在学院内任选专业，没有名额限制，也没有学习成绩的限制”。舒元认为，经济管理大类的本科生都需要良好的基本训练，“学生在大学时期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是事半功倍。学习具体行业的知识，是事倍功半，在实

际工作中学习效率更高。”在前两年打通培养的阶段,就学习数学、外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而言,所有经管专业的学生差别不大。当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不同,自主选择学习数学分析、工科数学或文科数学。舒元认为,从就业市场的现状而言,中国过于细分的专业更像是为国内招聘单位提供的标签,“我国招聘单位的水平不高,银行只招金融专业的,税局只招财税专业的,其实这些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没有太大的差别。国外机构和跨国公司在招聘时,则更关注毕业生的潜质而不是毕业的专业”。面对众多学生可能集中选择某个专业的现象,舒元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学生的选择从整体来说是理性的,反映了就业市场对某种“标签”的需求,也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尽管大学生在学院内部专业选择不限名额的举措,面临一些教授和系主任的反对,但舒元还是“以学生为本”,坚持学生选专业不受名额限制,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学习自己理想的专业,从而在毕业后更好地发挥潜能。

另外,岭南学院十分重视与国际教育的接轨。经济管理类的涉外课程全部采用最新的国外原版教材,并开设各专业的全英文课程。教育国际化的举

措让岭院学生在出国读研时,环境适应和学习能力十分出众,一些毕业生已成为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等国际顶尖大学的教授。岭院积极发展的国际交换生项目,用舒元的话来说,能让学生对国外教育、文化、历史、经济和社会的“exposure”大不相同。学生的出国交流学习,对他们的人生发展和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舒元的带领下,岭院的声誉渐起。近十多年广东省的高考招生中,岭南学院招收的6个专业的录取线,全都排名在广东省文科和理科的前8位,有时则为前7位。然而,舒元面对岭南学院囊括了一批高考佼佼者的情形,既感到骄傲,也有着清醒的担忧。他看到中国学生在“唯分数论”的体制下缺乏对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家长在进行专业乃至职业选择的指导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坦言,“一个学生读什么专业要和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相联系。家长一定要与自己的孩子平等地探讨,孩子十年、二十年之后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但是中国家长却很少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协助孩子做职业规划,习惯性地忽视孩子真正的“兴奋点”,“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希望由孩子来实现。自己觉得哪个行业能赚钱,就叫孩子读哪个专

业。但孩子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可能读完博士以后却不愿干这一行,这对孩子的发展是最大的浪费。”

舒元决定为这些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学子“补上这一课”。2008年舒元为国际商学院大学生开设了职业发展课程。学院邀请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跨国公司的HR经理,政府官员、企业家、运动冠军等行业精英来做讲座,分享各种职业的特点和人生发展的经验与感悟。学院鼓励学生做心理测试和性格测试,指导学生在教学科研、中外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和创业等职业类型中做出自己的初步选择和职业发展规划。舒元希望能通过该课程,帮助学生逐步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发展规划,再由远及近,倒推在大学阶段的专业选择、课程学习和实习。他坚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逆风也可以借势。但如果你没有目标,哪怕你再努力、跑得再快,也是没有意义的。”

舒元在国际商学院提倡“SSR”(social investigation, social practice and reading)课程,要求学生利用寒暑假,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实习和广泛地阅读。“尽可能出去,不要呆在家里无所事事。通过了解社会,更好地了解自己”。舒元见过一些毕业生进入“理想的”工作单位一周之后,便感到不合适,考虑要去其他单位工作或考研究生。他认为,要让学生“少走一点弯路”,让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行业动向,通过实习体验了解某个行业和岗位是否适合自己,而不是等他们毕业后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对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的重视,始终体现在国际商学院的教育中。每年开学迎新大会,舒元便向新生介绍以往毕业生的去向,让新生开始思考自己四年后的目标。他知道,大部分学生还搞不清楚,但是“想与不想是不同的”,如果能把握好四年的学习和实践,思考和修正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学生最终体现出来的竞争力就会产生质的飞跃。果不其然,2010年国际商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全中山大学各院系中排名第一。作为一个全新的学院,它缺乏知名度和各行业的校友人脉资源,却能交出如此亮丽的成绩单,这与舒元推行的职业发展教育密不可分。

上图 / 2014年10月31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刘延东副总理接见
下图 / 2016年3月16日在中大创新会接待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彭小枫上将



图 / 1996年4月19日,舒元(左三)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右二)等合影

回首二十余年来作为商学院院长的育人之路,舒元谈得最多的仍是高校的职业教育。他笑言,“用来赚钱谋生的工作是你的职业,用来花钱的事是你的兴趣爱好,如果你的职业发展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你一定会有更大的工作热情和精力,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010年,中山大学希望舒元教授带领岭南校友在金融创新方面做些探索,于是舒元开始筹备组建中大创投。年逾花甲的舒元,在对风险投资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无知无畏”地担任了中大创投的董事长。与众多拥有国内大学背景的基金不同,中大创投尝试新型的基金模式,完全依靠校友的私募

资金而没有国有资产，按照市场化规则进行投资、管理、运作和风险控制，突破了以往大学基金在风险承受能力等多方面所受到的限制。

舒元笑称，自己那时候是“不太懂，所以答应了”，现在想起来，“用人家的钱，几个亿的资金去做投资，这个压力很大。”在中大创投成立初期，主要是做 VC/PE 投资。中大创投决定不做 Pre-IPO，而是“往前做”，因为在资本市场火爆之时，做 Pre-IPO 要“靠关系”才能拿到配额，要接受高的 P/E 估值，又无法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无法控制风险。选择“往前做”，则对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高要求：要对产业发展趋势、技术路线、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家和管理团队素质进行深度调研，要提升投资判断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以及整合资源、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

起初的投资决策，屡屡受到合伙人的挑战，“为什么要投这个产业？这个企业？什么时候能退出？”当被投资企业还在发展过程中时，很多问题是难以回答的，中大创投的投资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和质疑。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投资眼光是敏锐的，多项投资已取得明显的成效，有的上了新三板，有的已被证监会受理了申请创业板 IPO 的资料。“现在合伙人高兴了，我们的压力也就小了。”舒元轻描淡写地叙述着中大创投初创时的艰辛。在他看来，做企业和做学问不同，说过什么并不重要，把事情做成，“get things done”，执行力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帮助被投企业更好地发展，中大创投筹办了云珠沙龙和中大创新谷。云珠沙龙团队的企业化高效率运营，让其一跃成为华南第一的创新论坛，已举办了 160 多期线下和线上的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10 万人。中大创新谷成立仅一年，就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都是在赔钱做公益的事情”，舒元笑道，但正是创新论坛和创业孵化器，帮助中大创投发现了极具投资价值的项目和团队人才。中大创投已逐步建立了众创、众扶、众包、众筹、众智、众育的六众平台和创新创业综合的生态服务体系。中大创投的探索得到广州市科创委、广东省科技厅、国家科技部、广东省和外地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

身在创投，心系教育。舒元坦言自己现在离开高等教育体系，接触产业发展和企业运作第一线实

践后，更明晰地看到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他担心中国学生从小到大大，“做的不是创新的研究而是陈旧知识的记忆”。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死记硬背陈旧的知识，就会缺乏时间精力去了解社会发展新趋势和科学研究新成果，缺乏解决“没有答案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希望优秀的同学花 20% 的时间就可以掌握 80% 的知识，还有 80% 的时间可以去学习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社会实践。”但是在以分数为指挥棒的氛围下，很多“好学生”为确保 100 分，花费其他的 80% 时间去记住其余 20% 的知识，从而牺牲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各种发展机遇。在舒元看来，这些“好学生”毕业以后的发展，往往比不过对学习分数不是那么看重的同学。

舒元带领的中大创投给予年轻人快速发展的机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有思想有能力，就会有很大发展空间，有的人已经成为中大创投下属企业的 CEO。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和风险投资行业的特性，让舒元接触到很多优秀的 80 后 90 后创业者，他们精力充沛，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充满创意。在舒元眼里，他们比自幼习惯于“优秀”和“完美”，不敢冒风险和创业，只想找一份“高大上的打工机会”的“好学生”更有发展潜力。

舒元自嘲，曾经的自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在学校里“觉得自己的学院和国内外的学院相比办得不错”。现在和企业打交道多了，他发现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学还存在很多问题。教育部和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考核，以论文、课题、获奖和专利数量为标准，不鼓励老师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很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授对经济社会第一线的实际问题不太了解，不能对政府政策和企业运营给出有益的指导意见。对此，舒元有一丝无奈，他希望中国高校能充分利用好丰富的科研资源，为创新、创业、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八年育人生涯落幕，在同辈者含饴弄孙之际，舒元却继续探索资本市场荆棘遍布的征途。没有一句“志在千里”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壮心不已”的砥砺前行。漫漫人生路，此刻风景正好，人间晚晴。☀



姚先国：心存坦荡、乐天随安

文 | 本刊记者 纪茗元

“我把学生当作朋友和孩子，这本书《我们都信姚》就是他们送给我的六十岁的生日礼物。序是我多年好友卢建平教授写的。拿到书我真的很感动。我想说，我这辈子做教师，值了！”

能 吃辣又爽朗的湖南人！这是记者看到姚先国教授简历时的第一个猜想，事实上，见到他时确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小纪同学来了，先坐下歇会儿，喝点茶吧！”姚先国笑着说，然后让稍等片刻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当日的《人民日报》，还有两沓毕业论文。平易近人，公务繁忙，这是记者对姚先国的第一印象。

意外迭起，机缘巧合

姚先国早年想当兵，后来却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当中充满了机缘巧合。

他出生在湖南华容县一个农民的家庭，那是一个赤旗飘扬而又物质匮乏的年代。保家卫国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姚先国也不例外。不过因为是独子，他最终没能当兵，而是走了读书的道路。母亲因为儿子调皮捣蛋，喜欢打架斗殴，提前一年让他上了小学。谁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偏偏怕老师，学习

用功成绩优异，一直是“高级”学生干部。高中时是校革委会委员、红代会主任。

1970年高中毕业，赶上县电信局招工。在老师们的一致推荐下，1971年姚先国成为一名电信局的职工，身兼话务员和文书两职，1972年入党，1973年成为全县青年工人标兵，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他想学理工，报了北航，最后分配到安徽大学外文系。据说是因为他政治条件好，学外语能为国家的对外交流事业做贡献，他一热血就去了。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学的是哑巴外语，没有用武之地，姚先国大学毕业后，回乡做了教师。

197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以前的一位中学老师后来调至教育局工作，写信并寄表格给他，鼓励他报名。于是，姚先国决定考研。他先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但因招办负责人的工作失误（将未盖公章的报名表寄出）而使他失去了参加考试的机会。1979年，他再次报考，这次选择的是复旦大学经济系。他考上了，并师从蒋学模教授，开始了经济学之旅。姚先国的人生道路由此发生了改变。“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人生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最要紧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姚先国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后如是说。面对人生的各种意外，他没



有过多的纠结，而是专心于力所能及。虽有时事之阻，心存坦荡之气，这可能也是他在经济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原因。

恩情情重，君子之交

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之后，姚先国发现自己的导师蒋学模竟是经济学泰斗。更惊喜的是，蒋学模主要研究《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姚先国研读政治经济学的入门书，这不可谓不是缘分。

“蒋学模教授是我最敬爱的恩师，”姚先国笑着回忆，“我在复旦的这几年，是我真正接受学术训练和培养的时期，蒋老师一直对我支持良多。毕业后我来到浙江大学工作，和老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蒋老师每次来杭州都要到我家坐坐，一起吃饭。我去上海出差也经常去看望老师。学生在老师家吃饭可能是寻常之事，但我恐怕是唯一一个在老师家住过的学生。1987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去看望老师。那时老师家在杨浦区，离市中心很远，附近住宿又不像如今这样方便。老师说不要麻烦了，就住在我家，于是我就在老师家住了一夜。”

“我和导师的关系有些特殊。”姚先国又补充道，“我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和老师公开论战的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不久，蒋老师主持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社科项目，让我们写一些专题文章，我所写的是有关货币的价值基础问题。我在文章中提出，在当今新的经济条件和形势下，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应该是交换价值。但蒋老师觉得我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经济。因为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黄金才是货币的价值基础。‘这是把说清楚了的问题又搞糊涂了’，蒋老师这样形容我的看法，他认为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当时他是《复旦学报》的主编，就把我写的文章放在最新一期学报的第一篇，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放在第二篇，用来批判我的观点。我后来写信给他表达了我的不同意见，他回信表示理解，但仍坚持他的观点。”

学术领域的论战并没有影响到师生间的感情，几十年来姚先国与导师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姚先国与蒋学模可算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图 / 与金庸先生在一起

丐帮帮主，文武并举

姚先国有一位好友，几乎所有华人都听说过这位好友的大名，他就是金庸先生。金庸曾笑称姚先国为“丐帮帮主”。这一称号倒也可以说是姚先国真性情的体现。在浙江大学教师圈，谁都知道姚先国不怕领导，为了学校的事据理力争，他曾吹胡子瞪眼睛，也拍过桌子。对待同事和下属，姚先国提倡“坏话当面说，好话背后说，有话直说。”他说：“只要办事出以公心，有理走遍天下。我有这份自信。”姚先国率直本真的性格为大家所欣赏，他喜欢把朋友叫做“弟兄们”，把学生唤作“徒儿”，“江湖人”的爽朗气概可见一斑。

姚先国还有一个为人所知的习惯，就是开会经常迟到、打瞌睡。有一次开会，他睡得正香，听得一声大吼“姚先国”，把他惊醒。正在讲话的常务副校长指着他激动地说，“你，一开会就迟到，一坐下来就打瞌睡，一打瞌睡就打呼噜！你呼噜那么响，叫我怎么讲？！”全场哄堂大笑。

姚先国的确是很忙，平均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姚先国刚从外地开会归来，正忙着审阅毕业研究生的论文，包括外校送审的论文。“为什么还有复旦的论文？”记者问道。“再忙，母校寄来的论文一定要看。”他很认真地说。

虽然工作繁忙，但姚先国有自己的调节方式。除了平时做深呼吸、打拳之外，他还是浙江大学教授篮球队的队员。他钟爱民族器乐，二胡、箫、笛子、葫芦丝样样都拿得出手。“我是个爱玩的人。”姚先国说着，脸上又浮现出一种老顽童似的笑容。他还提到一件趣事，有一次他过生日，学生送他一把好二胡，并让他现场试拉。一个好朋友把帽子摘下放在地上，观众们纷纷“买单”，最后还真有些“收获”。记者听完也不禁莞尔，心中油然认同金庸先生的“册封”：姚先国教授真性情、能文能武，当得起“丐帮帮主”之称。

儒道风骨 仁和人心

采访结束之后，记者随姚先国一同到学校餐厅。



左图 / 姚先国和学生们在一起
右图 / 姚先国弟子送给老师的六十岁生日文集

一路上不时有老师、学生、餐厅里的工作人员招呼问候，他都真诚地给予回应。看着大家和煦的笑容，记者又想起刚才采访中谈及的两个问题。

一是姚先国成功组建了几个学院的经验。如此耀眼的业绩，背后到底什么诀窍？姚先国思考片刻说：“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办学思路要清楚，‘谋定而后动’，不仅要目标清晰，而且要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寻找最佳的可行方案。这也是经济学的道理，怎样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第二点是‘人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大学人才济济，关键是要强化激励，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所谓家和万事兴，道理是一样的。”原来经济学的原理还可以用在这方面，这也算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二是姚先国和他的学生们令人艳羡的关系。在他看来，做人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先做到”。搞院系改革也好，教育学生也好，不外乎此。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幸福地对记者说：“我把学生当作朋友和孩子，这本书《我们都信姚》就是他们送给我的六十岁的生日礼物。序是我多年好

友卢建平教授写的。拿到书我真的很感动。我想说，我这辈子做教师，值了！”就在前不久的5月21日，他的学生和朋友捐资五千余万元成立的“先国公共政策研究基金”正式签约，次日《光明日报》还为此作了题为“‘姚老前辈’和他的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的报道。

姚先国教授在经济学领域成绩斐然。同时，在他身上似乎有一种超越了学术的独特魅力，无论是早年报考大学遇到意外，还是留学回国后受命主理浙大院系建设，使经济学院平稳过渡跨越式发展，从中都可以感受到他那气量恢弘、无欲随安的道骨；无论是学生们对他的爱戴、为他出书的感动，还是餐厅里大家温暖亲切的笑容，从中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仁心人和、真性真情的儒风。是的，姚先国教授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是他一身的儒道风骨。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学者！

（本文系记者对姚先国教授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姚先国，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79级硕士，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史晋川：做人贵在认真

文 | 本刊记者 余翔

“做人贵在认真。”这是史晋川在他的导师宋承先教授身上看到的学者最重要的品格，也是他自己学术人生中一以贯之的准则。

猴年，史晋川最高兴的事情是自己的孩子在美国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赴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他很欣慰地说，这是一种传承。回想34年前的初春，他刚刚进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2年的2月。

学术人生

说起1981年底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史晋川仍然十分感激自己的导师宋承先教授。

当年的考题中有一道题目是论述哈罗德-多

马模型中的投资增长两重性，占20分。当时史晋川在杭州大学的本科经济学教育，极少涉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因此他也没有接触过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自然答不出题。但是，难道试卷五分之一的分数就要放弃了么？史晋川想起自己相对熟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关两重性的论述，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洋洋洒洒写了一张纸答案。

后面的故事是史晋川入学之后从师兄许强那里知道的。许强是1979年入学宋先生的研究生，那年以助教身份帮宋先生阅卷，当时很多考生都没答



图 /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1级研究生合影，前排左三为史晋川

出来这道题，许强看到试卷上写得满满当当，可答案与题目似乎又不那么搭，于是去请示宋先生。宋先生说，虽然答案不对，但是考虑到回答问题的思路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可以适当给分。因此，史晋川在这一题拿到了十分，从而能够以合格的专业成绩跨入复旦校门。

在复旦大学读研，史晋川接受了当时国内少见的比较规范的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宋先生给研究生开专题课程，例如经济增长理论，要求阅读文献相当多，当时的英文原著相当有限，研究生大多看的还是外国经济学的译著，但文章却大多数是英文文献，宋先生在文革期间依旧没有放弃接触英文文献，好的文献他都熟记于心，让学生去图书馆查阅复印。

史晋川的记忆中，宋先生是边思考边讲课，有时候讲着讲着卡住了，就站在讲台上头朝天天花板，拍打脑袋，等思路打开了，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尽管史晋川每次上课，为了跟上宋老师跳跃的思维都得紧绷神经。但宋老师常有的洞见，确实令同学们由衷折服。

记得宋先生评论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在财政政策重要还是货币政策重要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指出分歧出发点都可以回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看法，即如果认为是稳定的，则偏向货币政策，反之则偏向财政政策。通过这画龙点睛的一笔，整个理论图景都变成清晰起来。

1985年，刚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史晋川在《经济研究》——国内经济学最为权威的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的论文。

不要轻易发论文，要发就发高质量的论文，这是宋先生的要求。学生的每一篇论文，宋先生都会给予细致的指导，有时候在学生论文上写的批注几乎可以赶上被批注原文的字数。研究要深入，这也是史晋川现在对自己学生的要求，他用打井和挖坑作比喻，说：“与其挖三个坑，不如打一口井，你有打井的能力，没有人怀疑你挖不了坑，你挖了十个坑，人家也不一定相信你有打井的能力。”

故土浙江

史晋川1957年出生在杭州，在近六十年时间，生活在杭州的岁月有足足四分之三，他学习研究经

济学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同时起步。

1978年3月，史晋川从插队落户所在地——临安县天目山区的农村，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曾经在国内众多省份中并不起眼的浙江，一跃成为民营经济重地，经济迅猛发展。

史晋川认为，浙江是很好的研究改革和发展的案例。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从发展视角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而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后动力是改革，即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

史晋川的许多研究也将目光聚焦于浙江这片热土，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既着眼大处，如《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也深耕一地，如《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也由小见大，如《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30多年来，他也直接参与了浙江省从七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科。史晋川这一代学者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过恢复高考重返学校，在1980年代开始学者生涯——这是经济制度剧烈变动、经济学家紧密参与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些人生经历让经世济民的情怀深植他心中。

史晋川也担任过数个国家重点经济区规划和开发战略的研究组织工作，在他看来，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完全成为官方学者或者政策研究者，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应该常常去发现各种经济问题，从中可以提炼出有研究价值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例如，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后来就上升为对交易的合约执行方式演变的理论研究。

没有选择成为研究纯粹理论或者方法的经济学家，是由这一代学者的自身的局限和特点决定的，史晋川更愿意思索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他相信这些应用研究是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会吸引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

当然，史晋川的研究兴趣事实上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阶段性的变化。1980年代，史晋川首先关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1989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



问题的专著——《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1993-94年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他注意到法律经济学这一方兴未艾的新兴交叉学科，回国后致力于法律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和研究。

忙碌生活

学术之外，史晋川很早就担任了院系的行政领导。行政事务会占用很多时间么？史晋川的答案是在大学的不同发展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他看来，从自己1986年担任系主任到1996年国家启动“211工程”这十年期间，高校的行政化程度要远低于今天，院系的行政事务并不繁忙。

“除此以外，确实也和人的价值取向和勤奋程度有关，人家叫我去吃饭，我十次去一次，邀请我做讲座也是。”史晋川笑道。

教书育人是史晋川一直尽心尽力做的事情，直到去年他还在给本科生开基础大课，30年未间断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他不仅认真备课，为了上好近200人的基础课，还每年自己出钱聘3-4个研究生做助教。

杭州群山怀抱西湖，景色秀丽，爬山也是史晋川多年的爱好。早些年，每逢周末，史晋川时常带上研究生，一路爬上老和山，欣赏湖光山色，聊聊学习和生活。

他还记得在复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早上6点钟起来，先沿着学校的围墙跑一圈，冲个澡，再去读外语。”

（本文系记者对史晋川教授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1级硕士、1995级博士，现为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



图 / 洪伟力在南极半岛天堂湾

洪伟力：资本江湖，路在脚下

文 | 本刊记者 曹柠

“记得有位老伯背了个包坐到我面前，说这个问题你必须给我解决，否则你我就和包里的炸弹一起完结”。

“抬头仰望那一瞬间，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本是深黑浑浊的天幕，此刻却泛起了清澈的幽蓝。深不见底的银河，正向我走来。这全是因为它们——从东方的山顶直到西方的谷底，铺天盖地，汹涌而来，浩浩荡荡，蓬蓬勃勃！我的头颅必须环绕 180 度，才能窥见它们的全貌！”

在北纬 67 度环状带上、零下 10 度的气温里，辗转难眠的洪伟力从帐篷中探出头来时，看见了格陵兰岛上空弥漫穹顶的极光。

“铺天盖地，汹涌而来，浩浩荡荡，蓬蓬勃勃。”正像他闯荡了二十四年的资本江湖。

“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经院大金报告厅，台下坐得满满当当。洪伟力校友，这位曾经设计过轰动一时的国债期货市场又亲手处置过它关闭后的血雨腥风；也曾经在北极驾皮划艇横渡海峡遇险又死里逃生的经济学博士，此刻正娓娓讲述证券市场和 VC/PE 市场之间市场特征与行业格局之比较，和学弟学妹们分享着业内难得一见，来自一线的纵贯一二级市场的江湖风云和专业剖析，从容不迫，妙语不断。

在年轻校友和玩户外的群体里，颇有一些“红粉”。他们总是称呼他“洪哥”。“我很担心哪天他们真的叫我洪叔……”，洪哥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正经。

洪伟力博士过去几年一直担任中国最大的市场化母基金歌斐资产管理合伙人。这个当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全面发展的本科高材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批创业者，是拥有海内外丰富经验的投资人，是如今叱咤风云的金融界大佬，是热心校友事业的校友会副会长，也是走遍全球七大洲的户外自然旅行家。

忆及复旦的往昔岁月，洪哥淡淡说了一句：“那段时光，会触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他当年在上海市的重点高中，拼得很凶，凭着年级第一的成绩在 1988 年保送进入复旦，就读于当时全国高考考分最高的专业之一、文理兼收的世界经济系。数学成绩优异的他最初填报的是数学系，但是高中校长却劝他选择了世经系，理由是“以后改革开放，进这个系能出国哦。”

拼命三郎在世经系风采依旧，他和同学们大冬天晚上披着军大衣、踩着脚在三教四教天天自习到十一点，在全年级一百多人中名列三甲。而放眼望去，整个班级都是“学霸”，有 8 位高考省状元、十几个全国三好学生和奥赛保送生。大家的心思都花在了学业上，晚上拉了电闸还有很多人在走廊中自习——“谈恋爱的肯定比现在少”，这也成了如今同学聚会的经典玩笑和“遗憾”之一。不过，当年的校园社团活动红红火火，校园生活还是丰富多姿。“无论何种时代背景之下，青春总是彩色的”，洪哥这样说。

学生时代他就热心学生工作，本科阶段担任过世经系的团学联主席和团总支书记。如今他仍然感激当年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庄起善老师，称他尤为爱护学生；也还和当时的辅导员、他口中“聪明能干，想法超前”的潘小蓉师姐保持着联系。

年少自立，是那个时代莘莘学子的普遍特点。洪伟力当时还在复旦学生科技开发中心兼职。中心作为上海第一个学生经营实体，由学生自己经营除了舞厅外的所有校内学生活动场所，包括学生商店和大家沙龙等，下辖四个集团。洪伟力担任过自助集团的总经理，每个月有几十块的收入，当时平均的月生活费是 60-80 元，到了大三大四就基本不问家里要钱了。暑假里，他积极参加勤工俭学，给中国刚刚出现的外企做市场营销问卷，一份问卷一块钱，一番辛劳后也可月收入过百。至于打牙祭，全靠连续三年的一等奖学金，洪哥印象最深刻的是去东区门口的小吃摊“改善一下生活”，十一点熄灯后，晚自习归来，饥肠辘辘后的一碗小馄饨、或者一个烧饼，和一张张路灯下的面孔，永久地萦绕

在心间。

时代留下独特的烙印。1990 年代初的通货膨胀落在学生身上的感受是食堂的大排从入校时的五毛钱变成了毕业前的一块钱。校园风气淳朴，很少有阶层感，城市和农村的同学没有什么分别，官员子弟也都十分低调，家庭背景并不被大家所关注。那时的氛围是指点江山，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世经系的特点更是不仅关注国内政经，也很关注国际局势，同时同学很多都是文青，晚上寝室里的卧谈会无所不涉，人文、哲学、大师、体制……弱冠之年的迷茫和争辩似乎永无止歇，却渗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昂扬向上和真诚纯洁。

毕业二十年之后，班级老同学间的走动变得热络起来，“白头发好像带有磁性”，洪哥笑言。一直以来热衷于积极参与校友活动的洪伟力也担任了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履职以来，他最强调的是热心，最大的愿景是让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他为复旦人的烙印而感到自豪，对复旦的感情深植内心，“和复旦人在一起，潜意识里就是对青春的追忆。”他说平常的生活离不开复旦，和哲学系的校友聊聊宗教历史，向电子工程系的校友请教 VR 技术，和生科院的校友分享移动医疗，“复旦校友圈真是藏龙卧虎，学不完的知识，交不完的朋友”。前不久刚主讲完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的第三期，他马上就要带领一支复旦青年校友队伍徒步川藏。

自由而无用是自嘲，也是内省；既是独立人格的彰显，也是挺身而为之担当。这便是洪哥心目中的复旦精神。

历经风雨，见证沧桑

洪哥把自己丰富的职业经历归因于个性，偶然性和路径依赖 (Path - Dependence) 的交织。“职业道路也可以借用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概念——叫做路径依赖”。

1992 年本科毕业，洪伟力正好赶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组织从上海各名校金融外贸专业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一名加入“未来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从而进入上海市政府，在多个部委挂职工作。但没多久，原本说好的外派 IMF 或世界银行学习，因为朱市长人京而搁浅。于是他自主选择了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尽管那个时候连“股票交易究竟是咋回事”都不甚了了，便“一不留神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老兵一员”。

当年的上交所，就是“尉总带着一群老中青



图 / 洪伟力（右）1993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



图 / 洪伟力（右一）1992年初
与大学同班同学

玩创业”，他这样回忆，“那不折不扣，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都在创建，一切都在摸索，天天都是创新，天天都是挑战。洪哥先是和大师兄刘波一起成为了刚刚设立的上交所研发中心唯一的两名创始成员，数月后又奉调担任尉文渊——中国资本市场缔造者的业务秘书。草创未久，上交所总共五十来人的团队几乎天天加班到披星戴月，“哪里战况激烈就要顶到哪里去”，“很累”，但是“太兴奋了”，他说。上交所所在的海鸥饭店总是人潮如云，熙熙攘攘。海内外各类官员，机构，企业，券商纷至沓来，业务发展一日千里，洪哥得以“广识高人，深研市场，眼界顿开，心智日宽”，以至于他放弃了曾经有过的出国打算，甚至把当年他考取的汇丰银行海外管培生全上海唯一的录取名额给回绝了。

回首那段经历，洪伟力清楚记得“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唏嘘的事情”，便是作为两个核心成员之一参与了当年国债期货的设计，以及后来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分水岭之一的、震惊全球资本市场的“三二七国债事件”。

“其实回头看，当时全中国都没人真正懂这个。尉总是创业者，敢想就敢干！他就说了一句，小洪你来吧，”“然后我就上了”，洪哥说。那时候图

书馆都找不到相关资料，他辗转找到一家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地下境外外汇期货公司的驻华办公室，于是冒充客户，上门想套出开户的资料文件。面对一堆不允许带走的英文资料，他凭着记忆力记下关键词，飞快地跑到楼下写在纸片上，然后回去想方设法找外文资料，揣摩复杂的保证金交易比例和每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埋头苦干两个月，终于拿出了中国第一份国债期货合约和交易及清算制度的设计方案。

然而，两年之后，国债现货市场的不发达，监管经验的匮乏，制度规划的不健全，市场博弈的残酷，最终导致了惊天动地的市场风暴，当年市场第一的券商“万国证券”轰然倒下，多空双方图穷匕见。身处风暴眼中的洪伟力当时已被调至国债期货部，开始亲手处理他曾亲手设计的市场及其被国务院关闭后的一地鸡毛。他需要天天面对各种券商机构和投资者，面对哭诉、怒骂、争吵甚至威胁，希望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中找到多空双方妥协的支点。

“记得有位老伯背了个包坐到我面前，说这个问题你必须给我解决，否则你我就和包里的炸弹一起完结”。二十年后回眸，洪哥的语气出奇的平淡。或许是想起了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己，或许已是见惯了每一次波澜背后的刀光剑影。“第一代券商

老总们，除了一位，现在都已经不在江湖了”，他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一阵。股海沉浮，阅人几何，他心底经历的市场变幻，究竟藏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战国和春秋？

从头再来，“杂家”风范

数年资本市场中枢的职业经验和人脉积累，让洪伟力成为当时证券业众多机构伸出橄榄枝的对象。面对来自顶级外资投行和国内大券商的不少邀请，跃跃欲试、打算离开监管机关到企业第一线去大展身手，最后选择了中创集团旗下的中创证券作为自己的第二个事业平台。“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时的中创如日中天，这个国家科委是其第一大股东、财政部是其第二大股东的金融混业集团，江湖地位甚至一度在中信和光大之上。”但是，洪伟力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成为了他事业遭受波折的又一个里程碑。当他在中创证券当一面两年之后，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时任总理朱镕基在风雨飘摇的金融央企中锁定了中创集团，一夜之间，八大部委组成的重组小组进驻旗下各公司，一场新老博弈又悄然展开。

这场重组令中创证券的全国团队均遭受重创。

“江湖地位每况愈下，各项业务惨淡经营。”更令人扼腕的是，老股东、管理层、各部委、重组方，围绕着优质的证券资产展开争夺，对团队做出了种种承诺，最终却因为非市场化的利益博弈，加上证券行业与市场的漫漫熊市，使得合并重组几度夭折，整个券商团队被耽误了整整四年。“别人在前进，我们在倒退”，“心中充满了苦闷”，许多年后反思这一段经历，洪哥的话锋依然凝重，“后来我想明白了，问题就出在我自己身上，以前太顺了，从小学到大学再到交易所，一直在风口浪尖，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要走得越快越好，众多机会里就选中这一个，内心深处就是急功近利作祟，就是想做中国券商最年轻的高管，觉得很风光。结果冥冥之中，就遇上那个倒台的巨无霸”。所以他说，后来就渐渐明白许多道理，阴晴圆缺，世事无常。资本生涯就是考验人性的地方，让你领悟均衡与残缺，懂得起伏和得失。

21世纪初，在被证监会推荐赴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伦敦总部工作并回国之后，洪伟力“从头再来”，加盟外资金融巨头，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又一站。此后近十年，他管过投行，也管过投资；担任过全球最大的综合型金融集团 ING 的中国业务拓展团队的负责人，也担任过 KTB 投资集团的中国管理



图 / 洪伟力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海上冰川

合伙人。直到2014年初，正在筹建自己的PE基金的洪伟力被“招安”，担任了歌斐资产的合伙人。如今，歌斐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也是最为知名的市场化的母基金管理平台，覆盖了全国近五百家几乎所有领先的VC和PE基金，其四百多亿元的管理规模投资了中国最优秀的从天使到并购基金的整个一级市场产业链，间接投资两千多个高成长企业，直接投资数十个市场知名的直投项目，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众多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放眼资本职场，类似于洪哥的职业履历者可谓极为少有：待过政府和央企、外资、民企，干过券商，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管过作为卖方业务的投行，也管过作为买方业务的VC、PE，乃至母基金。朋友们打趣，他把资本市场相关的活儿干遍了。他也笑称自己是个“杂家”，并认真地说，“其实很多校友同窗，在商业上、事业上的成功都要比我大得多，所以这个“杂”字只是一个特点，并非

优点。合适的职场道路往往还是专精一域，百炼成钢。而我可能只是道路上的曲折多了一些，在兴趣和精力上的分散也多了一些”。

出走半生，仍是少年

浸淫投资圈多年的洪伟力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户外旅行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热衷户外自然探险的爱好者，洪伟力有着十余年的野外自然旅行经验，足迹深入七大洲四十多个国家。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境外户外自然旅行机构——野去自然旅行的联合创始人，他不仅每年亲自带队，设计线路，而且不断完善“野去”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希望给更多的户外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伙伴创造独特新颖、高性价比的路线和体验。

“因为山就在那里”。对他来讲，雪山丛林，峡谷溪流，野外的一切有着巨大的魔力。洪哥把“野

去”定义为一家文化公司，每当谈及户外文化，他的眼神总是充满神采。“户外就是登山绳牵起的责任，就是冒着风霜前行的勇气，就是疲累至极之后再走一步的坚持。”洪哥有着数不清的旅行故事，而每一次经历，仿佛总是在注脚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风雨之后见彩虹”。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潜水 and 一头海豹做惊险的相互嬉戏；在兰卡威第一次玩 Windsurfing(风帆) 被海浪冲出了港湾差点回不来；在格陵兰岛冰盖徒步时和向导一起救起了坠入冰窟身受重伤的外国徒步客；在印度洋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与大白鲨亲密接触……“最近的时候它的牙齿离我只有20公分”……顿了一顿，他补充了一句，“还好我是在铁笼子里”，然后顽皮地笑了。

在他心中，“旅行，有时便是带着乡愁找寻梦中的故土”。洪哥比较擅长徒步、登山和皮划艇。他最偏爱的是没有台阶未经开发的原始山林，陶醉于手足并用，觅路上行的过程。他在低海拔地区的登山速度每次都排第一，前两年还能“一天干掉黄山一半天从山脚到光明顶，半天上下西海加上北海。”

人们常说“身体下地狱，眼睛上天堂”，洪哥又续上一句，“灵魂归故乡”。迄今他已去过四次北极。在他的笔下，极光仿佛拥有了生命。“似有一团焰火于东首天际升腾起来，渐渐地越烧越旺。火舌纷吐，向头顶蔓延而来。她像炊烟，从亮到暗，用尽头那一点若隐若现来勾引你的遐思；他又像闪电，用几道简朴率直的笔划，堪堪就要捅破宇宙的帷幔。”而伫立冰川之上，“这是数万载融结积淀后的驻足，这是千万代斗转星移后的回首”，于是他说，“我屏息倾听，竟没有任何声响。万籁俱寂。甚至风都停下了脚步。万物似乎凝固。不知如何，突然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善者不辩’，‘为而不争’。忽觉这一瞬间，时空长河绵绵流过，一声叮咚，只在心头落下。”翻开他的游记，旅行便是心灵的倒影。

除了海外，国内的大藏区是洪哥的最爱，每年总要弄一两次深度的探秘。手持藏地旅行图，西至阿里，东及九龙，北到敦煌，南抵怒江，“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几次上高原了”。他如数家珍地点评着一条条线路，一如他带着校友们走在雪域高山信手拈来的那些典故风土、地质人文，常常令人误以为他的博士学位来自历史或地理专业。纵横交错的路线貌似他已经走了大半，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去过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我还没有去过的地

方更多”。虽然曾经在雪山骑马时遭遇持刀抢劫，也曾高原自驾时遭遇不测，但“只要回到大城市之后过上一段，心里就会按耐不住地惦记那些雪峰和经幡。”借助旅行，他和校友们也为当地学校捐款捐物，为儿童医院慈善募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投资者和探险者的精神其实一脉相承，“人生也是投资”，洪伟力反复提起这句话，他用的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如何在风险与选择中历练人生。

他语风简练却文采飞扬，身形瘦削但体格健壮，眼镜背后仍然目光如炬。片语之间吐露幽默，论断之中饱含睿智，他展开的是一幅资本市场的广阔画卷，更是一位复旦老学长的人生经历和思考。

当被问及给当下学子的寄语，洪哥诚恳地说：“我能理解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困惑和苦闷。和我们当年相比，他们多了很多玻璃做的天花板，也很容易被眼前的障碍、不公、挫折蒙住自己的潜力。其实，当你把眼光放长些，把心态放平些，把天地放宽些，很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适合你生长的缝隙，只要你钻进去，在波动中坚持自己不要放弃，水到渠成的时候终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到来。”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是他对别人讲的，相信也是对他自己讲的。

(本文系记者对洪伟力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洪伟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8级本科生，现为歌斐资产管理合伙人，资深户外自然旅行家。)

人生何必只如初见 ——复旦经济系九六届本科生聚会有感

文 | 何寒熙

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这么意义非凡的大事件，其实是在吴刚同学（你没看错，就是砍桂花树的那位）从杭州来沪出差期间的一次小范围聚餐时敲定的。席间大家照例感慨时光飞逝如电，数了数日子，才恍然惊觉离开学校已经妥妥地满二十年了，于是就有人提议该来个同学大聚会以资纪念。周同学随手拿起电话，给下属的某单位打了个招呼就谈妥了聚会的地点，留校的许同学又立马承包了联络学院接待的活儿，七嘴八舌之后，一个完美的活动方案就基本成型了。不得不承认，相比二十年前除了青春一无所有的彼此，如今的同学们更成熟更有能力也活得更有自由度。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重返校园缅怀青春。

聚会定在了五一假期。筹备组邱同学连夜自制了一个活动通知的微信页面发在了同学群里。点开来，天后不带人间烟火气的声音响起：“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唱得真好，歌词也好，匆匆那年留不住，那也不能相忘于江湖，就是要“藕断丝连”、就是要“互相亏欠”，一辈子想到TA就觉得良心不安，于是永恒……这暧昧的调调顿时让群里老心荡漾，各种呼叫有故事的男同学女同学们，大有把同学会变成故事会的架势。还好有同学一本正经地定下了本次同学聚会的基调：“天高鸟飞尽，知倦返巢闲。相谈两不厌，唯话同窗情。”重点是“同窗情”啊同学们！更有心思重的女同学，担心同学会变味成“炫富会”，事先约法三章：“忘却身份头衔，只记同学少年。莫谈股市楼市，惟考酒品人缘。”其实……想多了。大家都是受“自由而无用”精神熏陶的复旦人，以

无用之心建有用之“功”，功业不论大小，心胸可比宽窄，我们要比，那也是比谁的心更“无用”。

群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热络，就像节节攀升的气温。终于，就在气温飙升到二十八度的五月一日，复旦经济系九六届同学聚会的时刻，到了。

第一站，国权路600号经济学院。这座落成于2006年的大楼，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都是陌生的。顺着指示牌一上到二楼，大家就被布局别致的中厅锁住了目光。整个中厅沿着楼道和墙壁摆放了一排排小巧的桌椅，紧挨着宽大的书架，往里走几步，角落里更有完整的吧台，几盏精致的吊灯低垂，墙壁上挂着两副超现实主义的画，仔细看落款，原来是经济学院79级许德民学长捐赠的画作。特意赶来招待我们的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老师见我们啧啧赞叹的样子，很自豪地说：“这个咖啡吧也是由学院的校友、98届汪新芽捐赠的。”岂止是这些！我们早在去年年末就看到新闻，复旦收到史上最大单笔捐赠——一份7个亿的大礼，也是来自经院校友、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呢。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校友的回馈，又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着学院的实力，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学生，这不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

同学们先先后后地到齐了，有的刚下飞机还拖着行李；有的携手而来，昔日同窗已成模范夫妻；有的拖家带口，大宝二宝地上走，三宝怀里乐悠悠……忽然上来了一个戴眼镜的敦实男，绕着同学们走了两圈也没人认出，逼得他自报名号“我是张**啊”，大家顿时才惊呼着一拥而上，天！谁能想得到大学期间只有一百一十斤的卢柴杆儿如今变成了一百七十斤的胖大叔！岁月岂止是一把杀猪刀，





图 / 何寒熙军训第一天剪掉了长发

更是一把又一把的猪饲料，催肥效果真正好……

第二站，新江湾校区。这又是同学们深感新鲜的地方。大巴行驶在干净宽敞的校园大道上，两边是如茵的草坪和挺拔的乔木，三两学弟学妹惬意地赤脚坐在树下看书。留校任教的许晓茵同学和陈钊同学热情地介绍着路过的一座座簇新的大楼，这里是生命学院的“自留地”，那里是老师的公租房……江湾校区与主校风格不同，散发着浓浓的现代气息和盎然的生机活力。正该如此。百年复旦，既要传承百年的“家风”，也要跟随时代的脉动，且复旦兮，自强不息，而我们这些复旦人，即便走出了校门，也无时无刻不感受着来自母校的荣耀……

参观、合影、畅聊，“且二代”们把美丽的校园当作公园很是撒欢了一阵子。且宛午餐后，大巴驶向青浦，同学聚会的第三站，是淀山湖边上的一个培训学校。

湖边风景甚好，女生们结伴去吹吹风。摄影师跟了一路，抓拍了一路。有人很心虚地反复叮嘱：

“一定要好好P图，把皱纹都P掉P掉！”摄影师哈哈大笑。斜阳渐渐西下，光影动人，又有人突发奇想，要拍一张“青春”的照片，于是全体女生喊着一二三齐齐跳到半空，张牙舞爪的姿势定格在照片里。按世卫组织的标准尚算青年的女同学们，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年轻也是拼了。其实，青春时期没钱没品味灰头土脸，真不见得是最美的时光，反而是今时今日，相由心生，个个都眉目舒展、仪态大方，在我眼里，你们都比最年轻的时候还要年轻。光阴流转，又有何惧？

晚宴时分，伴随着《see you again》的婉转歌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大学期间的照片，其中有很多是大学一、二时在南昌陆军学院军训期间的合影。男生们不由自主唱起了各种红歌——《说句心里话》、《十送红军》、《打靶归来》……顿时，记忆的闸门打开。这是一段只属于1989-1992北大和复旦人的历史。这几年里入校的北大和复旦学生都先到军校军训了一年，注意，不是一个月，而是整整一



图 / 何寒熙军训时在井冈山拉练

年！突然间，人生从五颜六色变成了一种单一的颜色——军绿。日子变得像床上的军被一样方方正正、规规矩矩，晚九点必须熄灯，吃饭前必须拉歌，每个星期放风一次，每次每个班只有一个人可以换便装出校门到市区去逛逛。行动受限制，饭量却膨胀，甚至有女生创下了一顿饭吃九个包子的记录。每个女生都像气球一样被吹了起来，体重普遍达到了历史巅峰……

隔了二十几年的光阴，男生们的红歌唱得依然非常熟练，显然，一年的军训生活，不可避免地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早已不再思考军训一年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只知道，我们经历了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增添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回忆，更因此，我们不仅仅是一起同过窗的大学同学，也是一起扛过枪的亲密战友，双重的关系，使得我们之间的情谊山高水长。

这次聚会，很遗憾有些同学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参加。远在巴西为某国有大行开疆辟土的李晓波同

学发来了祝福的视频，已是上海交大“颜值与才名兼具”的陆大教授唱了一首歌发到群里，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方颖同学在国外访问，看着我们纷纷晒照，当晚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话：“今晚朋友圈被复旦经济系九六届本科生毕业二十周年聚会刷屏。四十不惑，是人生负重前行的阶段，责任与担当，更不能忘却当年的理想。祝福所有同学。”

我给他回了八个字：“莫忘初心，一直向前”。人生不能只如初见，谁也不能回到从前。

于是也只能不忘初心，一直向前。🍀

王槐：我的大学

口述 | 王槐 文 | 路文廷

关于军训

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我们这三届，90届，91届，92届，都军训一年，都上了五年大学。当时复旦大学的文科院系大多在南昌陆军学院军训，理工院系大多在大连陆军学院军训。

当年军训的时候，按照军校的建制是三三制，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三个班。我们经济91男生一共39人，正好组成了一个区队，是26队一区队。中队长、教导员和区队长都是教官，其余的副区队长、班长、副班长这些职位都是学生担任的。因为我是北方来的，比较能吃苦，当时就被指定为副区队长，副区队长的职责是协助区队长进行学员管理，班长的职责主要是抓军事训练和班组管理，副班长主要职责是抓后勤内务管理。作为副区队长每周都要写周记，写总结，哪里做得不好，哪里需要改进。后来为了锻炼更多的同学，这些职位就轮流担任了。我们当时换一个副区队长，班长副班长都要换掉，这样就一下换掉十几个人，大家都有机会当。直到接近军训结束准备阅兵时，中队长认为老副区队长有经验些，就让我们这些老副区队长重新带领同学直到军训结束。

我们那时时间分配大致是70%的时间上文化课，30%的时间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特指军事战术训练课，但我们得日常生活都是按部队里的作息来的。早上起床号响起必须5分钟内起床到楼下集合，要做早操练队列。然后给你10分钟时间洗脸刷牙，再排队列吃饭。我们吃饭前还要组织唱歌，唱完歌请教官讲话，教官一般会把当天的课程或训练安排进行通报，讲完话才能吃饭。吃饭的时间也

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吃饭时也不随意说话。

军训的时候还依然会日常上文化课。像大学语文、大学英语都是复旦派过去的老师。我们还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上军事训练课时，要佩戴器械。每人一把枪，平时放在枪库里统一保管。我们要练队列、踢正步、练瞄准打靶，练拆卸器械，看谁最短时间能把步枪或冲锋枪拆卸和组装得最好。我当年射击考核，步枪是合格、冲锋枪是优秀，5发子弹打了48环。我们上射击训练课时，练举枪和瞄准一趴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动，时间长了很无聊，但到了实弹射击时就很兴奋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步枪百米打靶时，有个同学瞄错靶位了，最后一枪打在别人的靶上，自己的靶子上只有四个枪眼，隔壁同学的靶子上有六个枪眼。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慨良多，军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回忆，也在意志品质、作风养成、为人处世等方面使我们获益不少。但当时的感觉就是恨军训，因为太苦了。我们毕竟都是些文弱书生，刚刚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就面临整整一年的严格训练。刚开始训练的时候除了浑身酸痛外，练单兵动作尤其是匍匐训练时，胳膊肘都会磨破出血，男女生都一样。因为单兵训练时，你要匍匐前进，要翻滚，还要最快持枪，最快击发射击。前进时不管面前是水坑还是泥土，一喊匍匐前进，就要马上卧倒。军训当时给我们的影响不仅是增加了一年的学习，念了五年本科，社会上在我们就业时还有些不理解。我记得上一届（90届）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发



图 / 2011年4月王槐到瑞典学习考察

泄不满，把复旦的一些路灯给砸了。不过我们这届没那么干，大家还是怀着平和的心态离开复旦的。

不过后来就渐渐体会到军训的好处了。就像那句口号一样：一年军训，受益终生。我在1992年跟随复旦代表团去南昌陆院给92级他们讲军训经历和体会的时候就深刻感悟到了。军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年军训，成为每个人不可磨灭的一个烙印。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军训当时很苦很难，但也很有趣，更加值得回味。我的人党宣誓就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完成的，当时我们系共有四位同学第一批入党，还有许晓茵、黄悦和吴全昊。我觉得军训给我带来的一个影响首先是不怕困难。军训时确实很苦很累，我们都经历过了，没有向困难低头，这种点滴的意志磨练对于今后的学习工作都有益处。

第二个是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比如说时间观

念，我和别人约好几点见面我就要争取准时到。还有就是令行禁止，说到做到，守纪律、懂规矩。这个不是说你在学校书本上就可以学到的。

第三个就是团队精神。部队里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去完成的，这时互相配合，互相照顾的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我们组织武装越野，军训结束前到井冈山去拉练等等，有时候一个徒步就要几公里十几公里。你要背着包，背着被子，雨衣鞋子都在你身上，武装行军时枪械挎包水壶等都要背在身上。这个就特别需要团队互助，比如蒋琳琦、胡德元同学当时体质好，在行军过程中就主动帮助同学。蒋琳琦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背了4个水壶3把枪。有的人是背不动啊，一把枪也是几斤重的。我们现在毕业的时候聚会，为什么一召集，大家就一呼百应，这就是一种团队意识。



上图 / 大学时代的王槐。左起: 钟百元、高峰、洪世海、王槐
左下图 / 1992年5月在井冈山拉练, 摄于红军会师广场



图 / 1996年4月摄于复旦团委门前



在学习方面,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习历史政治。刚开始觉得很枯燥,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全身心地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的历史的机会。而这对于当时了解社会、判断时局的下一步的走向还是有帮助的。至少你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撑,不会说别人一说什么,我就跟风倒。现在有些年轻人就不行,我现在给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就说,你发表意见前你又了解多少,你没有了解,你就不要很简单地说什么结论。军训就给了我们一个底蕴。这种综合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军训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在这一年结束后才会有很多的感悟,在其中的时候是体会不出来的。人都是一样,当时你做的时候,体会不出来,沉淀下来,就有感情感慨感悟了。

关于 9115

我们班有自己的班刊《百合》,有自己的班歌《百合》,还有自己的报纸《经济学人》。当时创作这个班刊是我们辅导员提议,然后我们集体决定的。《百合》一开始是手工刻蜡纸印刷的,当时誉印社的经理是我们班的,在班刊印刷方面就方便些。

手工刻蜡纸不能写错,写错一张纸就废了,我们班几个写字好的同学齐上阵,刻好蜡纸后,放在那个油墨网上,涂上油墨,油墨网下是纸盒,拿那个滚轴一滚,一张班报就印好了。到后来就变成印刷机改成半自动的了,刻蜡纸裹上油墨后,然后一摇一张,一摇一张。再后来就是铅印了,不用手工刻蜡纸了。当时有那个打字机,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找,打到蜡纸上。班刊总共出了20期。成本来自班费,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众筹,还有些同学出去勤工助学赚钱充班费,300块钱、500块钱地赚。后来居然还有一个企业捐了1500块钱,是我们浙江的同学回去拉的赞助。

我们班班干部特别多。我们辅导员觉得要让每个同学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他鼓励学生多到学校学院社团去历练。所以我们有班长,副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等等很多。班级里的2/3的同学都担任过班委,每一年选举一次。所以大家毕业的时候履历不用编,同学大多都干过,也都有经验和能力。我第一年就进了班委,担任生活委员,大家都喜欢生活委员,因为每个月发30块钱的生活补贴,每

次我去大家宿舍,大家都特别开心,见到我就又有钱了,可以买饭票菜票了,四年人脉积累下来,到了最后毕业那年我就被大家选为班长了。

我们班毕业的时候还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这个荣誉每一届一个,我们是91届唯一一个获奖的。在3108教室评上海市三好集体的时候,我是主持人,记得当时是陆铭、陈钊、刘影这群俊男靓女上去答辩。陆铭是主答辩手,嘴皮子很厉害,想必经济学院的学生已经领教过陆教授的风采了。最后结束时我们全体起立唱班歌,其他班都没有这个自选动作,一下子就吸引了评委很多的分数。

我们班出了很多学术人才,像陆铭、陈钊、方颖、丁维莉他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经济学术小组,创办了《经济学人》报纸,当时就展露出这方面的才能了。

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积极参与到学校学院各级团学组织和社团活动中,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我自己也经常参加社团活动。我当时在校团委工作,刚开始是组织部干事,后来担任组织部长,快毕业那年牵头组织学校团代会的选举工作,团代会上当

选为校团委常委、秘书长。记得 1993 年浦东新区管委会刚成立不久，校团委组织到管委会进行共青团植树活动，我们事先通过学校方面联系上了苏步青教授，希望苏老给我们题词“共青团”。苏老很认真，说：“好，（这是）家庭作业，我拿回去写”，第二天就交稿了，在我们眼里苏老真是慈祥又可爱。当时在浦东新区管委会的临时办公处植树后，把苏老题写的“共青团”牌子插在了树旁，不知现在还在不在了。

关于聚会

这次返校 20 年聚会怎么来的呢？是 3 月份我们一个杭州同学来上海培训，部分同学聚在了一起。喝老酒的时候，大家感慨时光飞快，转眼毕业 20 年了。大家都感到我们该聚会了，在吃饭的时候就把五一聚会的事情定下来，第二天一个 19 人的筹备组成立了，关于聚会筹备的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

记得毕业一周年的 1997 年夏天和五年前 2011 年毕业 15 年、相识 20 年聚会，我们都在宝山。五年前的聚会是在国庆长假，同学们参观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和顾村公园，随后的座谈会上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讲这 15 年的经历，同时爆料复旦学习期间的各种糗事。当时聚会安排了全程录像，现在回看仿佛就在昨天。5 年前的聚会来了同学 48 人，没有安排带家属。这次算上家属有 70 人，组织活动的难度不比上次小，因此这次一切从简为原则，还有学院全球校友会的支持，确保了聚会顺利进行。

我们现在都在商量下次聚会的时候不带家属，下次聚会的时候要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要圆桌座谈、游戏互动，这样可以再一次激起青春的回忆，弥补这次聚会同学交流不够深入的遗憾。下一次聚会我们都快 50 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帮老家伙会更加怀念复旦的学生生活了，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关于德元

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有人来不了，但这次聚会有人永远也来不了。胡德元是肝癌晚期，2014 年的时候走的。他毕业以后工作没多长时间就得肝病，在家休养了两年以后，又复发，中药控制住后，觉得身体还可以了，就来到上海工作，在宝山买了一套房子，然后结婚生子，很幸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幸的是 2014 年过完年他在体检中查出罹患肝癌，第一时间做了手术。

我们同学知道以后，就第一时间想各种治疗方案。我们有同学在华大基因做财务总监的，就想基因疗法、生物疗法，有同学请人从印度带回靶向治疗药的，有同学找华山瑞金等专家咨询治疗方案的，我也推荐德元去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处尝试中医药调理。同时，为了缓解德元一家的经济困难，我们发动同学捐款筹集资金，大家讲好原则上每人 2000 左右，当时微信还没有那么普及，就在 qq 群里讲，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筹集了 15 万。我们到最后用了 10 万块钱，还是没有留住德元。在德元病重期间，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上海的同学去看他。当他回到老家那边养病后，我们也组织了不错的同学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两手准备了，剩 5 万多块钱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德元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 9115 全体要一直关心孩子的成长，帮助他妈妈抚养孩子成人。前段时间，刘影代表我们去看了他们，孩子要上初中了，心态方面还是蛮阳光的，妈妈也很坚强，不想过多地麻烦同学。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想每年安排同学代表，或者有些出差去宁波的同学能有机会到宁海，看看孩子。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 9115 的凝聚力和满满正能量，我为是这个集体的一员而骄傲，相信这个成功的集体会走出更多成功的同学。

我的大学也是大家的，我们曾经共同经历、共同成长，让我们更加幸福地一起老去！🍷



蒋琳琦：在挑战中提升自己

文 | 本刊记者 周奕辰

从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的复旦大学出发，到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的德勤上海办公室，正常路况下，只需 25 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对于 1991 级经济系的蒋琳琦，从一名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到一名德勤的新员工，一共经过了 8 年。他硕士毕业后加入了德勤，9 年时间即升格为德勤税务合伙人，这一速度在同行业中堪称佼佼者。“我的路径算是比较独特的吧。”他笑着说。

考大学记

高考结束，蒋琳琦差点去了北京。

他出身浙江绍兴市诸暨的一个农村家庭，但天

性聪敏，从小成绩就好。初中，全校一共 17 人考上普通高中，他考进的那所高中，理科的师资力量比文科强。兴趣广泛的他当时还想着学文科，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纷纷来劝，最终才没选。现在看来，这一选择或许是明智的，“当年考上大学的 42 人中，只有 1 人是文科生”。

但高考结束，三年前的纠结再次上演。

“我当时最有可能填清华北大，”他回忆说，“因为很多亲戚都在北京。”但为了弥补高中没念文科的遗憾，他思忖许久，选择了复旦经济学院。他说，当时好大学偏文科的专业中，这是唯一在浙江招收理科生的。

也不是从来没有想过复旦。早在 80 年代他还

在念小学时，他的叔叔就被复旦计算机专业录取，“当时挺轰动的”，心理上也有了一种亲近感。

1991年深夏，背着一个箱子，蒋琳琦到了火车站，碰巧遇上管理学院的一个老乡，两人一起上了一辆绿皮火车，呜呜的汽笛声中，火车没有驶向上海，而是缓缓西去。一夜之后，他们到了南昌。

培养方案规定，1991级的所有学生，入学后要先军训一年。

七年复旦

到了南昌，在南昌陆军学院安顿下来后，生活变得秩序井然，也可以说，没有太多的想象力。

早上吹哨晨练、刷牙洗脸、排队吃饭、排队上课……每天像完成一道道程序一样，去完成这些步骤。周末进南昌城里买东西，也要请假，而且一个区队一次，只放行1-2个人。

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艰苦的，但蒋琳琦受得了，“因为我以前的环境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

现在回忆起来，蒋琳琦认为，那一年的军训生

图 / 军训时的蒋琳琦



活成了自己这一届同学共同的标签和印记。“它本身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经历，所以你很难说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衡量到底值不值得。”后来的同学聚会，军训岁月也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一坐下来讲两句话就讲回军训了。”

军训一年后，他回到复旦，回到校园生活的怀抱。

那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大学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和可能性，蒋琳琦身处其中，也试图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本想参加管弦乐队练习萨克斯，但萨克斯班已经报满，又不愿调剂去长号，最终放弃。后来就花20块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转而自学吉他。

和高中时代一样，自由阅读占据了他生活最大的篇章。复旦的藏书很多，他“就像开垦土地一样”，不断挖掘进取，那时的蒋琳琦，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

暑期也是如此。为了抓紧时间看书，他每次就回家半个月，其他时间就在学校待着，在图书馆泡着。“挨着书架一本本看过去，把感兴趣的抽出来，书架从序号A—Z一排排都扫过一遍。”

本科班级的学术氛围很浓，有相当比例的同学愿意在学术上花时间。90年代是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在大陆声名鹊起的时候，同学们十几个人组成自发的兴趣小组，互相介绍经典著作阅读讨论，畅所欲言，甚至搞过一本内部刊物——取名《经济学家》。

在大四毕业的十字路口，蒋琳琦选择继续留校读研。研究生阶段，除了继续钻研学术，他也开始接触一些另外的工作：帮助老师处理资料，翻译一些专著等等，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新的挑战。

研一后半阶段一次机会，改变了他原本“学术研究道路上走到底”的想法，让他独走蹊径。

霍布金斯大学和南大合作在南京设有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为研究生级别的交流项目，复旦准备推荐学生报考，总共两个名额，由学校承担学费。“我看了它的简介之后很感兴趣，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就向辅导员报了名。”层层选拔，经过中美中心的笔试和面试后，他揽获名额，去往南京。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宿舍是两人间的，蒋琳琦和一个美国人分在了一起。这种与国际学生全方位交流的机会，和中美中心多元文化的氛围，让他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其他的文化。图书馆里最新



图 / 蒋琳琦全家福

的资源也满足着他的求知欲，“许多美国新出版的书籍通过空运很快就有了。”在自由和全新的空间里，渐渐地，他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

德勤十七载

回忆起没有经过严格的面试程序就入职德勤的经历，蒋琳琦说，这“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机会。”

1998年的5月，他在南京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德勤合伙人的秘书，说如果他对暑期去那边实习感兴趣的话，约个时间到上海来面谈。专门回了一趟上海，和合伙人聊家常似的面谈完，这个实习就定下来了。

6月底，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课程结束，3个月的实习生活开启。

德勤的业务非常专业化，对工作技术的要求也高，实习生能够做的也就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在有限的基础性工作之外，也有不少比较有意思的机会，

得以展现自己的能力。“例如，经理给了几本我们称之为蓝宝石的法规汇编。这是当时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人手一套。我先是前后通读，然后把部分重点内容进行浓缩、归纳和总结，然后二次编辑，自己设计成了一本便于携带的小小册子，让同事无需前后翻蓝宝石就能迅速找到、参考重点内容。”就算以现在的标准看，这本小册子做得也算很不错。当时，这本小册子给同事们带来了方便，“带了小册子出去做外勤工作的同事当时还专门为此请我吃饭，表示感谢！”

等到进入毕业生求职的季节，实习时的带教经理打来电话，问他发展规划，后来说，合伙人希望他毕业后能来德勤。他早已被德勤团队的气氛吸引，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去办公室跟那位合伙人聊了一次后，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正式入职德勤后的蒋琳琦，依然没有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

2002年，深圳分所成立，需要寻找有经验的员工去发展那边的业务。五一假期后一上班，主管



图 / 2016年五一9115班返校聚会。左起：蒋琳琦、诸华江、袁波梓、周小月、许晓霞、何寒熙、孟楠、张斌、唐奇、廖丽华、周超

合伙人喊他去办公室聊，征求意见。他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于是一拍即合。他去了深圳，“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重新开始，确实非常辛苦，但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两年后，重新回到上海，所在部门开始组建一个跨境业务团队，他作为核心骨干，带着团队做了很多项目，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庞大的交易金额，“那段时间项目紧张的时候是通宵加班后接着继续上整天的班，连续如此创造了个人加班的记录，后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突破过。”

在一次次接受挑战的过程中，他总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而先前积累的广泛经验，又不断助益着他去开拓新的疆土。

2004年底，他所在的部门在公司的南京分所组建新的业务部门和团队，开拓江苏，但开局不顺，有不少困难。2005年中，他爽快答应了合伙人的安排，往江苏跑成了生活的新常态，一周5天的工作里，有3-4天他都是在江苏。团队培养和业务建设，蒸蒸日上。几年后，清单上又新增了厦门和福建，成为鼓浪屿边的常客。

从一个普通员工出发，做到现在这个高度，对蒋琳琦来说，心态上不言而喻也是一个逐步突破瓶

颈的过程。深圳那几年的工作节奏，他至今记得清楚：因为人手不充足，大部分人都要从零开始去培养，这就让工作量凭空多了好几倍。周末加班是常态，“晚饭经常是后半夜才吃”。

面对让人窒息的压力，自我调节的分寸往往没有把握好，身体经常性难受，去医院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好像达到了一个瓶颈。”在后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一直为怎么保持好平衡纠结。

但就像一层窗户纸，突破了就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些年，蒋在处理压力上显得游刃有余许多。繁重的工作下他依然尽量确保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如果晚上没有特别安排，他都会争取在孩子睡觉前先回到家，陪他们聊聊天、陪睡，“小朋友都和我很亲热，吃饭时会一个劲往我身上靠。”孩子们也很像他，都喜欢看书。

他还兼职被复旦、财大、厦大、浙大聘任为研究生校外导师，举办讲座传授专业的业务知识和经验，解答年轻学生在职业上的困惑。

“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吧。”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透过玻璃幕墙，往外望了望黄浦江对岸生的高楼。

周超：生活本色

文 | 本刊记者 袁超颖

周超是一个没有大故事的人。从1996年毕业到现在，仿佛人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爱情、家庭、事业……一切都平平淡淡、稳稳当当。

名片上规整地印着上海上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115班的周超，正靠在自己办公室巨大的柔软的沙发上，仰着头，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活。

半晌，他摸着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读书经历都差不多嘛。”

这一笑，就让人看到了二十年前毕业时那个初出茅庐的简单少年。

大学，此去经年

“一讲好多年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0、91、92级，是鼎鼎有名的“军三届”。南昌陆军学院，这所后来被很多“军三届”学子视为第二母校，挥洒了太多汗水和泪水，格外亲近、格外熟悉的地方，是考入复旦的周超抵达的第一站。

十八九岁尚懵懂的年纪，离开父母，离开家，接受无条件服从的全军事化管理。拉练、行军，甚至种地、养猪，一切从零开始，一点点学起、做起、背负起。周超还记得，在南昌陆军学院的一整年里只回了一次家。

在周超看来，无论从体魄还是精神方面，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年给予他的影响之深，并不亚于之后在复旦校园内的四年。

开始在复旦的学习生活后，除了经济学院

9115班，周超眼中还有第二个温馨的集体——“大家沙龙”。大家沙龙是复旦勤工助学中心光华公司的下属实体，是一个类似于社团，却可以盈利、发工资的有点特别的学生组织，这在大学校园里新鲜而有趣。

本部校区东面靠国定路一侧楼群——现在被蓝色铁皮栏杆围住改造的地方，曾经是周超和同事们的“据点”。饮料咖啡鸡尾酒，加上现成的小吃，就是那时大家沙龙的全部，没有烘焙技术，咖啡是速溶咖啡，鸡尾酒也是简单调制而成。规模虽简易，大家却热情不减，经理和员工们用心经营，同学们也常来常往。

在“大沙”，周超收获了乐趣、欢笑，收获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还有那么一点儿“经营理念”。他笑言，尽管“大沙”只是一个很小的经营实体，但在踏入社会前，能够接触到小企业的运营、积累财务知识并学会企业人员的管理，看待一个小的实体如何设立目标，制定工作计划然后去完成，这和大型企业管理总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似乎也为日后经营企业奠定了小小的基础。

二十年后重走校园路，周超发现很多地方都变了。大家沙龙搬至学生超市附近，卖上了手工烘焙的蛋糕、饼干和精心调制的咖啡、奶茶，原来的“据点”成为蓝色铁皮掩映下的一片荒芜。但是，二十年前的人情味还在。

其实很难说“自由而无用”的复旦到底带给周超多大的影响。他没有那么爱学习，爱听讲座，也忘记了很多细节。但他意识到，润物细无声，复旦所给予他的终是潜移默化地映衬在了之后的人生轨迹里。



图 / 周超、景砚秋夫妇

我的“复旦姑娘”

在大学校园里，周超遇到了他从此一辈子挂在心尖上的“复旦姑娘”。

不知从哪届开始流传下来的说法，在复旦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情：走一次光华楼正门，在三教刷一次夜，以及最为必要的——谈一次恋爱。周超呢，则顺风顺水就将恋爱发展成了婚姻。

现在的太太，当年的同班同学景砚秋，是一个温柔而文静的女孩子。不张扬、性格内敛，但是很聪明。

“她属于成绩特别好，特别优秀，笔记特别全的那一类女生吧”，提到太太，周超一连用了三个“特别”来描摹少女时期的景砚秋在他心中的形象。认真的女孩子最让人心动，他忆起，当时有很多同学在考试复习前都问景砚秋借笔记。

“你那时候会借她的笔记吗？”

“我没有，嘿嘿，当时也不是很追求好成绩。”

然而不管怎样，是同班同学，又经常一起上课，一来二去就顺理成章走在了一起。大一、大二，刚刚相遇、相识，大三、大四，已然相知、相守。周超想不起细节来，“不过应该还是我先表的白吧”，轻轻一笑。

1999年，毕业三年后，羡慕旁人的“班对”步入了婚姻殿堂。

工作后的周超在上房产业，景砚秋在万科集团。像很多平凡的小家庭一样，孩子的到来给波澜不惊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精彩，整个家庭的重心也随之改变。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每长高一厘米、每跨出一步都值得更多的关注与期待，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景砚秋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担负起培养儿子的重任。

“她对小孩学业抓得比较紧。”周超称，太太



图 / 2016年5月1日经济9115班返校聚会，和当年同寝室同学合影。左起：张忠华、周超、李峰、钟昌元

双休日会送孩子上培训班、上各种课程。孩子现在奥数成绩很好，会在外参加比赛，他在公司忙事业，所以大部分都是孩子妈妈的功劳。

“我们不是特别浪漫的人。”周超笑着说，“故事比较少的呀。”在他看来，从婚姻到家庭，爱的航船一直都在既定的航线上。生活也本该如此——始终是一个相互体谅，相互扶持的过程。

周超很少跟太太讲事业上的事情与压力，也从不会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如果企业拿下了大项目或是碰到重要的开心的事情，才会分享。

他看到，当年优秀出色的学生景砚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更广的社交圈，放弃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专心为家庭付出着。“太太很伟大。”周超有些感慨。他也希望，等孩子长大成人后，能干、辛劳的太太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又何尝不是因爱而作的选择呢？

“我的复旦姑娘，个子不高，白得像块棉花糖，是个小馋猫。”去年的毕业歌曲《复旦姑娘》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从校园到家庭，从恋人到爱人，景砚秋是周超心中无可取代的“复旦姑娘”。

“关于复旦我想的全是你。”得知有《复旦姑娘》这么一首歌，他表示一定要听听看。

企业的“舒服”状态

2016年，是周超在上房产业的第二十个年头。

几乎是一毕业，他就进入了上海市上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基层岗位开始打拼，到现在成为这家公司的总裁，引领几千名员工的发展与进步。

二十年来，周超事业的重心与热情都献给了他的“上房”。他参与并见证了上房产业发展中每一次重要项目的取得、每一个大跨越的里程碑，看着



它从雏形开始——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那样——一点一点长大。

2010年中标上海世博会官方物业管理供应商，在世博会期间为大量游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之后，陆续中标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东交停车库、东方体育中心等项目，今年年初，又中标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重要项目。现今的上房产业作为第三方物业公司，不仅在上海的物业管理队伍中排名第一，在全国也名列前茅。谈及近年来企业的发展成果，周超如数家珍。

然而，第三方物业公司属于典型的市场化企业，所有项目订单都需要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2000年前后，上房产业还很弱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只有约三四十个项目，也经常有很长时间接不到订单。

面对企业经营的压力，周超没有怕过，反倒是账单全收。

他总是觉得，有压力是正常的，可能一段时间内工作不是很顺利，但总能调节好。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基础工作，还是能迎来良好的势头。

周超回顾企业的这二十年，总体发展是平稳的，没有碰上特别大的挫折。“起码”，他笑着说道，“要死要活的那种挫折没有。”

稳健发展，也是上房产业最重要的企业文化。

一个企业的性格或多或少能体现领导者的理念。周超提及，在市场竞争下，企业会慢慢会向投资控股型转型，但主体业务还是维稳的，不会有大波动。在保证坚持主体业务稳健发展的同时，才会尝试做一些积极激进的，类似互联网创业等与风险投资结合比较紧密的业务。

“毕竟我们企业员工数量很多。”

谈到企业发展，周超三句不离员工。

因为有很多的员工，因为每个人都值得关注，所以企业更有责任搭建一个好的平台，让员工能够成长。除了发放薪酬照顾家用之外，更要给员工们创造业务精进、事业发展的空间，最大化实现他们个人的价值。

而员工的职务晋升，也并不只意味着当更大的官，应当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当他们能力准备好了，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心底愿意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就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周超不一定是多么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他希望他的企业能够诚信经营，稳健发展，受人尊重。

现如今企业形态很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就像不同的人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企业关键是找到舒服的状态，就行了，像每个人一样，是不是幸福并不只看获得多少财富，取得多大成就。”

找到舒服的状态，就对了。

二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其实我们只希望一个平凡的世界，就像这一个沾满泥土的番茄。”

周超有一天的朋友圈如是写道。

他觉得自己很平凡，没有大故事。

他有微信，但很少发朋友圈，要发也是关乎孩子的成长片段、或是某天走过的地方，跑过的步，像生活速写一样。其实你很难把他和一个纯粹的企业人联系起来。与孩子打打闹闹，在滨江步道散步，在新天地、美术馆流连，时常跑个五公里，也会惦念着苏州协和菜馆的腌笃鲜。

在自己的公司里，他会给企业的微信公众号、内部印发的报纸写写文章，畅谈企业转型与发展，也跟员工聊聊天。

没有特别光鲜的出镜，就像沾满泥土的番茄，都是生活本来的模样。

他说，“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子。”

二十年来，周超的生活像一列四平八稳的列车，轨道上的每个站点都是一次丰收：从爱情，到家庭，到事业。但他从没有细数过自己获得了什么，也不刻意去记得什么。

只争朝夕，他关注的是列车行进时的风景。

他只是觉得孩子研究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样子很可爱，市场部的小伙子们加班很拼，很努力。

那都是生活本色啊。🍅



那朵百合，那群青春 ——记经济学院 91 级校友毕业 20 周年返校活动

文 | 本刊记者 路文廷

1996 年，他们离开复旦，向梦想启航；

2016 年，他们回到起点，谈笑话当年。

2016 年 5 月 1 日，初夏将至，空气里满是热烈灿烂的气息。复旦经济学院迎来了它阔别 20 周年的学生返校。9115，这个当年响当当的班级，如今又是何种模样？

重聚篇：

9115 归来：“新生报到喽！”

上午 9 点，经济学院大楼二楼咖啡吧逐渐热闹起来，9115 班毕业 20 周年返校重聚活动在这里开始。刘影是这次聚会的筹备组成员，负责同学报到和核实同学目前的工作和联系信息。王槐，这次聚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和筹备组成员准备今天聚会的

各项事项。

钟昌元领着孩子给同学打招呼，对面的何寒熙笑着说：“这孩子个子好高，皮肤很好。”钟昌元笑答：“像他妈妈。”

当留校的许晓茵一身校名衫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周超说：“你这穿得很正式啊！”其他人也笑言，“我们都记不清路了，待会参观复旦的时候还要你和陈钊带路。”

正说话，王槐指着刚来的一名胖子问大家：“你们知道这是谁么？”大家愣了一下。“这是张忠华啊！”一时间各种惊讶：“你变化太大了，”“你不说我们还以为是女生家属，”“你整个大了你当年的一半啊！”陈钊说“整个都胖了，而且变黑了。”

当大家在讨论张忠华变化之大时，当年的辅导员周世江老师也来到聚会现场。有同学挤不到前面



上图 / 2016 年五一 9115 班回到经济学院参加毕业 20 周年聚会
左页图 / 左起：刘影、缪丽华、诸华江、周小月、何寒熙、袁凌祥、唐青、许晓茵、孟楠

和周老师握手，笑着喊：“新生报到喽！新生报到喽！”

上午 10:30，报到完毕，大家纷纷落座 2101。专程赶来的经济学院刘军梅副院长上台讲话，表达了对 91 经济校友返校 20 周年的欢迎。

辅导员周老师讲话时，教室又陆续赶来两名同学，底下的同学像 20 年前一样，孩子气地让周老师认这两个同学的名字，最后“逼着”周老师“举手投降”：“我知道前面的是吴刚，后面的是谁我真记不清了。”顿时底下笑声一片。

把酒歌尽：“大家悠着点”

上午 11:00，同学们集结完毕。大家在经济学院泛海楼前合影留念后，由留校的陈钊和许晓茵带领着参观阔别 20 年的复旦校园。同学们纷纷感

叹 20 年复旦变化太大了。何寒熙指着 7 号楼说：“现在这里是女生寝室了，当年我们女生都住在东区。到 92 级才搬到本部。”

中午且苑三楼午餐、江湾校区参观留念后，下午大家驱车去往酒店。晚饭后，同学们纷纷唱起歌来，有当年军训时的歌曲，还有那个时期的流行歌。男女生也打起牌来，打到尽兴时，已是夜深。最后王槐不得不提醒大家“都 12 点了，大家都悠着点。”

在巴西工作赶不来聚会的李晓波，也录好祝福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李晓波是广西人，毕业后回到广西南宁工商银行分行工作，担任过工行桂林分行的行长，随后被派到波兰筹建华沙分行，现在又被派到巴西去筹建，大家都称他为“援外专业户”。

“晓波很帅的，当年抱把吉他能迷倒一大片女生，男神级别的，吉他弹得特别好。”王槐笑着说。

上图 / 与秦丽萍老师等摄于经济系门前
下图 / 毕业后的首次聚会, 摄于1996年12月



回忆篇:

9115班在当年众多班级中独树一帜, 有自己设计的班徽, 自己众筹出版的班刊《百合》, 自己的学术报纸《经济人》, 自己作词作曲的班歌《百合》, 毕业前夕实至名归地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标兵”。

芬芳《百合》

一份班级刊物能得到校长的题词是非常罕见的, 但9115班刊《百合》第一期上赫然印着当时的校长华中一的激励之语: “努力学习, 努力实践, 把自己锻炼为社会主义经济战线的新兵。”

“班级动态”里, 第一条便是: 公元一九九二年九月七日, 经济9115班正式成立。本班公民总共62人, 来自全国18个省市, 其中男性公民39人, 女生23人。

正如华新莲同学作词的班歌所唱的, “带着五彩的梦幻, 怀着无限的憧憬, 我们相聚在经济九一, 青春的脉搏在跳荡, 我们是纯洁的百合, 盛开在经济学院, 我们是芬芳的百合, 怒放在复旦校园。五彩的缤纷, 无限的憧憬, 诚挚的双手, 纯真的心灵, 同学们携起手来, 共创辉煌的未来! 共创辉煌的未来!”, 9115从一开始便绽放着与众不同的光芒, 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未来。

公开信事件

1994年, 班级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公开信事件”。

二十多年过去, 复旦有很多改变, 不变的是学生对食堂饭菜的吐槽。在学生眼里, 1994年的食堂, 饭菜质量并不佳。当时的开水房里贴有小字报反映诉求, “总务处你们要改善饭菜质量, 里面不能有沙子”。后来,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抱怨, 9115班的两位同学干脆弃小字报而直接上大字报, 居然贴到海报栏里。这样, 9115在全校一下出名了, 成为“敢于说真话”的代表。其他系的同学都在说

“还是你们经济91厉害!”。但这件事却苦了辅导员周老师。

“周老师回到我们班说了一句话, 我们到现在还记得”, 几位同学纷纷说道, “他叹着气说: ‘哀, 莫大于心死。’” “我们觉得周老师心里想, 你们这帮孩子, 太不省事了。”不过9115这么一闹, 学校也确实重视起来, 饭菜质量大为改进。王槐说: “后来, 我们辅导员也原谅我们了。我现在回想起来, 无论是创建班刊、组建兴趣小组、组织各种活动、积极发展党员等等, 其中都凝聚了辅导员周老师的一片心血。虽然同学们现在和周老师联系不多, 但是他给我们的指导使我们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受益颇多。”王槐还说道, 周老师每次聚会都来, 我们友谊的小船不是说翻就翻的。

9115是辅导员周世江老师带过的唯一一届学生, 1996年他们毕业的时候, 周老师也离开了复旦, 现在在金丰投资工作。谈及对9115最大的印象, 一脸温和的周老师不吝赞美, “才子才女特别多”, “凝聚力特别强, 非常有活力。他们比其他班级多军训一年, 所以多了一份‘战友情’。”

实习日记

1995年5月5日起至1995年6月9日结束, 9115班开始实习阶段, 32人奔赴横河、航头、东海、泥城四乡, 30人在杨浦区实习。

泥城实习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6月3日, 星期六杨浦工商所一行四人(李峰、文学宁、梁静、唐青)‘杀气腾腾’地从大巴上下来。这是10:26, 我和霄雷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小时。邱某的学生送来四大袋‘伊丽莎白’, 又让‘杨浦四怪’蹭到了, 直吃得文学宁在打牌时直叫。入夜, 说, 吹, 侃, 谈, 唱、赏夜景, 大杂烩。”

实习结束时, 同学们对实习地依依不舍, 东海同学实习日记里记载:

“6月8日, 乡领导给我们开欢送会, 大家谈



左上图 / 9115 班自己设计的班徽
 右上图 / 时任校长华中一给班刊的题词
 下图 / 9115 班部分同学在实习基地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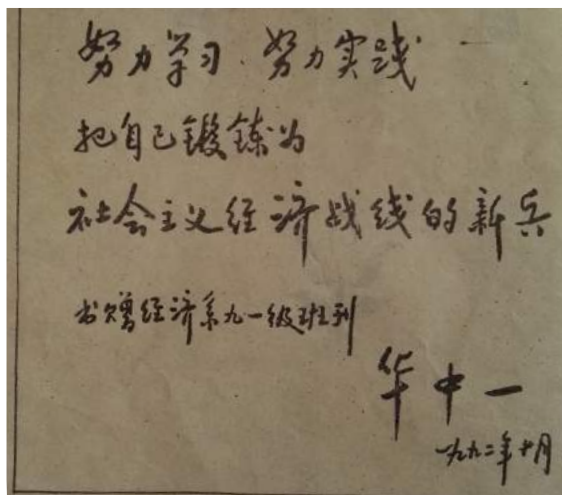


图 / 经济学院刘军梅副院长致欢迎辞

了很多，合影留念。晚饭是喝离别酒，我喝多了。
 喝吧！让我们在酒中相溶
 让这酒稀释我们离别的哀愁
 让这酒托起我们友谊的长桥
 醉吧！再让我深深体会一次东海这块热土
 让我能沉沉入睡，最后一次投入东海的怀抱。
 明天，东海的太阳依旧升起，而我们将迎着朝阳离去。干杯！祝我们一行平安。”

年轻的 9115 初出校园，踏入社会，但因为同学的陪伴和师长的照拂，那时的实习竟别有一番趣味。

“市三好集体标兵”

9115 班在毕业的时候还非常难得地获得“上海市三好集体标兵”称号。

第八期《百合》里记载了 9115 班用自己的班歌唱响 129 歌会的场景：“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参加 129 歌咏比赛，在所有参赛队中有两大特色：一是全体同学齐上阵，充分体现了百合精神，二是以自己创作的班歌参赛，资深评委欧阳先生感慨说：‘在大学生活中应该听到大学生自己创作的歌曲！’”

第十九期《班歌声响起来——争创市三好集体》文章记载了 9115 如何团结一致，最终荣获“市三

好集体标兵”：“当我们的班歌《百合》在 3108 教室响起来的时候，我站在讲台前，看到评委们都在微笑着鼓掌，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离别再出发

最后一期《百合》的编者寄语里谈到告别：“告别，往往蕴含着两重含义，并不是说，告别了，就此永远分离。其实，告别总是期盼着重聚，而且，重聚的愿望在告别后会尤其强烈。毕业了，请珍视这难忘的大学生活，请珍惜同学间彼此的友谊。今后，天各一方，请多多保重，请多多联系。希能重聚。”

重聚又离别，相比 20 年前，如今的 9115 坦然了许多。

5 月 1 号当天聚会结束，张彦伟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和辅导员周老师告别，周老师牵着孩子的手说：“再见了，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可就要长大了。”

“我到家了，这次聚会很开心，期待下次相聚！”袁凌梓在微信群里说。

何寒熙在朋友圈里写下这么几句话：“见过除了青春一无所有没钱没品味的彼此，其实我更喜欢如今更成熟更有自由度的你们。所以，在我心里，你们都比最年轻的时候还要年轻，光阴流转，并没有什么意义。”

蒋芳华：生性自由，不羁无畏

文 | 本刊记者 林子涵

“我讲的故事是我后来成为我的原因，每一丁点都是逐渐积累的”。

2016年4月19日纽约州初选，蒋芳华一早七点半就赶到家附近的投票站填选票。这一年是她来美国的第27年，也是定居纽约的第22个年头。这位1978年入复旦附中读初中，1988届复旦国际金融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经历两段美国留学、华尔街银行风云、联合创立基金公司之后，现在是国内素质教育的先导者。而回忆起青葱岁月，反思最多的还是那个无畏的自我。

“人生即奇缘”

蒋芳华遇到过许多次机遇和奇缘。

1978年闸北区彭浦新村第一小学接到通知，今年全市各个大学附属中学第一次面向非子弟招生，复旦附中在闸北区有5个名额，华师大二附中15名，上师大附中25名。六年级的蒋芳华恰好赶上这次全市统招，跑回家和母亲商量升学大事。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见识不短，她估计复旦附中名额少，很多学生可能不敢去考，当即建议蒋芳华，报就报最想进的学校。

升学考试正值酷暑，数学考试前，母亲让她吃了点西瓜。结果开始没多久她就想去上厕所，苦于中途不能出考场，就迅速写完，急急地把卷子一交冲了出去，用时只有考试的一半时间。结果成绩出来数学是满分。“那个时候不备考的，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去考，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基础教育是很扎实的。”蒋芳华笑说道：“以后就知道考试之前千万不要吃西瓜了！”

结果正像她母亲的预测，因为敢考，蒋芳华成了闸北区录取五人中的一员，这是复旦附中历年唯一一次从全市择优录取初中生。“后来知道来自

己的成绩并不是前五名，很多学生分数都比我高，但他们都没考，都去市北中学了，因为离家近。”

三年过去，升高中时因为数学突出，她又被选拔入复旦附中数学竞赛小组，类似现在的“奥数班”。复旦那时有苏步青教授，数学系是很多人向往的高地。“当时的概念是学数学就希望进（复旦）数学系，”蒋芳华说，“经过附中选拔，每星期去少年宫培训，做很多很多数学竞赛卷子。”走竞赛的道路要经过学校选，区选，再到市里和全国比赛，蒋芳华发现自己“学校选拔过了，但上不到市里”，开始思考数学这条路自己到底有多少前途，“如果进复旦数学系，那就会碰到全市、全国的数学竞赛冠军，我的数学没有到这个水平”。放弃数学作专业，大学里还有诸多其他院系，但蒋芳华却第一次有了前路何方的困惑。

恰好此时复旦附中请来了法律系的大学生开讲座，蒋芳华觉得自己口才还可以，而且1984年的中国，“法律制度基本不存在，今后肯定是要发展的”，便初步萌动学文科的想法，而专业就定法律。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放弃了我的强项，去追求一个不知道未来如何的东西”，“那个时候国家讲‘理科救国’，优秀的孩子都读理科。”蒋芳华说道，“但我一向有一个习惯，就是做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那时比蒋芳华高两年级有两个男生，都是文科，且都以极好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回校来看她。期间他们讨论读文读理的难题，其中一个这样回答道：“中国将来人类是要发展的，而且人类里出领袖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也不知道这个男孩是真懂还是假懂，但是当时听到了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蒋芳华带着考法律系的想法，转入了文科班。



这两位男生以后再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都被学校开除了，一个是因为打架，另一个是因为有偷窃行为。“大概是人生的一种奇缘吧，有时最好的建议来自于最想不到的人和事”，蒋芳华说。

文科班的学习，转眼已是高三下学期。就在开始填高考志愿时，复旦突然来了一个通知，和中国银行联合，在世界经济系建立第一届国际金融专业。“当时读了茅盾的小说《子夜》，里面有囤积粮食、股票市场炒作等，挺好玩嘛，”蒋芳华笑说，“而且中国当时没有股票市场，将来肯定会发展。”她一看介绍，这个专业的要求“一个数学、另一个英文”，“正好符合我的强项”。

然而此番又与升初中时的情形殊无二致。新的专业全上海只招收3人，全国共招30人。蒋芳华决心一搏，郑重在志愿一栏填下“国际金融”。高考后她如愿以偿成为复旦国金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上海学生中唯一的女生。

来到美国，机遇与奇缘仍伴。

1991年刚从Omaha的学校获得经济学硕士的蒋芳华，一次随朋友到圣路易斯看望其他友人。毕业正在发愁PhD到哪里去申请的她，恰巧路过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错过了学校的办公时间，但朋友和她仍径直奔向商学院，刚好看到学院院长下班走出办公室。

随行友人拦住了院长，“我的朋友想要申请这里的金融博士学位”。结果被告知招生已经截止，连Waiting list上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朋友立刻介绍说：“芳华GMAT数学考满分八百分”。院长一听面有喜色，说马上交上来申请材料。“我们回到Omaha马上交上材料，一个星期之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来到美国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曼哈顿。初到这座大都市的蒋芳华在一次行业会议上遇到了在另外一家公司供职的Gerard，而这一次遇见之后是22年的携手同行。与Gerard的交往，让蒋芳



图 / 蒋芳华与先生 Gerard

华真正产生了对美国的归属感。“Gerard 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指路明灯。”

2000 年独子的降生也让曼哈顿成了她心中的和实际的家的所在。2007 年在北卡罗莱那州的公司工作时, 每周她都要两地往返。“当我为他读《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猜猜我有多爱你) 这本书的时候, 他拿着小手, 伸出小胳膊, 伸直小腿, 甚至跳到空中, 想要猜出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长, 有多远, 有多深,” 蒋芳华在博客中写道, “在当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比划, 我对他的爱都比他想象的深的时候, 他脸上的笑, 令我终身难忘。”

“Live fearless”

2014 年的秋天, 北卡罗莱纳州举行了一场口号为“Live to run! Live fearless!” 的长跑比赛。观众席的蒋芳华看到千名选手不论健康或残疾, 每个人跑过终点线时, 脸上都洋溢着征服数公里之后的自豪。回到家后, 她打开电脑写下: “无畏是自己面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在前行道路模糊看不清楚的时候, 相信自己总能经得起时间的等待, 等待时局的渐渐明了”。

“无畏”贯穿着她的轨迹。复旦四年毕业, 她申请的第一所学校位于巴菲特的故乡 Omaha (奥马哈), 学校虽默默无闻, 但却提供全额奖学金。当时一个月房租 175 美元, 小城物价不高, 因此学校每月给蒋芳华的 650 美元助学金绰绰有余。由于成绩优秀, 教授时常在班上告诉其他美国学生, “拿芳华的卷子当作标准答案看”。

“Omaha 的两年, 我在既没有学术压力, 也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 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美国的生活中去”。两年间蒋芳华在这座人烟稀少的美国中西部小城悠游自在, 结交美国朋友, 去美国人的家庭, 深入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两年是融入的时间, 无忧无虑, 给了我思考的时间, 定位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 “这两年的思考, 也决定了我生活无所畏惧的特征。”

有了奖学金的保障, 在 Omaha 蒋芳华没有打过一天工, 但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学校美国排名在三四百名开外。“非常差, 但怪就怪在,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在 Omaha 所受的教育有差的地方。”

美国同学“不怎么会读书”, 但是蒋芳华认为其中不乏有趣有智慧的人, “他们都能够给我生活的启迪, 所以我在 Omaha 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与人交谈, 去认识这个世界。”在她看来融入了美国生活, 是 Omaha 的两年最大的意义。

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中蒋芳华没有学会求职的技能。“但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非常强的自信心, 觉得我可以做到一切!”

在系主任的鼓励下, 她向八所常春藤名校都寄去金融学博士的申请材料。“我想我肯定能进一个的”, 结果却收到了八封拒绝信。

“Omaha 原来是井底之蛙”, 蒋芳华说, “但我要感谢 Omaha, 它让我的自信心就是平白无故地很高。”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通电话时, “我从来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他们学的差。”

申请到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三年, 蒋芳华再次面临转折。

博士期间她的成绩依旧领先于欧美同学, 课外的爱好则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开聚会, “party 到凌晨两三点钟”。博士三年级资格评定会上, 教授们判定蒋芳华为不合格。教授们认为, 蒋芳华虽然成绩好, 但其实不适合学术研究, 而应该走向职场。

在教授们的帮忙联系下, 在华尔街工作的校友不久发来信息, 说摩根大通的私人银行部有一个面试机会。这一年是 1994 年, 银行在香港都还没有设立私人银行部, 蒋芳华开始时甚至把“JPMorgan”念成了“PJMorgan”。即使对 Morgan、投行、商业银行没有任何概念, 但是她形容当年的自己, “莫名其妙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的。”

“纽约的人讲‘fashion’, 我就穿了一件难看的校服一样的西装, 就这样走进了纽约的摩根大楼,” 蒋芳华笑说, “但没有一天是不自信的。”

担心一个从博士项目里出来的人太重理论化分析, 忽略了沟通能力, 一位面试官向她抛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客人没有受过投资理财的训练, 你会怎样把理论用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

蒋芳华答道: “很小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连环画, 这个连环画的作者这样解释复杂的相对论: 有一样年龄的兄弟两人, 一个人跟着光束去了星空, 一个人留在地球, 去了星空的人不久乘光束回来, 却发现两人年龄差别很大。我认为这种方式很巧妙。如果你们录取我做这份工作, 我首先把要做的理论吃透, 但不会停止在这一步, 而是要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 用简单的语言说明这些概念, 让每个人都能轻松理解。但如果我对这个理论了解得不是很透彻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话音刚落, 她看到面试官脸上的担心一扫而空。“我的回答让他们理解到, 我是可以被培养的, 而且我的思维是非常有创意和活力



图 / 蒋芳华与儿子

的。”果然, 这份工作属于她了。

私人银行部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做投资组合, 这份高薪工作瞬间扭转了之前失去博士工资的窘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她想起自己在曼哈顿居住的公寓距离中央公园不过几分钟步行距离, “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清醒的头脑, 其实什么都没变, 只不过是换了份工作而已。”

1994 年的 JP 摩根, 除了蒋芳华和另一位国际部的女同事, 一望无际的大厦里没有其他的中国员工。虽顺利获得工作, 但纽约生活却和以往任何经历都不同, “感到非常莫名的孤独, 遇到问题也不会有谁主动来关心你的”, 她形容刚到纽约时的心情, “熬过孤独之后, 也开始欣赏这种(独立)的美妙。”

纽约生活的第一年她写下一篇《家乡》,“在那一刹那,我感到了绝对的自由,是一种无人为你分担的惊恐,也是一种无人需你去担心的轻松。雨的点滴打湿在裤衫上,只有我自己能感觉,与别人是全然不重要的,也是全然没有发生过的。”

在私人银行里做投资组合九年之后,蒋芳华在2003年加入了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在投资行业换过三份工作,每次的上司都是金融界的翘楚。“小到如何写邮件与客户沟通,大到如何管理周围非确定性的环境”,优秀的主管与同事们激励着她的职业发展。

JP 摩根工作期间,一位美国同事离开公司去杜克大学担任投资总管,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杜克大学的基金提升至与哈佛、耶鲁等名校基金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了3年之后,在新闻中听到这位同事要离开杜克,蒋芳华立刻联系他:“如果你要自己办公司,我希望能够加入你的团队。”得到的答复是,“我已经把你放到我要打电话的名单里了。”

2007年年初,这位同事的新公司框架建立完善,蒋芳华离开对冲基金公司,应邀去北卡罗来纳州投入了新的事业。

“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我没有考上常春藤,也没有通过博士三年级的资格评定,但是后来的职业上我却碰到了行业的头面人物。”在投资领域展示出实力的蒋芳华,再也不用像当年一样找工作,而是始终能够得到推荐人的介绍。

“我的自信心是有很好效果的”,蒋芳华说道,“这会让别人觉得你值得他的帮助”。

2008年Gerard来到上海的金融集团工作,蒋芳华也辞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合伙人的职务,一家三口一同来到中国。蒋芳华想趁此机会多让儿子接触中文环境,便送他到复旦附小读三年级。起初全中文的课程孩子一点也听不懂,蒋芳华想“每天给他一点盼头”,让孩子的自信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于是专门联系来其他9个小朋友,租了场地,每天放学后的两个小时,蒋芳华亲自授课,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戏剧等内容。“课后两小时”持续了一年,蒋芳华在此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日后课程的基本模块。2009年后蒋芳华留在上海,正式建

立儿童合作园,运用戏剧、文理、演讲等全英文课程推行素质教育的理念。

新的事业起步并不简单,除去场地租用、聘请外教等费用,每月到蒋芳华口袋里的不是零就是负数。但问题远不止收益低这么简单,最大的难题还是家长对自己的素质教育理念的不理解。

蒋芳华提出的“5C”(Confidence 自信, Cooperation 合作, Communication 交流, Compassion 同情, Creativity 创造),代表中国教育培养需要补充强调的五项素质。

初始阶段为了招生,蒋芳华就到家长的网站、家长论坛上发布帖子,再通过朋友的介绍,第一届共有17个孩子加入了儿童合作园。“我们的招生是很吃力,很耗时的。”她坚持要了解每个孩子的情况,与家长孩子充分沟通5C的意义,然后才能让学生加入课程。“我也不知道其他机构的招生做法,即使有,我也不认为(比现在的)更适合我们的教学理念。”

在蒋芳华看来,学习戏剧只是学习沟通能力的手段,但许多中国家长却不这么想,“他们会告诉我:‘我只想让孩子简历上添一笔,去申请美国高中和大学。’”

一只蓝色的蜗牛是蒋芳华为合作园设计的logo,缓慢爬行的蜗牛与功利速成的思想背道而驰。“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很慢的事情。”

2015年的教师节,蒋芳华收到了无数来自学生与家长的祝福。“我这个没有上过师范,没有教师证的半路出家的和孩子们玩的人”,她这样自我评价,“以我的快乐带给孩子们快乐,以我给自己儿子的关心和支持,带给孩子们关心和支持,以我自己人生几十年的感悟,带给孩子们生活的启迪”,她这样总结自己投身素质教育的原因。

在2014年那场关于长跑赛的博文中,蒋芳华这样写道:“无所畏惧是针对自己的一种心态,它让一个人成性,定性,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活着。”

“就想做点事情”

“三好学生的概念就是最原始的素质教育,有综合素质,和西方的所谓完人教育其实是有共通

性的”,她说道,“如果是个学生干部,确实确实要为人民服务”。

大学四年,她评价自己颇有为民服务的热情。大一作了一学期副班长,大二在系里担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一年任期满,她想看看学校里有什么工作好做。复旦当年正好成立学生科技开发中心,第一个“学生自助超市”营业,正需要一名会计,在国金系学过会计课的蒋芳华带上班里几位女同学一同去面试。

“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我一个人,”她道,“当时账本是手记的,如果还有的话上面应该是我的字迹。”

第一个月员工发工资,她记得很清楚,56元。“当时四年大学毕业国家的工资也就这个水平,爸爸工作了几十年,工资也就是这个数字。”蒋芳华习惯把学生商店亲切地称呼为“我们小店”,“我们小店有一次进了一副麻将牌,没有卖掉,于是自己搓麻将,还被保安抓住要我们交代。”

“大学四年很萌动,思维活跃,体能也大,整天就想做点事情。”80年代社会氛围活跃,恰逢第三次科技浪潮、中国搞现代化,复旦校园内也音乐集会、人文讲座不断。“复旦大学真的就是思维上的启蒙,让人看到很多新的想法,”她道,“很幸运地赶上了这一波。”

对创造力的强调体现在蒋芳华的办学过程中。2006年蒋芳华和其他几位美国的复旦附中校友建立了“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资助附中的贫困学生。2006到2014年,她担任基金会主席期间与这些中学生交流,却发现不少学生保有国内中学教育下的典型思维。

蒋芳华认识到,对自信、交流等能力的培养要从童年开始,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维。2008年蒋芳华提出“5C”和儿童合作园的文理、戏剧等课程设计,这些和传统课外辅导班截然不同的内容在当时还属于另类。“他们不一定要接受(5C的教育理念),但至少他们会知道有这样一条道路。”

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儿童合作园开始有学生只是为学英语而来,但在潜移默化中,这些孩子做出了改变。曾经一位初二的学生在学习戏剧后发现了兴趣所在,于是高中毕业时又申请美国的大学继续

追求戏剧理想。

蒋芳华读十年级的儿子也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位演员。每当孩子有演出,家人总是风雨无阻到场观剧。

“我觉得将来中国像儿童合作园这样的机构会越来越少”,她预测素质教育机构的未来道,“如果做到了,那就是我的成功,因为我把这种理念推到了传统的教育机制里面。”

她认为,公立学校能够纳入开放的理念,才是实现完人教育的途径。“如果学校自己把这些(理念)镶嵌进去,那未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

“我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让儿童合作园结束它的使命。”

“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生活方式追求的是美国中高层质量,像我这种保持着毫无理由的乐观的态度,是很另类的。”多年的美国生活,自己的性格早已融入这里的气质。“想做什么就去做了,不会去考虑太多。”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权利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人。”蒋芳华说道,“我喜欢自由,没人约束;喜欢自己做主的生活,正好美国的生活很适合自己,所以就是一个‘Win-win’了。”

(注明:本文内容参考儿童合作园主页、博客、微信公众号,以及蒋芳华老师个人微信。)



卓福民：大时代中的跨界传奇

文 | 本刊记者 张懿雯

“搞艺术的人要特立独行，因为艺术要有自己的符号，要有艺术家自己个人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艺术家本身是孤独的，他一定要探索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这很重要，而作为一个创业者，创业者走的一条路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路，甚至前面根本没有路，所以创业者本身也是非常孤独的，他的行动还有心灵都是非常孤独的。”

1993年隐藏在“1992年”的宏大叙事之后似乎略显平凡，改革开放走过15年，生活开始有了一点色彩，通胀与通缩交替前进，大家都还住着房改房，而中国的货币化改革已悄然起步。

这一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克林顿入主白宫；文革结束已17年，柏林墙倒塌了3年。所有铁幕、战争与高压都渐次退场，中国大地上资本与货币的气息愈加活泛，无数人开始跃跃欲试。

这一年，42岁的卓福民刚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研不久，“总觉得读书读得不够，大学的氛围浸染得不够，老是觉得是个遗憾，读书的时候经历了文革，人生一开始就被打乱了，但我还是一直想读书，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抽不开身，后来幸运地脱产读了上海市第一个干部专修科，但总觉得书读得不够，就老想着继续读研，但那时候已经在关键岗位上工作了，工作一忙就再也没有时间了，然而我并没有放弃，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机会，后来就边工作边读研了……”无意中，“读书没读够”这句话被卓福民重复了好几遍，“来复旦读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因为那时候复旦经济学院刚好办一个研究生班，但也可以说是必然，因为我一直想读书。”

也许复旦现在的校园里再也见不到这种“同学”：在课堂上看书做题的学生，已经是一名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处长；还未通晓管理理论，就已经管理过工厂；甚至是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领导大型国企在香港上市。

卓福民自小酷爱绘画，如果当年他所在工厂领导同意在他报考美院的申请表上盖章，也许他又会是另一个人生。

卓福民在画展上展出过自己年轻时候的相片，画面中的年轻人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眉宇之间仿佛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与直白。

“那个时候我的一切都是‘组织安排’，完全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他17岁未能上大学就进工厂当学徒，适逢传统制造业的成长期，有才干的年轻人很快冒了出来，卓福民25岁即被提拔，管理着几百人的工厂。又逢80年代，企业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一环，他被借调到上海机电局，参与改革方案设计。又因此被上海市政府看中，调到体改办。

就在不断的“组织安排”中，他广泛接触了各行各业，同时对整个资本市场运作的规则、相应的法规、规章分外熟悉。之后的数年时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一波浪潮：成为第一部“证券交易所暂行规定”的起草组成员；“上海市公司条例”的主要起草人；上海市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方案的主要起草人……

当时代的巨轮势不可挡地驶来时，个人意愿甚至被碾压得微不足道，彷徨、孤愤，这些当年流行过的气质似乎都不是解药，唯有忍耐、奋斗与热忱才能融化一切，融入那个辗转腾挪的时代。

1995年的又一次“组织安排”打断了他在复旦的学业，卓福民奉命赴香港参与组织上实集团部分资产上市。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政府于1981年在香港成立的窗口公司，现为上海市政府在海外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他直接参与的上实上市仅仅用了八个月时间，而一年后同香港回归一同被载入史册的还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金融风暴，上实的股价从60多块钱跌到9块钱，作为CEO，我内心的焦急难以言表。”其时，他正担任在港上市的红筹公司上实控股的CEO。

纵然风云变幻，上实这艘国有资产巨轮虽承受颠簸，但还是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他在担任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和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期间，参与组织了超过130亿港元的融资活动，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活动七次，投资了光明乳业、上海家化、东方商厦、中芯国际、联华超市、上海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内环线高架等诸多优秀项目。

千禧年到来，国企高管年过半百的人生是否还有新的可能？

“2002年我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在那时像我这种级别的人走出体制的很少很少，我可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了”，面对记者的疑问，他开始讲述体制内外的体验，“一定程度上自己也有茫然的地方，体制内做到了相当的职位，尽管资产不是你的，是国有的，但是毕竟在一个大平台上掌控了那么一大笔资产，那时候我主管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和上实医药科技集团公司，这两家公司还控股了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在上市公司之外，我还担任着上

海四季酒店业主公司的董事长，同时还是拥有崇明岛84平方公里土地的上实东滩开发公司的董事长。突然辞职下来什么都没有了，都移交掉”，“去做一个从小做起，从零做起的风险投资，募、投、管、退，只身跳进茫茫市场经济的深海。”当年那么大的转折，他如今讲起来却云淡风轻。

“我对我的选择没有后悔过。我跟你们不一样，很多路可以选择，但我们那时候没有，我所有工作都是组织分配，即使有机会，章不盖你就不能走，在上海美校读书时想要考美院，单位不盖章，没办法报考，唯一的自我选择的机会就是02年这一次从体制内出来，做创投，这已经够了，人生中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要抓住。”

也许当时并没有料到这一决定会为他打开两种新的人生——创投人生、艺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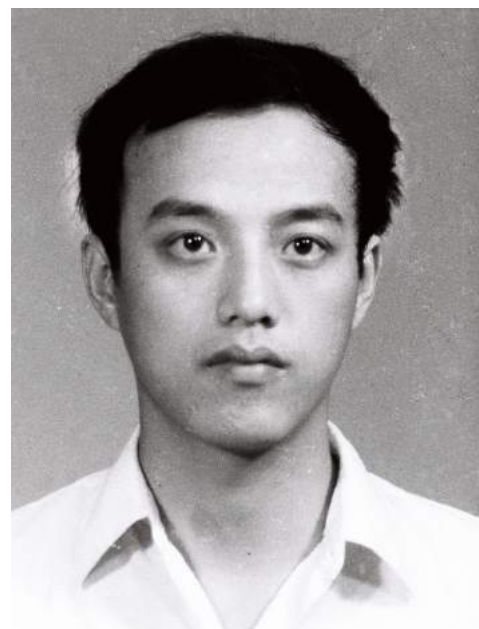
“你们可能不知道，卓福民是个画家，他的第一个专业学的是油画。”朋友们常常喜欢这样介绍卓福民，仿佛他的艺术家身份和创投大佬地位能够碰撞出听者最大的好奇与惊叹。

2015年，卓福民联合几位同有艺术爱好的“创投大佬”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举办了《色界：艺术本初心》艺术展，他说自己的艺术之路才刚刚开始。

翻开他的画册可以发现：素描、速写、水彩、水粉、油画、版画样样拿得起，连查铺归来、码头巨轮起锚、梯田抽芽返青、舞者飞扬忘我……甚至是干校的猪圈，无一不可入画；或是田园牧歌的欣欣向荣，或是机器大工业的恢弘意气……仿佛一帧一帧光影回闪，汇成时代的微缩。

他曾记录下上海40年前的建设热情。1975年，卓福民来到金山石化总厂写生，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吸引着他，“在那里画了一个多月，整个建设工地的点滴我都用画笔记录下来。”至今他说起来仍倍感鼓舞。

他还曾记录下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人心涌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股市狂泻，楼市狂跌，人心惶惶之际，卓福民创作了油画《磐石》以表达心声；两年后经济转稳，人们心情开朗，他又以黄山为素材，创作了水彩《云开雾散》；2002年，他决定从体制内出来，进入风险投资市场的深海，创作了生平第一幅抽象画《沧海之光》，他至今对那



时候的创作记忆犹新。

“虽然我内心是坚定的，但毕竟前路漫漫，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下去？我想起有一次去海边看日出，很早，天没亮就去了，海水是深蓝色的，深邃的蓝，慢慢地，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之前的一刹那，有一点金色的阳光，照射在整个海面上，波光粼粼开始有动感了，不多久，露出一个小小的太阳一角，然后是漫天彩霞，上面是一片通红，下面是深邃的蓝，整个过程，如果用照片拍下来，就必须几十张的组图，但是用画来表达，就可以把整个动态过程浓缩到一个画面里，我用油画颜料激情地创作了一幅抽象画，形成了这幅《沧海之光》。”卓福民还为这幅画配过一首散文诗：

深邃的蓝 / 看不见底 / 风云漫卷 / 暗流涌动 / 前路漫漫 / 远方天际 / 几抹亮色 / 正在顽强 / 跃动 / 一片暖红 / 若隐若现 / 昭示了 / 绚丽明天。

他讲话往往带着强烈的画面感，从空间到色彩，暗示着强烈的美学意味，连同绘画，他爱屋及乌地喜欢摄影、旅行，旅行的意义化作他的作品，沉淀为人生的体验和感悟。

“中国有几个地方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西藏和新疆，我到拉萨不断看到藏人转着经筒，日复一日的转经就意味着人的生死轮回。有一天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堵黄色的墙前，是蜡黄蜡黄的，这种黄是上海没有的，中午的太阳顶射下来，不断有藏人转着经筒经过，其中一位老人，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让我感动、给我带来触动，在灵魂深处有意愿的东西，去年我用两个月的周末时间把它创作出来，就是这幅油画《轮回》，当然这幅画非常写实。我现在正追求更高的境界，不是单纯画得像不像？不单纯追求形似，而是神似。”

都说在艺术界有个独树一帜的“创投六人行”，在投资圈有个别具一格的“艺术朋友圈”，这样的“跨界”仿佛正在挑战人们的既有认知习惯与刻板印象。

“搞艺术的人要特立独行，因为艺术要有自己的符号，要有艺术家自己个人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艺术家本身是孤独的，他一定要探索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这很重要，而作为—个创业者，创业者走—条路也是跟别人—样的路，甚至前面根本没有路，所以创业者本身也是非常孤独的，他的行动还有心灵都是非常孤独的”，谈及创业、投资



图 / 青年画家卓福民

与艺术，卓福民的回答令人耳目一新。

“所以唯有孤独者可以读懂孤独者的心，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要理解创业者，就要理解他孤独的心，当一个投资者有艺术品味，有艺术气质，懂艺术，甚至某些方面是一个艺术的践行者，对读懂创业者的心灵非常有用，孤独者和孤独者有共鸣，对他们创业事业会有非常好的帮助，企业家最起码要有一、二个雅好，艺术是我极力推荐的雅好。”

令人意外的是，在去年轰动社会的“色界”艺术大展中，不仅有他的绘画作品，还陈列有他1980年代在交大机电分校读书时的8本“高等数学”练习册，参观者打开其中任意一本，都会为那略微泛黄的纸页上印刷体一般的黑色钢笔字迹所打动，“我读书的时候特别是数理方面还是可以的，概率论是100分，数理统计也是100分”，“高等数学我连续两年期末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分别是95分和98分。”说罢他又略带狡黠地补充道，“交大那时候还是很严格的，那不是开玩笑的。”

“读书的时候碰上文革，高中所有课程全部靠自己工作之余自学，在读研究生课程时还轮上了第一次全国英语统考，都是很有难度的。一边工作一



图 / 2014年卓福民应北京APEC会议筹备方所创作的《奇峰入云》

边读书，虽然辛苦我也读的不错。”卓福民讲起在复旦读研的“学生时代”，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复旦的学风和老师让我印象深刻，老师都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尊敬老师，当时我的导师伍柏麟正在研究企业集团，我就跟老师一起做课题，我的有关企业集团的相关篇章还编写进了老师的书里，这些在我的回忆里都是非常开心的事。”

他形容自己这代人是“奇葩”，好像什么都没有学过，但又什么都拿手。倾心绘画，热爱读书，喜欢数学，擅长写作，当工人的时候是勤奋劳动的先进生产者，在机关的时候是思虑周全的幕僚。

“那时候在市政府帮领导起草报告、制定政策、撰写方案，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文字也要反复斟酌，自己的心得体会又要经常转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在外面做改革报告时，上台一口气就要讲3个小时，从来不用演讲稿，仅仅列个提纲，所有数据都记在脑子里，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都是自己锻炼出来的。”卓福民看着惊讶的记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别人总说画画的人看到数学就头痛，但我喜欢数学喜欢得不得了。”这些特质仿佛已在他头脑中盘桓、实践过好多次，总结自己如同信手拈来。

“我们这代人很特殊，时代赋予我们责任，但也‘压榨’我们，把我们压到最底层，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不能更底层了，反而给了我们更多的

自信。我们在基层时，什么苦都吃过，所以现在讲到以前的那些事，我们可以风轻云淡，不当一回事儿。”读书与绘画两件事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绘画之路虽然未能一蹴而就，却是他心灵的港湾和灵魂的陪伴。



2008年以来，卓福民已连续八年被评为“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

他的投资事业素来拥有着不俗的业绩：上海家化、光明乳业、联华超市、冠昊生物、微创医疗、碧生源、青春宝药业、胡庆余堂、美年大健康、大全新能源、安科瑞电气、展讯科技、携程、红黄蓝教育、新通联、联华超市、东方商厦、中芯国际、汇众汽车、上实交通电器等公司，他担任合伙人的纪源资本已投资了200多家企业，其中通过上市和并购退出的已达80多家。所有人都想知道资深投资人是怎样炼成的。“

阅历很重要，对于一个投资者，最好是你经历过创业，或者是跟创业相关的，如果没有相关的阅历，你可能对行业的判断、项目的判断、对投资者的帮助就会比较少，从学校出来，用书本上的知识套到现实上是完全不行的，我们现在都在寻找优质创业项目，在短期内爆发性增长，在IPO之前就

达到10亿美金以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独角兽’。”对卓福民来说投资素养的积累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

“第一要有眼光，阅历是基础，一定的经历跟学历有关系，学历是经历的一部分，阅历是我的本钱，因为我什么都干过。在政府干过，宏观上容易判别趋势，比如我会很注意政府发布的政策，‘十三五规划’，我就认认真真通读过几遍，从中找到了很多我认为有机会的地方，如果你趋势看得不准，大行业没看对，企业再怎么做也没用，行业发展空间跟政策很有关系的。经过若干经济周期后，总结的好就会变成自己的财富。

“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跟‘90后’打交道没有代沟，‘小确幸’，‘绝对领域’，‘二次元’，我都知道，类似这些东西不是说玩弄一个名词，而是必须在这些领域里面，要跟最前沿的人打交道，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R\VR前几年我们就布局了。在投资方面我已经历过3个大周期，当年跟风追高的，危机一来没人接盘，死掉的一大堆。”第三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大门-小门-人”，我把很多经验的东西沉淀下来，变成理论的东西来指导实践。”

他从2000年涉足创投行业，自谦为“投资老兵”，面对行业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经济趋势预判，卓福民则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现在在上万家做PE、VC的，做创投的大概几千家，数量上全球第一，但是我们集中度比较小，像美国的话，300家基金管理了6万亿美元，前20%最顶级的基金就占到80%的回报比重，即所谓二八定律。中国目前在发展过程中，我预计三到五年，大浪淘沙，不会再有那么多基金了，滥竽充数的会大幅度减少。”

“我认为未来是中国做私募做创投最好的黄金十年。第一，做创投先要有钱，中国钱多，经济体量大，60万亿GDP，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积累的资金被挤出来；加之富裕人群越来越多，手里也有余钱，有理财和资产配置的需求；国家社会保险和各类商业保险资产也越来越多，这部分资产也有增值的需求，所谓资产的配置方面有相当一部分要往那里走；从融资结构上来看，国家要求从间接融资为主转向直接融资为主。中国最大的债务不是地方政府债务，而是企业债务，占到整个GDP的130%多，正常应该是50%，这个债务太高，有风险，相当一部分要从债向股权转变。以上几个方面导致投资PE、VC是最好的方向。”

“第二，中国正在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小微企业本身融资难，鼓励天使投资、创业投资、PE，投资就是股权；A股市场已有相当规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退出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同时政府还在做一些引导基金，甚至创业项目失败了，政府还给你补贴，这种环境在全世界哪里有？”

“第三，“那么有没有项目可以投？有！过去我的邮箱里每年100到200个项目就不得了了，但现在邮箱里收到的项目资料，仅我的个人邮箱就会收到一千份以上，筛选的范围扩大几倍。上次去四川成都出差很有感触，成都本来是一个‘小确幸’的地方，非常安逸，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但现在也成了创业的‘热都’，我参加一个会名片就发完了，现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整个国家的创业气氛都搞起来了，好的项目也就多了。”

谈及未来看好的行业，他毫不吝啬地分享到，“我觉得整个IOT，就是万物互联，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成长，人工智能、大健康，则是青春永在的行业，同时我也看好泛娱乐行业，就是以IP为核心的一系列产业生态链，非常有市场。中国的电影在2005年的时候，票房才50亿，2010年突破100亿，到2014年300个亿，去年440个亿，但我们的票房跟美国比，一年0.57人次观影，而美国是4.7次，按照美国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泛娱乐行业只要内容上去了，爆发性增长惊人！”

“按照美国人研究的世界经济周期的水晶线，2015年还是非常糟糕的，2016年还在下行的通道，2017、2018年慢慢往上走，整个周期8.6年，前后会差半年一年，但我认为并没有明显的资本外逃，资本本来就是流动的，有时候会净流出，有时候会净流入，如果说外逃，那么请问为什么中概股回来了呢？因为觉得中国资本市场对它有利，所以要回来。整体上我认为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的投资人，我们不会比人家差。”

国际投资界中，更年长的投资者往往具有更加丰富的资源、经验以及良好的心态，而有艺术情怀的人内心执着于一种孤独，潜意识中追求超凡卓越，似乎能以出尘的大格局来审视世事变幻，既感性又理性，既能宏观又能察微。

如说“跨界”，其实本来又哪有那么多“分界”？卓福民这位投资界的“老兵”还要奋斗下去，他的艺术道路方才风光正好。



余焕培：太极人生正当时

文 | 本刊记者 张懿雯

“人到了50以后，开始会对人生做较深度的思考，也会觉得只有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擅长的事情，人会感觉由衷的高兴的，生活可以变得简约简单、也可以更加的随性一点。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事业卓越者和平凡者都有理由和需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能尽我的专长为学院的校友尽一些绵薄之力，把我认为是对的东西，为周围需要的人做一些帮助和服务。”

“你实在要打么，那我们放开手脚来打一场好了！”记者在层层铺垫之后问到学太极拳到底能不能打？余老师的一改云淡风轻的言谈风格、直接而伶俐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随后他又认真地说：“太极拳作为一个古老的拳种，能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太极拳的价值贡献除了独特的技击风格，更多的还在修生养性、平衡身心和哲理智慧方面。”

热心公益，回馈学院

余焕培被大家尊称为余老师，他对待学员耐心细致，毫不保守地传授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人生感悟，打起拳来舒展大方、刚柔相济、内劲充沛，颇有大家风范，凝重洗练背后仿佛有一种淡淡的禅意，言谈之间清淡真诚，这一切让人很难想象其人生中其实经历过跌宕起伏。

“我到经济学院校友会办太极班也是一个偶然的际遇，我的学长赵定理老师一直负责我院校友联谊活动的组织，同时也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在热心组办各类专业学术交流活动中，发现很多老师虽事业有成，身体状况已处于较糟糕的状态，仍然忙碌于辛苦的工作中，大家也有这个学习太极拳的意愿，希望能够在校友会活动中有这样一个健康养生的互动平台，让这些亚健康状态的老师参与进来。知道我有练拳的经历，经过徐为民、徐培华两位教授的推荐，当然我也欣然答应，这才成就了我为母校服

务的机会，一切发生得特别的自然。”

余焕培现在每周六下午都无偿挤出时间来经济学院给校友、师生们授课，教授太极拳，讲授太极拳的基本理论，并不时联系各界养生、调理的专家来举办讲座，受到学员们的极大欢迎。他说道，“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太极拳这个班我可以一直办下去，我教一个学员也是教，一个群体我也是教。”

身体羸弱，拳击梦碎

在众多经济学院的校友中，余焕培的经历有独特的轨迹。

“我自小就很弱，身体一直都是病怏怏的，情绪也不稳定。”成年后，他加强锻炼，依然未见好转，两次胃出血，眼睛多次受伤，患过心肌炎、急性肝炎、肾结石，做过甲状腺切除手术……对这一切，余焕培仅用一句“从小到大身体不好”一笔带过。

1979年，余焕培考入复旦经济系，1983年毕业于在上海铁道大学（现同济大学）担任教师。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弱，也不够勇敢，打架方面基本是打不过别的男同学的，体育课的成绩基本是最后几名垫底的，虽然高中起开始坚持用跑步和练肌肉的方式改善体质，但是总给人有点营养不良弱弱的感觉。直到进了大学，一本阿里拳王的自传启发，让我开始痴迷于拳击运动，每周两次从不间断地接受艰苦的拳击训练，风雨无阻地自觉挨揍，想要让自己变得勇敢强壮起来，而且一坚持

就是六七年，在我们当时那个年代也算比较另类变态的，甚至周边同学觉得我有点受虐和暴力倾向呢。”

当时余焕培先后师从上海数名拳击家系统学习拳击，著名教练熊伟曾带过他打过不少正式和非正式的拳击比赛，“当时的比赛和训练不像现在条件好也有报酬，训练和比赛保护措施也不好，嘴角开裂、手指关节挫伤脱位是家常便饭，我的眼睛先后受过几次伤，有一次受到重创，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几乎失明。”自那之后他便只好放弃了这项运动。“拳击虽然训练你灵敏度、爆发力、柔韧性，并且使你四肢强健，但练拳击的暴力刺激其实对内脏和情绪的负面影响也很大。那次重伤让我彻底放弃了拳击，运动节奏在激烈运动中戛然而止，一时找不到替代的运动项目，人也在这种失落中变得焦虑惶恐起来，随即神经衰弱和心率失常的现象也随之而来。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我有幸遇到了陶仁祥老师，——一位武学知识渊博、武艺修为

精湛的名师，由此踏上太极研习之漫漫长路。”

拜谒名师，习法求知

“太极拳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短短三个多月，就治好了令人沮丧的神经衰弱，一紧张就头痛的毛病也不治而愈了，经常心悸早搏的现象也消失了，行拳走架的时候有一种自己能觉察的欣快感，那不是激烈运动刺激后的畅快，而是一种自己能把握的平稳的宁静的喜悦。”

记者问到当时是如何处理拳击运动带来的伤害时，余焕培坦言道：“虽然我现在仍然喜欢看拳击，但是仅仅把它当做体育运动来欣赏，而当时受伤后的心情是十分沮丧甚至是后悔的，毕竟那样的受伤是无法回到原来的，那样的伤害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甚至会让你对正常发生的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良好的心境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左下图 / 左起第六位与余焕培
右下图 / 青少年时期的余焕培



“我跟随陶仁祥老师学习太极拳是很系统也是很扎实的，他教得很慢，他说太极拳是精雕细刻的慢功夫，你如果急躁，那就换别的拳种去练。这既是打铁锻造的硬功，也是揉面起筋的软功，也是磨砺心性的过程。”

余焕培跟随陶老师学拳，每周学习一到两次，光架子和基础和拳架就学了三年多，系统学习陈氏太极拳和杨氏太极拳推手。同时也跟随老师的索引推荐学习有关太极拳理论和拳理相关的典籍。

当记者问起，你读研选哲学专业是不是和太极拳的道家文化有关系，他打趣道，“我考研和太极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就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就尽快想换一种工作和生活环境。觉得通过练拳自己的身心状态都已经调整得不错了，当年想要变动工作环境，选择机会很小，考研究生调整工作方向似乎是当年唯一名正言顺的理由。当时离考试只剩几个月时间，考复旦比较难，恰好那年交大社科系新设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不料一考就中了，巧合。”

研究生毕业后，他放弃了老师要他留交大任教的机会，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南下闯荡。“我当时的想法简单又天真，因为毕业后一直待在高校园里，所以当时就想离开学校，换一种活法，也没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淘金那种很功利的想法，想得很简单，听说外面世界很精彩，就想背着行囊去外面看一看，那个决定一点也不复杂，也没有啥设计，就如扔一个硬币那么简单。”

南漂多年，他经历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辛苦以及不规律的生活，少不了孤独寂寞甚至踌躇是否还要坚持前行继续漂荡，往往思索都是无果的，休憩片刻继续迎接一个未知的陌生。在那段用直觉和身体去感悟生活的岁月里，当然不可能继续练拳了，只是行囊中总是放着几本太极拳书，《太极拳》《陈式太极拳》《中国武术基础功法》，深夜失眠时分，信手拿来翻阅有时兴奋了也会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比划几个招式，不至于丢了拳感。

“我练拳也不是一直坚持。太极拳也确实不同于其他拳种，只要你跟过好的太极拳师傅，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那种正确的感觉和劲道，太极拳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好像学会了游泳和骑自行车，久搁一段时间不练，也还能再捡起来。我自己感觉，可能是因为练拳，对身体各脏器的调节和修复，让我几次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好。”



图 / 余焕培与恩师陶仁祥

人到中年，峰回路转

余焕培自1996年到上海以后，生活渐渐趋于稳定，练拳的时间慢慢多了，2005年之后开始热心于太极拳健身的公益事业，与国内外太极拳爱好者交流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对前来交流的练者，虚心求教的同时也不吝传播太极拳相关的技术，不遗余力地在太极养生和太极拳技击方面帮助别人，“太极是一项全民都可以参与的运动，不像其他武术项目，定义在较窄的范围内，它不以人倒我为目的，太极拳是一种多维平衡协调身心发展的健身武术，它的范围很宽，既可抗暴防身，也可对身体的质地和气质的修养，对免疫机制的修复，对改变人的心境、神态，甚至价值观行为处事方式的改变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为我原来的工作主要是物流供应链的设计以及园区的规划设计，同时也担任一些企业的咨询顾问，平时工作量也比较大，生活也不规律，有时候还要喝酒应酬，这种忽略健康的负面因子的积淀，致使三年多前我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我才彻底放

弃了在身体不好的时候开始想起练拳的吃老本的做法，然后，开始比较系统地又练习太极拳，即使没有完整的时间也见缝插针地锻炼，把太极拳运动作为一种身体自觉教育好习惯，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人到了50以后，开始会对人生做较深度的思考，也会觉得只有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擅长的事情，人会感觉由衷的高兴的，生活可以变得简约简单、也可以更加的随性一点。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事业卓越者和平凡者都有理由和需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能尽我的专长为学院的校友尽一些绵薄之力，把我认为是对的东西，为周围需要的人做一些帮助和服务。”

由于余焕培在上海武术圈子里颇有名气，闲来总有人不断来找他交流学习，有些甚至不远万里从海外而来，他的生活充满了与拳相关的活动，他说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相通的，和中国艺术、道家文化、中医都有相通之处，曾有学习中国水墨画的日本留学生找他来领悟意气韵味在中国的传统书画的感觉而学习太极拳，还有欧美从事武术教练的行家前来请教。他分享到，“太极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讲是很高的，是‘道’的范畴，把‘道’的思想提取出来，注入到拳里面，形成一个拳种，有养身健身的一面，也有王道的一面，有强身、技击的方面，也有霸道的方面，只要运用得当，总能处理得含蓄和谐。”余焕培进一步阐释到，“但如果你要去克服一个绝对力量比你大的对手，首先你要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太极拳的境界不在于力学的运用，更高的层面在乎有道艺之心，搏击技术在道艺的层面上也是次要的东西。”

“我们要通过练拳来唤醒身体和是心灵内一些东西”，提到现代人的生活与太极的关联，他说道，“我们现在生活在灯红酒绿的闹市中，很多方面能力都变得迟钝了，嗅觉、视觉，感知能力，尤其是

我们经院大部分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平时整日在电脑面前疲惫不堪，若能找个时间静一静，打一段拳，调整一下自己，净化放空自己，很多人其实很需要太极拳。不仅中国现在需要这些东西，世界上更多的人也需要这些东方智慧的东西，我们太极拳爱好者，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现在国家对社区文化、健康事业的投入是最多的时期，包括对古典文化的传承发掘继承方面的投入也是最多的时期，对于太极、养生这方面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我想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经院的校友们加入我们平台一起来练太极拳。”

陈硕：像农民一样经营学术

文 | 本刊记者 郑薛飞腾

“文章发表前，美国去过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高校，国内知名高校也全部去过，和‘高手’过招，反复修改。”

在复旦，提及经济学院的陈硕老师，许多同学第一反应是“好帅、好潮、好有才”，就连他所带的硕士研究生，被问及为何选陈硕作为自己的导师时，也不假思索地说“因为陈老师帅呀！”

但是，真正的交谈开始时，记者发现帅气外表下的陈硕，却像农民一样经营自己的学术：以最普通农作物为研究对象、用“大焖锅”收纳各种“奇珍异宝”、在“工作坊”里辛勤培育自己的学生……

“玉米地”里种论文

玉米？有人以此为业，有人以此为食，陈硕却以此为文。2016年，他在经济增长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发表了“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这篇文章背后凝结着他八年的努力，八年间，他多次往返香港与内地、改稿逾百遍、翻阅了近两千本地方志。

回顾这篇论文的诞生，还需从十年前谈起。当

时，陈硕还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发现中国明清时期人口增长逾两亿，占当时世界新增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长期以来，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历史学者提出由于儒家思想、瘟疫及内战的减少，因此人口能够稳步增长。在他看来这并非故事的全部，除此之外，农业技术进步是其中最具决定性力量，而“头号功臣”当数玉米等北美作物在中国的广泛播种。由于玉米抗旱及可在坡地上种植的性质，在明清时期那些无法种植水稻和小麦的地区均被广泛的引种。增加的粮食增加了人口的营养摄入，为其增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但这一切都还停留于假设阶段。没有论证，永远只能是遐想。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学术探索之路。

首先，经济史研究需要足够的史料与数据资源。为了获取数据，他首先需要确定哪些机构有相关的史料，然后会花上两三个月提前做好规划：数据量有多大？当地机构政策是什么样的？可以复印还是拍照，还是都不行？有没有当地关系？三年间，他的足迹广涉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档案馆及博物馆。在获得充分的原始资料后，紧接着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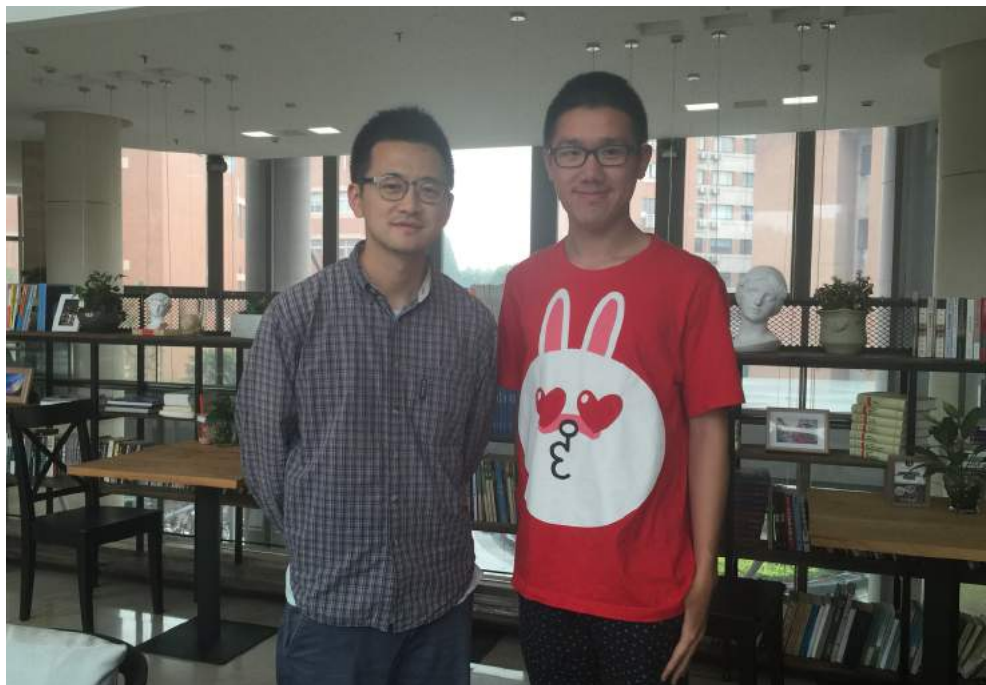


图 / 陈硕和本刊记者郑舜飞摄

录入数据，这是高度重复性及乏味的工作。在这个阶段，除了自己录入之外，他已经“善借外力”，常常花费自己的奖学金请人录入数据。在他看来，为研究花自己的奖学金无可厚非。“我不认为一定要申请经费才去做研究”。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目前很多数据都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提及收录数据的时光，他笑着说：“2006年到2009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我特别喜欢录入数据，随身带着数字小键盘，哪里有好的数据，我都想方设法弄过来录入到电脑里。”

俗话说，“从初稿到发表还有一光年的距离”。2011年，他带着这篇论文获得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但这只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半里程，距离真正获得学界认可——发表还为时尚早。陈硕介绍

道，在这篇论文的初稿完成之后，就要到各个高校和学术会议上陈述，获得本领域和其他领域学者的批评和意见，然后根据他们的数据，重新补充数据，重新分析，然后重新修改。“文章发表前，美国去过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高校，国内知名高校也全部去过，和‘高手’过招，反复修改。”言语虽然轻巧，这个过程整整耗了四年光阴，直至2016年初发表，离最初产生想法的时候，已是十年。

“大焖锅”中练本事

除了研究农作物，陈硕老师还经营着一个微信公众号，名为“论文大焖锅”，乍一听竟也是个“农



图 / 陈硕和他的复旦社会科学实验室 (Fudan WFP Social Science Lab) 成员

气”十足的名字，点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实打实的“洋气”公号。从2014年起，公号每天都会推送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上最新的经济、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陈硕和他的团队常年笔耕不辍，如今“大焖锅”的读者已经遍布全球高校的研究者及学生，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公号之一。

其实，对于陈硕而言，“论文大焖锅”如今的样态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早在2006年，因为研究需要他在阅读学术论文的时候，就随后撰写简介，每篇长达三、四千字，他把这些摘要贴放在许多热门的BBS上，当时就颇具影响力。十多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衰，用于贴放摘要的平台也一变再变：从最初的BBS、学术研究类网站，到后来的人人网、新浪微博，各个平台都曾留下他的“足

迹”。2014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开办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论文大焖锅”，专门推送这些摘要。而背后的写作队伍，也由他一个人变成了团队维护。

由于此前数年的积累，每篇文章的编排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格式：研究问题，作者信息，论文题目，研究方法、贡献及结论。最后一段总有一句“论文请点左下‘阅读原文’”。在这之后却是“台下十年功”的努力。据陈硕介绍，每篇推送，都要花费两周的反复讨论和运作。首先，由他给研究团队里的同学布置阅读任务，团队里每位成员每周都会分到一篇论文。他们先写出初稿，每周二陈硕的组会上，每个人向大家谈一下原文内容。然后，陈硕会将推送投影到大屏幕上，在他的主导下学生开始讨论并现场修改。负责的学生会根据这些修改意见完

成终稿，最后放入公号后台。

系统的运作、严肃的内容使得公号收获了相当可观的阅读量。每篇推送，少则过千，多则上万。对陈硕而言，阅读量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公号主要是我对我学生的写作训练，推送完全是这种训练的副产品而已。”

如今，微信传播尚如日中天，但他已经开始考虑转换平台。问及原因，陈硕答道“我觉得手机端并非一个好的学术推送平台”。在他看来，学术推送和新闻类推送差异巨大，前者并不讲究内容的时效性。“严格来说，学术论文的严肃性并不适合在手机阅读，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打印出来，认真阅读。读者需要随手在上面做备注。”。

“工作坊”内培养学生

一位优秀的教师，不只是自身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还应培育学生，使得学术得以传承。陈硕正是如此，在他的描述之中，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像是“工作坊”内一棵棵自由生长的植株，而他是一个精细管理、严格修剪的园丁。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界具备竞争力。

基于自己的学术成长道路，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培育方案”，概括起来即“听、说、读、写”。听主要是听各种学术讲座，理解论文背后的建构逻辑，学会批判思维。“说”是要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公共场合中陈述学术研究，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做到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地表达内容。为此，他会要求每个学生在组会上和大家阐述自己近期所读的论文和学术著作。“读”和“写”则是建立稳定的论文阅读和推送撰写机制，“我是完全按照以后要在学界生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陈硕如是说。

有过一面之缘的学生提起陈硕，常常会说他“帅”，而真正在他麾下的学生，则难忘他的“严”。姚沁正是如此，她是陈硕的开门弟子并有志于经济史的研究。陈硕对她寄予厚望。在她看来，老师虽然很“酷”、很幽默，但偶尔认真严肃的催促“可以让人胸闷一天”。小到“大焖锅”推送里的一个标点符号，大到科学研究的方法习惯，陈硕老师都

是最高标准、最严要求。

最让姚沁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发生在一次研究助理的工作中。当时，项目要求绘制明代驿站的GIS（地理信息地图）地图。驿路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用直线连接地图上的两个城市，该直线就被当做是驿站；第二种则根据古代驿站地图并借助当代地理信息校准，一点一点的细致勾画和复制。前一种简单省力，后一种则耗时巨大。在和陈硕讨论的时候，她表达出想用第一种方法的意思，“陈老师当时就急了，他说你怎么能首先想的是用简单方法呢？你有看过那样画出来的地图吗？”听到老师的意见之后，她深感惭愧，开始着手用第二种方法绘制地图。

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但出乎姚沁的意料，当天晚上，陈硕老师专门给她打来一个电话，极其认真讨论这个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简单的用哪种方法的问题，它涉及到学者做研究的基本态度。我只能和你说，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如果遇到同样的境况，我的第一个想法绝对不会便宜行事。做研究没有捷径，只能一步步脚踏实地。但你记住，学界非常公平，水平高低，用功没有，非常容易辨别，容不得半点投机”。后来，每当她遇到类似境况，总能想起老师当时的谆谆教诲。

标准，从未改变，要求，不可松懈。多年来，“工作坊”内的学生来来往往，有的图一时之趣，看到陈硕老师在做犯罪、战争、饥荒以及和亲等研究别有趣味，匆促报名，却在几个月的残酷训练后选择放弃。有的则常年坚持，如今已经完成从学生到研究者的蜕变，和陈硕一起合作展开研究。各有各的无奈，各有各的选择。对于陈硕来说，始终未变的，仍是像农民一样，经营他的学术。🌾

忆复旦 80 年代校园黑板报

文 | 本刊记者 陆奕同

眼前的光华大道，似乎与三十年前的它一样灿烂。不过，它也曾被1980年代的复旦学子称为“南京路”。当时，在这条贯通东西的校园主干道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一栏黑板报了。

南京路上的“风景线”

大约自上世纪70年代始，黑板报之风在校园里悄然盛行。

据81级本科、现任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回忆，在他1981年进入复旦政治经济学系之前，黑板报就已经存在。当时“南京路”的两旁设置有砖头垒起的嵌入式板报栏，各系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每年学校都会举办黑板报比赛，由各系推荐一个班级参加，展出的成果百花齐放，更是吸引人们驻足。同为81级本科、现任上海商学院院长的朱国宏也笑称：“过去黑板报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

那个时候，黑板报的制作基本由学生独立完成，内容也大多来源于同学们自己，“都是原创的东西，不太会从报纸上找一篇东西抄上去。”从诗歌到杂文，或是小说，形式多样的文字宣告着年轻人的热情。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学生们既可以在板报栏里读到讨论改革的评论；又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少，责任感强，也常见到讨论大学生与社会关系的内容，颇有书生意气。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思考深深地吸引每一个复旦人，从“南京路”走去食堂的路上，“大家都会看一看、品一品各系的黑板报”。

而78级哲学系本科、现为复旦哲学学院教授的王德峰也曾提到自己很喜欢看这些黑板报，“中饭的时候，端着饭碗，一块一块地看。”

山口百惠的粉笔像

张军、朱国宏所在的8115班级从大二起代表经济系参加比赛，在一起制作板报的日子，“大家都非常开心！”当时本部1号楼是经济系男生的宿舍楼，正对着二楼楼梯口的是一个空着的公共房间，许多关于黑板报的构想和设计即诞生于此。要做出了一幅精美的黑板报，无论是内容还是版式都有讲究，所以各个系班都卯足了劲找到有才能的同学参与制作。在8115班级里，正好有由张军、朱国宏、尚晓麒为主的“黄金搭档”。其中，朱国宏文学功底很好，长于写诗和文章，黑板报的文章常出自他手；尚晓麒粉笔字写得好，负责板书部分；而张军擅于绘画，由他完成配图、题花、边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济系的黑板报在学校比赛中力压群雄，三次拔得头筹。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军怀念道：“一旦开始做黑板报，大家就是一个团队，大家相互配合，把黑板报抬进抬出，好像很自豪。”

1984年，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8115班级负责接待其中一部分。恰逢中秋节，班级邀请了三名日本青年到寝室吃月饼。“那天是特例，我们把七个人一间的寝室打扫干净，把月饼切好放在中间。”起初，大家都有些沉默寡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突然一只苍蝇飞了进来，张军突然开口



左图 / 张军在本科学时期的画作
右图 / 复旦《大学生》杂志辟有“黑板报文选”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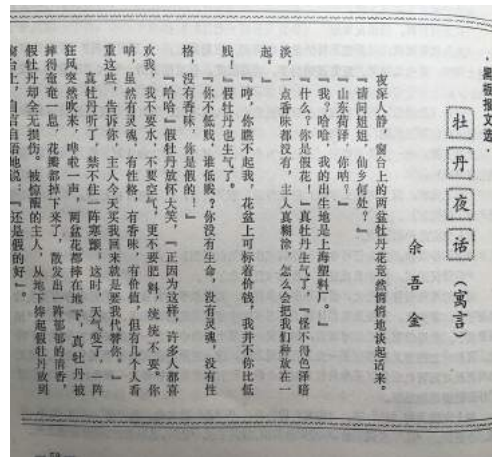


图 / 经济系在校黑板报比赛中拔得头筹

问道：“日本也有苍蝇吗？”一句话逗笑了所有人，打破了尴尬，大家开始积极地相互提问，“我们想了解日本，他们想了解中国”。有了这番愉快的交流，又正值学校黑板报比赛，最后张军在这次的板报里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幅日本当红女星山口百惠的肖像。后来，他们用这次的黑板报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的大学生黑板报比赛，捧回了第一名。

80 年代的集体“博客”

进入 21 世纪，自媒体蓬勃发展。张军戏称，再回去看 80 年代的黑板报，“相当于现在的‘晒博客’吧。”但与个体化的自媒体不同，摆在“南京路”上的一块块黑板报代表的则是集体的名义。

在 1980 年代的复旦校园里，诗社、演协、黑板报，几乎是当时学生活动的三大盛事。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青年们重回校园，内心洋溢着“大

学生”的情怀。正如朱国宏所描述的，“在思想解放的情况下，大家都想表达，表达就要有载体。”当时纸质媒体没有那么发达，制作刊物需要刻蜡纸和油印机，黑板报自然成了各种奇思妙想最好的出口之一。后来，不少优秀的黑板报文章被选录，刊登于当时由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大学生》杂志上。

另一方面，除了诗社、演协几个社团之外，校园里没有太多学生活动，系与系之间的交往联系也不是很多。黑板报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不同系的同学可以相互了解，“一个系的文化、精神，甚至气势，都可以用黑板报传达出来。”文科如中文、哲学、新闻、外文的黑板报常是人们关心的对象，因为那都是“才子佳人比较多的地方。”而谈起经济系的黑板报，张军同样不无骄傲：“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会期待经济系的黑板报，如果抬出去晚了，可能还会问‘还没出来吗？’”有趣的是，虽然院

系之间的直接交流可能比较少，但是 80 年代复旦校园学生的兴趣却常出现交叉。看起来偏理科的经济系，在文学、艺术类却表现突出。除了黑板报做得好，也不乏其他文学、艺术人才，比如 79 级的许德民和 81 级的朱国宏分别是复旦诗社的创办者和第三任副社长。看起来偏文科的中文系，却也培养出过经济学家。现在常提倡的“学科交叉”在当时已有显现，进了校门之后，大家各凭兴趣发展，最后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80 年代的黑板报在当时人的眼中，代表着他们所专属的记忆。尽管随着时间流逝，黑板报早已消失在“南京路”上。回忆过去，我们可能向往那个时代的激情，却也知再无可能复制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仍在创造着自己的时代。光华大道的梧桐，依旧荫庇着路过这里的每一位复旦人。

（本文记者采访了张军老师、朱国宏老师，在此谨致谢意；文中部分内容引自朱国宏老师回忆文章《追忆复旦 8115》、《复旦人周报》第 333 期文化版《他们眼中的维多利亚时代》和《新闻晨报》2005 年文章《光华大道：精神之路》。）



诗酒试年华：复旦诗社的“海星星”岁月

文 | 本刊记者 张鹤仪

2016年5月27日的复旦光华楼东辅楼颇为热闹。几届诗社人齐聚，举行光华诗歌节庆祝复旦诗社三十五周年生日。许德民出发前在朋友圈写下，“作为诗社古董，有个致词，我该说些什么？”而现场，他分享着对于坚持与超越的理解，更感慨一群新诗社人的年轻与锐气。

时光倒流至三十五年前，许德民还是1979级复旦经济系的在读学生，学院派诗歌浪潮将起，时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的他发起成立复旦诗社并首任掌舵人。许多年之后，当他面对诗人、画家、艺术理论家的诸多称谓，或许会想起光华大道一片落叶便可砸中的一位诗人，想起那段复旦诗社遥远而辉煌的“海星星”岁月。

当奶白色的海月水母 / 伴随你巡视洁白的珊瑚林
你是骄傲的小女王
让淡紫色的光芒 / 照耀马蹄螺和虎斑贝

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激情成就了复旦诗社，诗社也为八十年代增添了隽永悠长的青春回忆。许德民是恢复高考后诗社的第一任社长，而复旦诗社也是恢复高考后中国大学最早的校级学生诗社。校园内外，人们读诗、写诗、追寻的也是诗；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有字的地方就有诗歌。在校刊的同一个版面上，青涩的学子新诗与苏步青老先生的旧体诗交相辉映。成为风潮的同时，亦沉淀为隐秘的交流语言。

“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八十年代初是大学生诗歌的出发点，许德民回忆，当时复旦有两大赛诗会，举办活动时相辉堂总是座无虚席，连窗台、走廊上都挤得满满。彼时的

诗歌学术氛围浓厚，与当时社会的“读书狂热”也密不可分，在他的记忆里，同学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买书，至今回想那段岁月，仍是一段独特的属于那代人的记忆。“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事实上，诗社的出现也推出了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学生诗人，包括许德民、孙晓刚、韩云、李彬勇、卓松盛、张真、傅亮在内的诸多复旦诗社成员与其作品一同进入公众视野。诗刊《诗耕地》、《语声》，诗集《海星星》、《太阳河》，一系列诗社刊物成为后世每每提及“复旦诗派”便必浮现的印象，也在当时使复旦迅速成为中国学院派诗歌的重镇。

谈及《诗耕地》，1981级经济系校友、曾任诗社副社长的朱国宏提到了一则趣事。复旦早在1940年代便已有诗社类型的组织，彼时的重庆北碚校区学生邹荻帆、姚奔等人联合校外诗歌爱好者

募捐而成一份纯诗歌刊物《诗垦地》，历时三年而归于消声。因此，复旦诗社第一期刊《诗耕地》出版伊始便将样刊寄送给邹荻帆，收到了他的回信：“我们当时办的诗刊叫《诗垦地》，你们叫《诗耕地》很好。我们开垦，你们现在耕耘。”

从这一角度，八十年代的诗社又存于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成为复旦诗歌的复兴。顺流而下，每一阶段、每一位诗人的个体都变为时光溪流的交汇，而诗歌静坐于岸边，披着淙淙流水。

让歌唱的歌唱 / 让思想的思想
让娱乐的娱乐
一切回归自然 / 一派和谐景象

在1983级复旦新闻系校友潘真的回忆中，那时复旦心怀梦想的文学少年入学后的第一个举动，



上图 / 1982年复旦诗社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合影。前排左起：许德民、胡平、沈林森、蔡晓刚。后排左起：汪澜、张真、曹锦清、蒙晓东、周伟林、韩云。

大抵就是毕恭毕敬地抄录几首自己的得意之作，塞进6号楼那个的神圣信箱，然后不安地期盼着被吸纳为诗社的一员。

而复旦诗社的诗与人，也多源于校园生活，由此成为校园推崇的又一重风潮。曾风靡一时的《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的作者是1979级中文系校友邵璞，喜欢把一边裤管卷至膝盖，挎个军用书包走在校园里，颇具个性。而诗社第二任社长、1980级中文系校友卓松盛则是杆儿“老烟枪”，每次开会都掏出两包“飞马”牌放桌上让同学分享。他年少稳重，才华出众，口语化诗歌，独辟蹊径，写得冷静而出色，让许德民毫不犹豫地诗社接力

棒交与他手中。多年以后，卓松盛纪念毕业三十周年的回忆文章《我与复旦诗社》，将那段历史清晰呈现。而他的下任傅亮，也因为对诗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很强的办事能力”而获得继任。而傅亮也不负众望，将复旦诗社的活动办得风生水起。

许德民觉得，诗歌与个体的融合既带有个性原因，也源于某种时代“缺失”。“诗歌是心灵之声，是生命的需求，我们缺少什么就用诗来表达追求。”在那个年代，大学生们缺少爱情，《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便轰动一时；他的朗诵诗《心灵的自白》针砭时弊、铁肩道义，表达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心声，因此相辉堂响起久久掌声。

当时的诗社与诗界也过从甚密，与华东师范大学夏雨岛诗社、金山石化总厂诗社等其他高校和工厂的诗社组织亦有交流。校园里不时闪过曾卓、黎焕颐、宁宇、圣野等著名诗人的身影，他们的讲座、座谈深受追捧。与诗社相伴的便是一系列诗歌比赛——5月的青春杯和11月的屈原杯，上海诗界的诗人们也常常受邀而来品评作品。外校前来交流的诗人往往被本校诗人带去复旦最雅的“大家沙龙”，喝着咖啡，诗酒趁年华。

而《诗刊》、《萌芽》、《飞天》、《雨花》、《山花》等纯文学期刊上也常见复旦诗人的姓名——这些杂志往往摆放在中央食堂门口，朱国宏笑言，“那可是诗社的社长、理事们蹬着黄色车，去老北站成捆成捆拉回来的。”他记忆里最为深刻的，是1982年“复旦之夏”征文比赛、1984年上海市青年诗歌大奖赛两场比赛。“那时的奖品通常是诗歌、文化杂志，某次比赛的一等奖有60元购书券，虽仅限于校内新华书店使用，但足以让人兴奋。”

一个故事敲响另一个故事
就会有新的故事继续说啊说啊
不再如等待时滴答滴答的疲倦
而飘飘扬扬的在阳光下编织着都市
熙熙攘攘地滑过五月滑向另一个季节

2015年4月30日，The Press咖啡馆正式开张。这家坐落于中国近代报业发源地、申报馆原址的店面由复旦校友众筹而成，重建文化交流的平台。而The Press亦成为一批老复旦诗社成员新的活动阵地，诗歌嘉年华、诵诗会等一系列活动在这方空间里重新编织。

但事实上，真正留给重聚的时间并不多。八十年代一批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均已步入中年，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进入人文、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第四任诗社社长、1982级哲学系校友杜立德活跃在商界，“诗歌离我们太远了。但现在又变得那么近，回头看自己的诗，很有时空穿越的感觉”；2002经济学院校友鲁育宗如今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他在诗集《热爱》的扉页慨叹，“我或许会在即将来临的命运中失却诗歌，但其深入我内

心的正义召唤以及由此构筑的人格力量，将一生不变。”

这也使八十年代的诗歌盛世、复旦诗社的“海星星”时代成为独一份的记忆，旧日之辉煌越发衬得今日之责任与慨叹。百年校庆之时，许德民停下画笔，承担了《复旦诗派诗歌系列》的编纂工作。2005年9月14日深夜，他亲自指挥，两吨重“复旦诗魂”铜雕从吊车上徐徐落下，安放在校内的草坪上。这是诗社对复旦的献礼，也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回望与敬意。

“旦复旦，日月光。复旦诗社，成立于1981年5月27日，有诗刊《诗耕地》、《语声》，诗集《海星星》、《太阳河》，源接上世纪40年代《诗垦地》，形成复旦诗派。百年校庆，诗友重聚，感恩母校，让我们博学，感恩诗神；让我们笃志，特献铜雕‘复旦诗魂’，愿母校诗魂永在。”

百字铭文，诗酒试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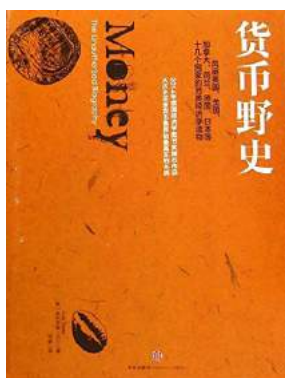
（本文的写作得到许德民、朱国宏、杜立德、鲁育宗等多位原复旦诗社人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上图 / 2016年4月29日晚THE PRESS咖啡馆举行诗酒嘉年华活动。左起：鲁育宗、杜立德、李彬勇。

阅读

经济学院教授荐书



《货币野史》

[英] 菲利克斯·马汀著 邓峰译 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货币野史》不野，这是一本信息量很大，乃至颠覆传统经济学中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一本严肃的著作。自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一直讲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然而，这本书却告诉人们，近些年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却发现，在任何初民社会中，物物交换并不存在，因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货币起源于债，而不是物物交换。从债和可转让信用的角度看待货币的本质，人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史观，也会得出观察经济世界的一幅新的图景。这是一本信息量很大的书。不管你是否学过经济学，都值得一读。

——李维森



《贝弗里奇报告》

[英] 贝弗里奇著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年

《贝弗里奇报告》被看作福利国家的宣言和“圣经”。今天我们重读这一经典之作，对我们全面、完整理解当时构建福利国家的出发点、所倡导的原则、所设计的路径、工具等，消除传统理解谬误，对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及改善民生大有裨益。

——丁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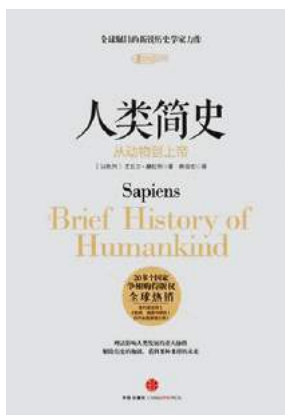
《公共政策导论》

[美] 查尔斯·韦兰著 魏陆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大到国家关系，小到停车收费，公共政策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在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我们发现密集推出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难在社会中达成共识。争论当然是必要的，抱怨和批评也是正常的，但也许我们需要先对公共政策了解得多些。本书运用大量生动的例子和风趣幽默的语言将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十分轻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相信一定会给你以启发。

每个公共政策的利益相关方以更好的方式加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来，就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杜莉



《人类简史》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货币野史》一位以色列年轻人用希伯来文写的这部《人类简史》2012 年一出版，就在世界上成了畅销书，已经被翻译为 30 多种文字。作者曾获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这部书用一种极其宏大的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文化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综合视角，对人类从一种智人到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做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的描述。一口气读下来这本书，长了很多知识，也对各门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个宏大的思考背景。这本书的作者最后告诉人们：人类现在拥有的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力量，人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负责任。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唯一留下的只有物理法则，我们也不对任何人负责，且贪得无厌。天下危险，莫此为甚。

——李维森

世界秩序

[美] 亨利·基辛格著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中信出版社

《世界秩序》

[美] 亨利·基辛格著 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 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此书回顾了过去 400 年世界秩序观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冲突和潜伏的危机。对中国读者而言，基辛格博士的论述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视角来审视、思索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冷战结束、欧洲与日本的经济衰落、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令中国在维护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都意义深远。基辛格博士虽然没有对此作直接的论述，却提供了足够清晰的分析框架供读者参考和探索。

——孙明春

全球校友会快讯

1月10日，“中国经济转型2016：风险、路径与动能”暨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首届年会

2016年1月10日，全球校友会首届年会在上海国际贵都大酒店成功举行。

活动获得了众校友的鼎力支持，帆贸投资管理公司、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酒邦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联合赞助本次年会。100余位学院老师和300余位校友参加了年会。知名校友汪新芽和辛强担纲主持。

副校长张志勇先生莅临并发表致辞，全球校友会执行会长赵定理就过去一年全球校友会的工作进行报告。本次年会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2016：风险、路径与动能”，秉持着复旦经院人“经邦济世”的传统精神，经济学院院长、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和六位杰出校友围绕中国经济现实，作了主题演讲，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张军院长以及其他六位校友嘉宾：平安银行行长邵平、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国荣、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瑞银环球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施斌、安信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亿东，与大家共同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真知灼见。在这场盛大的“家庭聚会”中，几代经院人共济一堂，师生、同窗再次重逢，彼此祝福着新的一年。



1月16日，苏州联络处“新型城镇化建设及融资专题分享会”暨经院校友2016迎新聚会

1月1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苏州校友联络处主办、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协办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及融资专题分享会暨复旦经院苏州校友联络处校友2016迎新聚会”在苏州科赛集团会议室成功举办！出席本次活动的共有40多位来自苏州、上海等地校友及科赛集团中层管理团队人员。其中复旦大学PE/VC同学会副会长曹昱、复旦大学德国校友会会长魏建东做为联络处邀请的重要嘉宾出席了本次分享迎新活动。本次分享会由苏州联络处主任钱劲松主持，与会校友纷纷回顾了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处于下行的持续压力，借此机会共同抒发了对2016年经济发展的猜想及美好展望。



1月24日，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投行俱乐部第五次活动

2016年1月24日周日下午，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投行俱乐部第五次活动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行，这是投行俱乐部首次通过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平台，面向全体校友开放报名的活动。校友葛贤通（K先生），作为主讲嘉宾，为大家带来了内容丰富的实务总结，演讲精彩。



3月8日，“智慧之花 美丽绽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师生校友座谈会

2015年3月8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妇委会、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经济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智慧之花美丽绽放”经济学院校友师生座谈会在经济学院隆重举行。会议邀请到了五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分别是2000级金融学硕士上海浦东海关副关长陶蔚莲，交通银行总行离岸金融中心党组副书记、副总裁刘钢华，复旦大学1994级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1999级经济学系博士生研究生，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赵雪芹，意大利意联银行股份合作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陆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李丹。五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和经院学生一起分享了她们的宝贵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3月26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高端论坛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杭州校友联络处揭牌

3月26日上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高端论坛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杭州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学术中心隆重举行。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5级校友钟晓敏教授主持会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复旦经院1995级校友），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复旦经院1979级校友），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赵英军教授（复旦经院1994级校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教授，复旦大学外联处副处长、复旦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章晓野女士，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联席执行会长赵定理先生等近五十位复旦经院校友，及二百多位各大高校慕名而来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并见证揭牌仪式。



4月5日，“新经济学人”沙龙首期活动

2016年4月5日上午9:30，由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和第一财经研究院、《比较》编辑室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协办的“新经济学人”沙龙第一期——“债务、货币和全球金融体系”论坛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邀请到了英国前FSA主席、INET主席Adair Lord Turner以及七位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他们分别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SAIF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海影（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



4月9日，余焕培校友“太极与人生”分享及“太极拳初级班”首期活动

2016年4月9日下午两点，“太极与人生”讲座在经济学院205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活动是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特邀余焕培校友为经院师生及校友免费开设的太极拳初级班课程。此次讲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余焕培校友不仅分享了自己学习太极拳的心路历程，还让校友们亲身体验了太极的基本范式，为后续的学习活动打下了基础。余老师平和且有趣的分享、深入浅出的讲解、潇洒漂亮的招式示范和教习博得了在场校友的普遍好评，课程结束后大家兴趣高涨，纷纷要求开设后续课程。之后在场校友作揖拜师，约定每周六下午相聚复旦，和余老师习太极，练功夫。活动在大家的欢笑和约定中圆满完成。



4月9日，香港校友联络处第三期校友沙龙

2016年4月9号下午，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主办的第三期香港校友会沙龙在香港圆满举行。本次沙龙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主任董琦女士发表致辞，由香港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李丹女士主持。并且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和大家一同畅谈2016开年以来的热点话题：“全球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和“中国汽车业2016年的展望”。两位嘉宾校友是：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瑞银证券中国研究主管和亚太区汽车行业研究主管侯延琨博士。整场沙龙精彩纷呈，超过40位校友听众参加了此次活动，台上台下积极互动，反响热烈。



《早上好》复旦经院苏州校友联络处专题分享会第二期

4月17日上午，由复旦经院苏州校友联络处主办的专题分享会第二期《早上好》在苏州科赛集团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复旦大学世经系1986级校友、德同资本联合创始人、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邵俊先生带来《早上好》的主题演讲，并特别邀请苏州联络处副主任江赛主持。当日阳光明媚，和风微微，来自苏州、杭州、常州地区以及复旦德国校友会的校友纷纷前来聆听邵俊先生关于早期项目投资的精彩分享。



4月23日，资本江湖，路在脚下——“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第三期活动

2016年4月23日下午，由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办，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投行俱乐部、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PEVC同学会、众投社协办的“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第三期活动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活动邀请复旦世经系88级校友、歌斐资产管理合伙人、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洪伟力博士带来《资本江湖，路在脚下》主题演讲，并邀请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王安华主持。洪博士从监管部门开始从事资本市场相关工作，他从丰富的业内经验中总结投资逻辑，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对资本市场链条进行梳理，为大家带来诚意满满的干货分享。



5月1日，人生何必只如初见——复旦大学1991级经济系举行毕业20年聚会

2016年5月1日复旦大学1991级经济系举行毕业20年聚会。这么意义非凡的大事件，是在一位同学从杭州来沪出差期间的一次小范围聚餐时敲定的，随后成立了一个19人组成的筹备组。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在场地提供、纪念品准备、校友刊物记者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确保了9115毕业20年聚会的顺利进行。当天大家分别在邯郸校区的经济学院大楼座谈、畅聊，在新江湾校区参观、合影，在且苑午餐后来到了第三站—淀山湖。大家回望大学时光，感慨激动，更祝福彼此的情谊山高水长。人生不能只如初见，谁也不能回到从前。唯有不忘初心，一直向前。



5月4日，复旦经院南京校友联络处“相约五四，禅修与养生”活动

2016年5月4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南京校友会联络处以及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南京半山（国医馆）治未病中心、日本禅密气功研究所协办的“禅修与养生讲座”活动在六朝古都——南京隆重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共有40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校友，不少校友专程从上海、深圳等地赶来参加本次讲座。本次活动特邀南京半山（国医馆）治未病中心高级顾问、日本禅密气功研究所所长朱刚校友作为主讲人，南京校友会联络处秘书长葛军校友为本次活动亲切致辞。朱刚老师细致的演示、深入浅出的讲解获得了在场校友的普遍好评。



5月18日，正心谷创新资本暑期实习生项目全国巡讲——“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特别活动成功

2016年5月18日晚，由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复旦大学校友会、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团学联、研究生会协办的“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特别活动“正心谷创新资本暑期实习生项目全国巡讲”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由正心谷创新资本联合创始人、汇添富创始人、复旦经济学系90级校友、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林利军及其团队主讲，并邀请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王安华主持。林利军先生和其正心谷团队的几位同事和大家分享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正心谷的创办历程、各自的从业经历，诚意鼓励大家加入正心谷。



5月21日，建设财资中心，助力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第五期活动成功

2016年5月2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与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团学联与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投行俱乐部协办的第五期“复旦经院青年校友讲堂”于经济学院201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8级校友、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花旗财资与贸易金融中国区总经理裴奕根带来《建设财资中心，助力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题演讲，并特别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严立新老师主持。裴奕根校友用自己丰富的从业经验和敏锐严谨的思考向大家深度分享了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问题，并耐心回答了大家的各种问题。与会校友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5月21日，探秘 道家养生公益讲座成功举办

2016年5月21日下午，由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主办，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协办的“探秘 道家养生”公益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潘科名老师带来道家养生的主题演讲，并特别邀请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老师主持，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执行会长赵定理校友致辞。当日雨水连绵，仍有百余位校友、同学冒雨前来聆听潘老师的分享。潘科名老师是武当派嫡传弟子，张三丰第十五代传人，道号玄然。活动现场潘老师举例说明儒释道文，并与校友进行互动。大家初步体会到了心神归定，精神养生的魅力。之后，还给大家演示了十二段锦部分招式。讲座结束后，潘老师和师兄两位武当十五代道长分别为大家进行了“张三丰太极拳”“道家浮沉”道家功夫的表演。此次活动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



5月21日，再续同窗谊：1973级经济系校友毕业四十周年返校聚会

2016年5月21日，1973级经济系校友举行了毕业40周年聚会。早上八点，全国各地的校友们陆续重返复旦，再聚首。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但丝毫没有减弱校友们时隔40年后再相聚的激动与喜悦。校友们每人戴着印有“1973级经济”标识的红围脖，在校园里四处参观，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少。校友们在复旦大学校门进行了合影，然后在经济学院志愿者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史馆、昔日的宿舍，并在经济学院校友会的精心安排下在且苑餐厅专窗就餐。下午来到了经济学院大楼座谈。昔日同窗、师长齐聚一堂，座谈会现场始终洋溢着欢笑。四十年后再聚首，同窗情、师生情和浓浓的母校情牵动着所有的返校校友。复旦经济学院的印记，始终是校友们抹不去、擦不掉的荣耀。



5月24日，金浦基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案例分享会成功举办

2016年5月24日下午，金浦基金投资实战分享会第二期在上海浦东新区金浦投资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联合创始人/总裁郑齐华女士及团队带来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案例分享，共有20余名同学参加了本次分享会。本次分享会采取的是现场实战型案例投资分享，由郑齐华女士及其团队冯思诚先生、朱睿斌先生结合案例为大家讲解股权投资决策的逻辑与实务操作流程。历时将近5个小时，从前期主办方的筹备、到学院为校友们安排专车接送、再到金浦投资为校友们精心准备的茶歇，使得这场活动全程干货满满、惊喜满满，校友们在学习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实战案例的同时，也收获了学院和郑齐华校友团队的热情接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全球校友会

[校友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你，还记得吗？
此去经年，
那燕园一隅的青砖斑驳，
那月光下的红檐流连，
那相辉堂前的朦胧羞涩，
那傲然不亢的意气少年，
……

匆匆华年，
看今天，
复星泛海楼已昂扬挺立，
国权路600号依旧夜无眠，
一代一代，杏坛春秋育桃李，
一代一代，莘莘学子增光辉，
成就了今天的翘楚，
这里，那时，他们，我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都有一颗共同的复旦心。

2015，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校30周年，
30年不长，但有桃李满园，
30年不短，有桃李而立！
今天，启航！
今天，征途漫漫，

曾记得的时光，
筑就了我们心中一座座启程的丰碑，
中为了我们一段当年的星光，
留下了一段当年的星光，
只为了，
不忘辉煌背后的辛酸，
不忘苍老之前的华颜，
不忘葱茏岁月的安好，
不忘在那些地方的那些年！

不忘在复旦的最美，在经院的最爱，在那些地方的那些年！



您可关注“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学院咨询、校友动态、校友注册、查询校友、活动报名、加入各地校友联络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电话：021-55665306 传真：021-55665306
Email: econalumni@fudan.edu.cn



征稿

经院校友刊《仙舟客》于2016年1月10日上市了！从看到本篇文章的这一刻起，你自然而然就是经院“校友”的一员，是《仙舟客》最可亲的读者与作者了！无论你散落到天涯海角，我们随时期待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没错，就是你，随时分享你在经院求学的记忆、在外打拼的故事以及你对人生世界的感悟。文章题目不限，字数不限，有故事、有情感、有思想为最佳。我们崇尚开放多元，只要真实自然、风格相契，你敢写我们就敢登。留心看哦，没准下一期上就有你！来稿请以附件形式发送word版本到邮箱 xianzhouke@126.com，并尽可能附上一个150字内的作者简介和3-5张有时间地点等文字说明的照片。